

香港歷史之謎

爾東



香港歷史之謎

爾東

目錄

自序

爾東

政海風雲

宋帝流浪記	2
宋元時期的新移民	5
香港首次對外戰爭——中葡大戰	9
《穿鼻草約》：錯誤的割讓？	12
英國強佔香港	18
酗酒法官挑戰港督戴維斯	20
殖民政府的早年外交	22
港督出使天京	24
徐廣縉偽旨拒英人入穗	26
早期的司法制度	29
英國覬覦九龍半島	31
葉名琛堅拒修約要求	34
九龍本是租借並非割讓	37
九龍的悲劇——租借變割讓	40
英國私吞深水埗	43
罷市反英顯愛國	46
村民誤殺流氓獲特赦	48

百多年前的立法局大變革	50
海獅候命吞噬新界	53
新界誕生記	56
鄧氏村民臭蛋「宴」英軍	59
三不管地區——九龍寨城	62
英國圖謀獨立兩廣	67

民生百態

李鄭屋古墓——漢人衣冠冢	70
屯門——古代海防重鎮	72
隋唐年間的香港要地	75
清初遷界政策影響民生	78
鴉片零售業	81
第一次人口統計風波	83
香港首個城市——維多利亞城	85
清理大火瓦礫掀填海之始	88
撲朔迷離的黃墨洲案	90
早期的金融管理	92
十八世紀中的航運業	95
百多年前的金融風暴	97
麥當奴：以賭制賭	99
香港醫院之父——東華醫院	101
西學始祖——中央書院	104

十九世紀的房地產	106
港督公館慘遭「開罐頭」	108
水警總部前身竟是鴉片船	110
華人進入圖書館有時限	112
《遐邇貫珍》成中文報刊鼻祖	114
中法大戰引發香港大罷工	116
世紀前的監獄生涯	118
大頭綠衣	121
香港並不香	123
港府曾向匯豐借錢度難關	125
稅貢倍增妙計開源	128
暴雨後重建記	130
雲南瘟疫襲港	132
香港大學早期只收男宿生	135
新界士紳力戰英軍保家園	138
老鼠有價	141
九鐵修拱橋破世界紀錄	144

人物千秋

大海盜張保仔搖身變武官	148
砵甸乍：確立三權分立	151
戴維斯：寧管華人不管英商	154
改革大使寶寧	156

羅便臣：百政水為先	159
麥當奴：紓解民困	161
堅尼地：起用華人擴充警隊	163
無法抗拒的軒尼詩風潮	166
首位立法局議員——伍廷芳	169
寶雲：大學校長投身政界	171
德輔：萬人上書抗議衛生惡劣	174
威廉·羅便臣：妙化政治難題	176
傑出學生之冠——孫中山	178
參考網址	181
參考書籍	187

自序

過去的香港是一個小漁港，現在的香港已發展成一個大城市。百多年來，香港不斷革新，不斷進步。不少人也曾問：「香港為何如此成功？」歷史正是一面好的鏡子，讓大家回顧過去，找尋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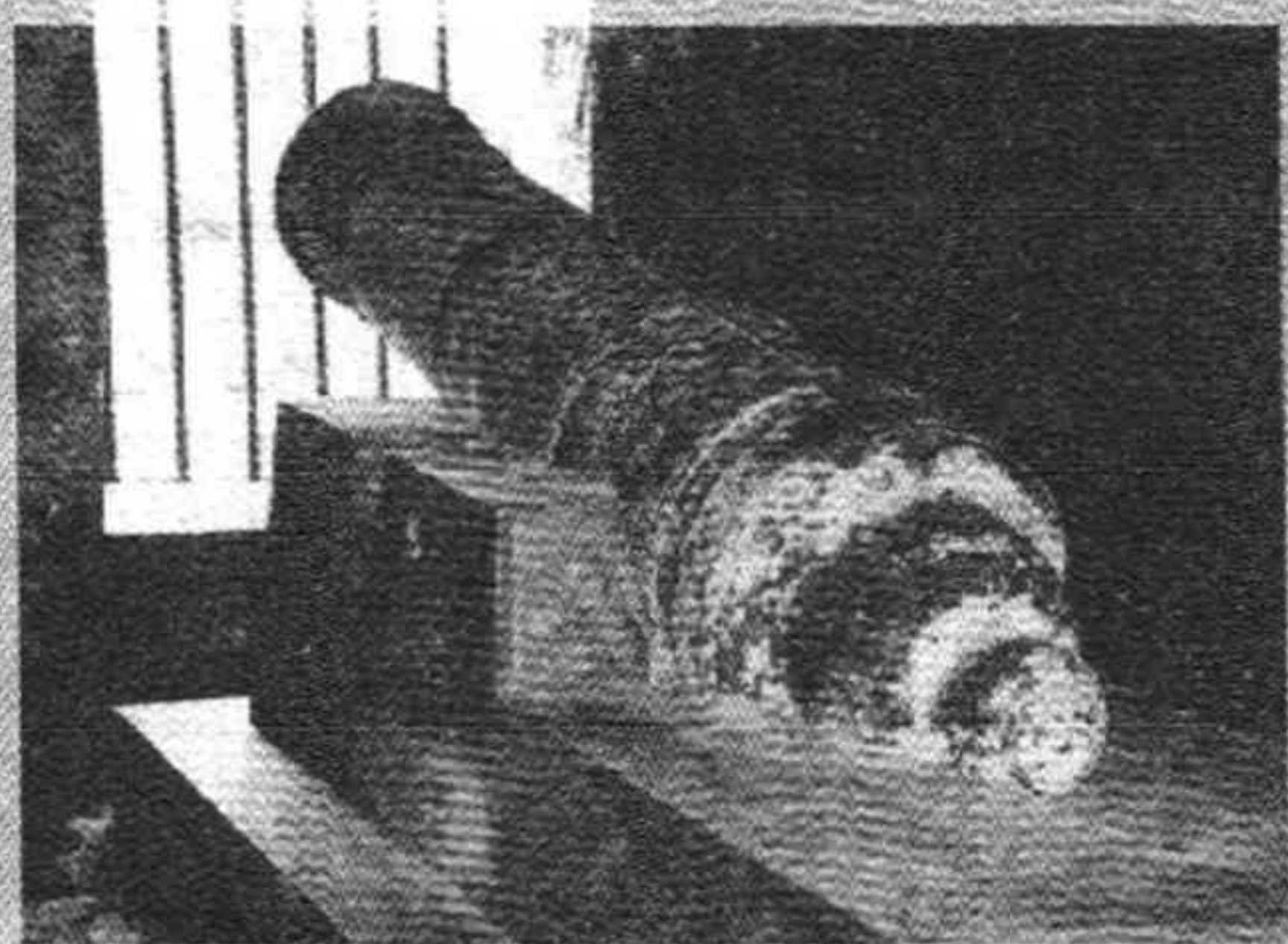
本書從政海風雲、民生百態、人物千秋三方面去闡析香港過去的故事。不少人也熟悉香港，但所知實不詳。如九龍本是租借並非割讓；英國租借新界未曾付過一分一毫；匯豐銀行曾多次借款給清政府償還外債；第一次人口統計竟要收費等等。以上的歷史小故事，本書將有詳盡析論。弄清香港的過去，可知香港的未來。盼望這本小書能令大家對香港有更深入的認識，更會喜歡香港多一點。

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首要感謝明報劉美儀小姐推介於報刊。其次，要感謝陳佩儀小姐，協助處理稿件資料。當然，承蒙明報出版社總編輯潘耀明先生慨允出版，深表謝意。此外，更要感謝曾慶慈小姐、葉翠華小姐，對本書編排費盡心力，永銘肺腑。徐振邦先生更借出不少寶貴相片，在此衷心致謝。最後，特別感謝內子結屏全心全力照顧家務，令我可專注寫作。沒有她的付出和支持，本書便不可能依時完稿。

本書撰寫力求謹慎及認真，然學識有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各界賢達進賜指正，是所至盼。

爾 東

政海風雲



宋帝流浪記

南宋末年，蒙古軍隊大舉南侵，先後攻佔了建康和臨安。宋度宗之長子恭帝被俘，而度宗另一兒子益王則被朝臣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陳宜中等人擁立為帝，是為端宗，其弟被封為衛王。兇悍的蒙古大軍依舊窮追不捨，結果兩小末代皇兄弟被迫流亡。在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人護送之下，他們經海路先後途經泉州、潮州、惠州、廣州等地，最終逃至九龍官富場（即今九龍城附近），在此建立行宮。

殘酷的蒙古大軍仍死纏不放，繼續追逐到底。故他倆與隨行官員經淺灣（即荃灣）、秀山等地再次逃亡。途中，他們遇上颶風，端宗沉溺得病，最終在碭州駕崩。衛王隨即繼位，是為昀帝，隨後轉至新會崖山。元兵追至，宋軍大敗，陸秀夫負帝昀投海殉國，南宋一朝亦告終結。

大石中開帝身藏

其間，宋末兩帝曾在香港暫居半年多的時間，後人為了紀念他們，於是在九龍城土瓜灣築了一座石台。為何人們選擇在此地築石台？傳說帝昀被蒙古大軍追至此山崗時便走投無路，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山崗上的一塊大石突然一分為二，帝昀藏身於其中，得以逃過大難。雖然這只是傳說，但亦充分表現出時人對宋帝忠愛之情。不少人猜疑為何宋王台中的碑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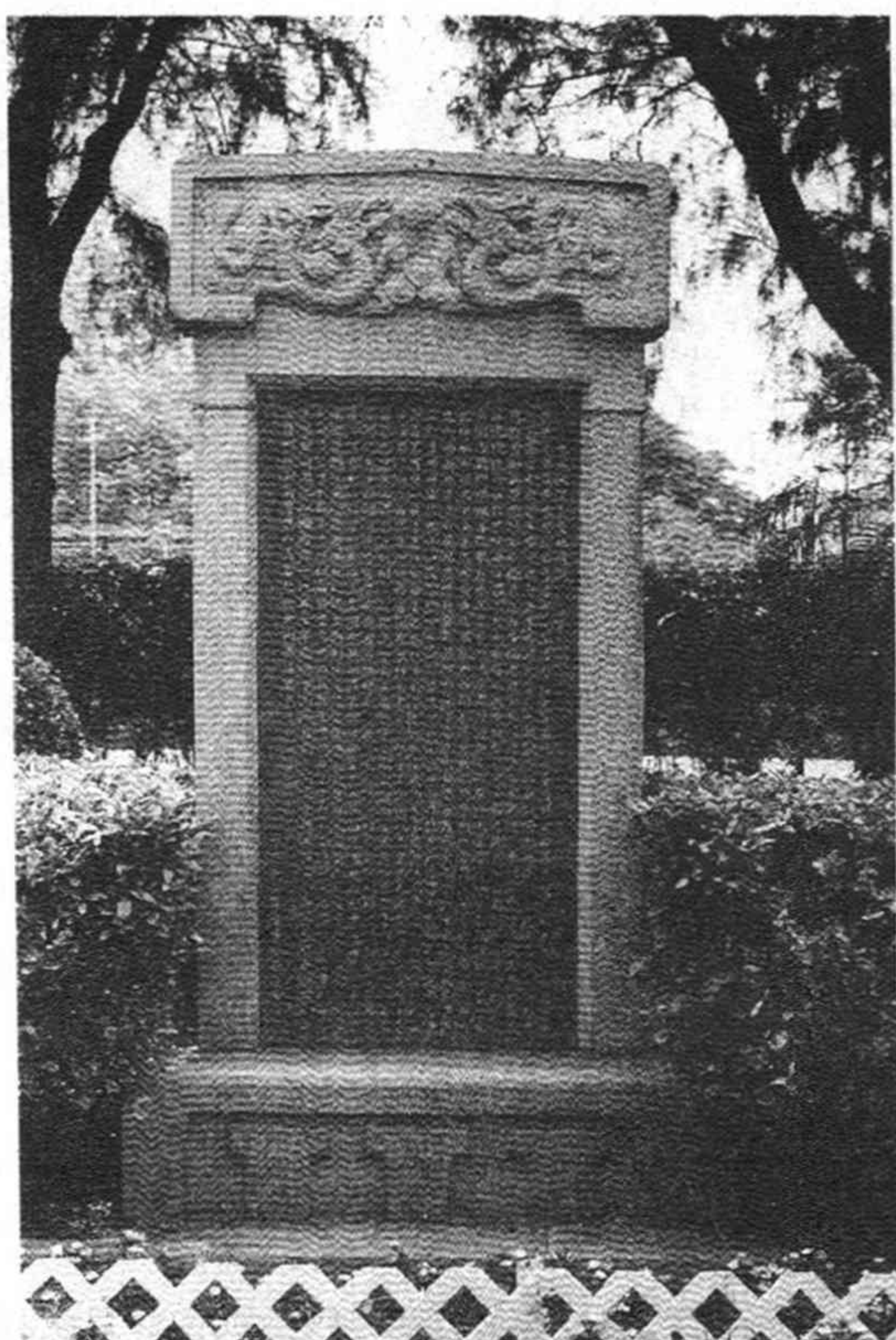


宋王台

「王」字，而不用「皇」字。不少史學家都認為這是碑文刻鑿者故意之作。南宋亡國後，元朝繼承統治中國。碑文刻鑿者為免得罪元朝統治者，故把「皇」改為「王」。宋王台公園旁的小道，現已被命名為「宋皇台道」，確定了兩帝屬於正統。

清代嘉慶年間，宋王台曾經被重修，因此巨石上刻有「嘉慶丁卯重修」的大字。後來，香港被英國所霸佔，英國人也將宋王台視作為「聖山」（Sacred Hill），不敢輕視。十九世紀末，政府為了改善市區和郊區的交通，決定興建鐵路。由於工程需要大量石頭，一些商人建議在宋王台上採石，這卻惹來不少村民反對。立法局議員何啟與村民站在同一陣線，更通過條例保護這個古蹟，事件始告平息。二十世紀初，當地居民曾經強烈反對拍賣宋王台土地，更強迫當時殖民地政府在台址附近劃出數畝土地，樹立疆界，作為識別之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為了擴建機場，日軍



宋王台碑文

不惜炸毀宋王台的小山。此舉除了配合軍事機場需要外，另一目的是爲了消除當地居民的民族意識。在香港重光後，趙氏族人要求政府重建宋王台，以紀念宋帝，遂有宋王台公園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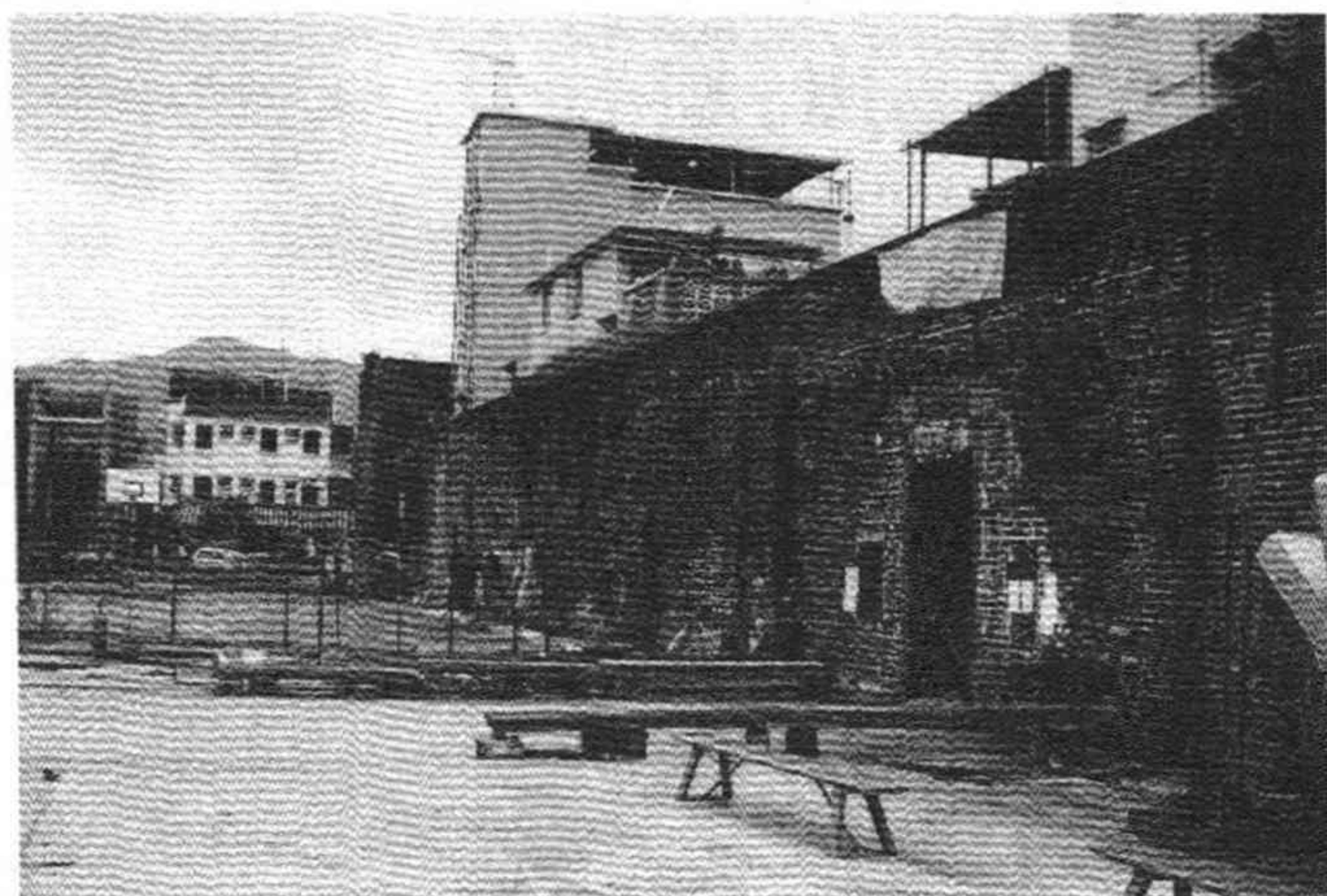
宋元時期的新移民

宋元交替之際，不少中國北方居民向南遷徙，以求逃避戰火的厄運。一些氏族更遷移至新界地區，成為了中世紀時期的香港新移民，當中以鄧、侯、彭、廖和文氏五族最大。他們到達新界地區後，很快便建村立業，立足發展。

五族避戰南遷

五大氏族中，以鄧氏為最早定居新界的大族。鄧氏原居於福建、江西等地。於宋神宗熙寧二年，鄧氏族人鄧符中進士，獲授陽春令。任官期間，鄧符遊經東莞岑田（即今元朗錦田），覺得該處景色美不勝收，決定把三代祖先遷葬於此。後來，鄧氏族人更移居此地，並開枝散葉。現存有關鄧氏先祖古蹟中，最著名的是「吉慶圍」。吉慶圍是由鄧伯經所興建，外有連環鐵門，以作防衛之用。十九世紀末時，英國租借新界，曾經派軍人以武力拆毀該鐵門。直至後來，經過村民多番申訴，該鐵門才物歸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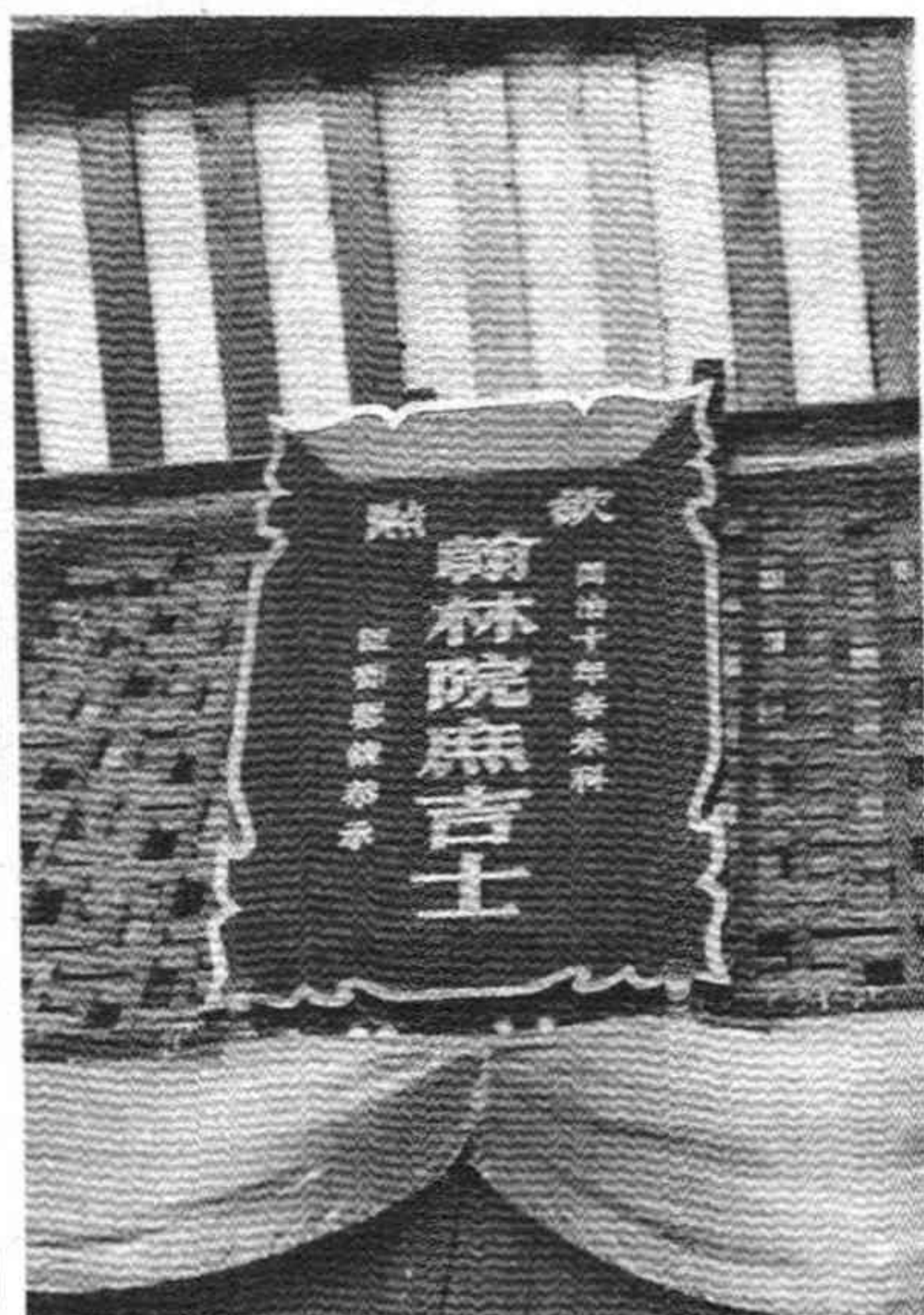
第二個大族是侯氏。其祖籍廣東番禺，於十二世紀時移居上水偏北地區，後來才遷至上水河上鄉地區。河上鄉地區本為趙氏、莊氏、潘氏、藍氏、馬氏等子孫的居住地，後來因為一些鄉民搶奪了官府的金銅鼓，而官府派員多次調查均沒有結果，決定以屠村結案，最終只有潘、趙二姓不死，仍然留居河



吉慶圍外貌



吉慶圍鐵門曾遭英軍拆除運往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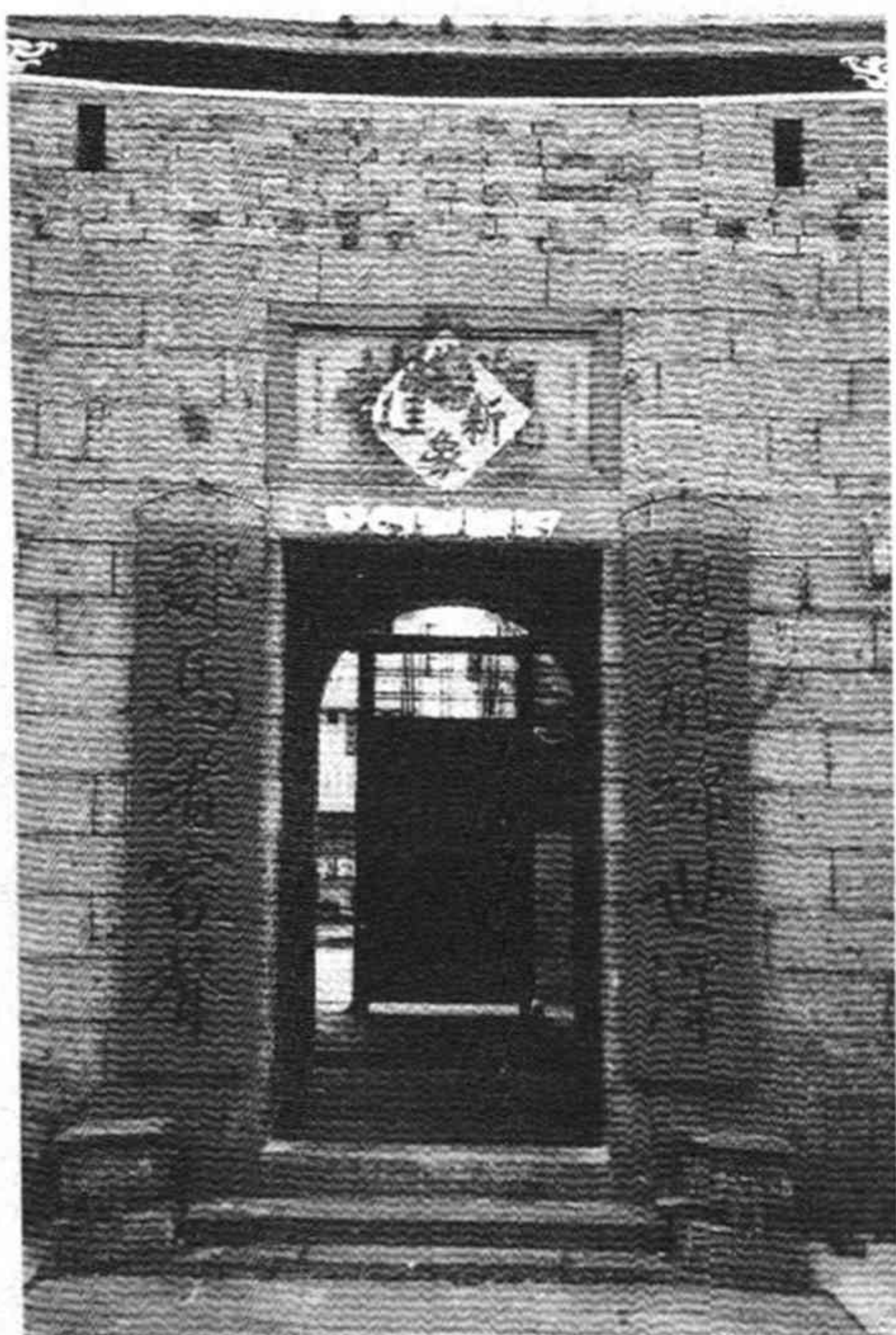
屏山鄧氏宗祠

上鄉地區，故此地日漸荒廢起來。直至後來侯氏子孫移居河上鄉地區，此地才得以重新發展。

粉嶺名稱由來

江西宜春廬陵是彭氏先祖的原居地。南宋末年，彭氏子孫彭澤和彭迪然因恐怕蒙古大軍侵略而影響生計，便毅然舉家南遷至新界粉嶺一帶。鴉鵲塢是粉嶺古時候的名稱。於明中葉時期，當鄉民掘山建村時，發現該處泥土呈白色粉狀，故稱該處為「粉壁嶺」，後人簡稱為「粉嶺」。發展至今，彭氏已在粉嶺興建了多條村落，包括有北邊村、南邊村、圍內村及粉嶺樓村等。

文氏先祖居於四川成都，其為漢末成都守將。南宋時，文氏子孫文天祥曾組織義軍來保家衛國。他與張世傑和陸秀夫二人，合稱為「宋亡三傑」。宋元年間，文氏已遷入廣東地區立足發展。明初，文氏子孫文蔭



粉嶺新圍



廖氏石堂

遷入新界。起初，他選擇居於屏山，後來遷往大埔建村立業。隨着文氏人口增多，居地漸不足夠，故不斷向外發展。時至今天，文氏已在大埔興建了九條村落，包括有仁壽圍、永平村、安龍圍、東鎮圍、蕃田村、新龍村、青龍村、石湖圍和周頭村等。

相比侯氏和鄧氏等，廖氏較遲在新界定居。起初，他們散居四方，後來才在上水定居下來。根據史料考查得知，爲了團結族民，廖族第七代先祖南沙公決定建立圍村，方便互相照應。此後，廖氏持續擴大，同時建立了不少村落，當中包括上北村、下北村、門口村、大元村、中心村和興仁村等。除了村落的興建外，廖氏還建立了著名的墟市——石湖墟。至今，石湖墟仍是新界的大墟市。

宋元之際，戰禍連綿，五大氏族爲了逃避戰火而不斷南遷。他們最終在新界地區定居下來，並且不斷發展。經過他們多年來的努力開拓，現在新界已成爲香港的重要地區之一！

香港首次對外戰爭——中葡大戰

在香港發生的第一次對外戰爭，不少朋友以為是鴉片戰爭中的九龍之戰。其實，這並不正確！早在明中葉，野心勃勃的葡萄牙已開始入侵中國，更在香港地區爆發大戰。當時，殖民主義於歐洲各國興起，故他們積極尋找殖民地及開拓新的貿易市場。中國身為一個東方大國，更成為他們主要目標之一。而香港是中國南方的大門，殖民主義者要進入中國，首要在香港立足。

強佔屯門建營寨

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馬來半島南部的馬六甲被葡萄牙（當時稱為佛朗機）海軍統領亞爾伯奎所佔領。後來，亞爾伯奎派使者阿爾華列士率領馬六甲船隊，護送中國商船返國。於正德九年（一五一四年），他到達了香港屯門島。（部分史家有另一觀點，認為屯門島不是指屯門，是指大嶼山。）他們更在島上刻印國徽，建立石碑，並在島上建屋，以木欄圍住四周。後來，葡萄牙士兵更在該處設立軍營，製造火銃等武器，並以此作為基地，繼續深入內地。

當時，在葡萄牙連番侵略之下，南洋多國已先後屈服。在這情況下，明廷與南洋各國建立的宗主和附庸關係已受到挑戰。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葡萄牙駐馬六甲總督派遣使

節安達拉和皮利司帶同國書和貢物經屯門進入虎門，但被廣州官員拒絕他們入境，葡萄牙船隊遂強行進入廣州港口。船隊抵達廣州後，皮利司登陸。兩廣總督陳金令其在廣州光孝寺習禮後，才肯引見。其後，皮利司更上奏朝廷，並成功得旨允許赴京，參見明帝。

可是，葡萄牙船隻上恰巧發生瘟疫，安達拉和其他船員只好退返屯門，只剩下皮利司一人留居廣州，等待上京參見皇帝。後來，明室以葡萄牙未被列入朝貢名單內，不准皮利司赴京。當安達拉得悉後，不僅沒有退出中國，更強行霸佔屯門、南頭等地，並建造營寨，勞役中國百姓。

借南風火燒葡船

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安達拉的弟弟西眇率領艦隊抵達屯門，接掌兄長職責。他生性殘酷貪婪，在屯門建築堡壘之餘，更設立刑場，肆意侵略，殘虐當地百姓。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年），安達拉自行北上朝覲，亦同樣被逐出北京。於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御史邱道隆等人上奏朝廷，提出以武力驅逐葡萄牙人。明武宗最後決定派廣東巡海道汪鉉率軍與葡萄牙人在屯門迎戰。汪鉉召集船隻，船上載有枯柴，並灌以脂膏，趁南風風勢強勁來一個火燒葡船。起初，雙方在大嶼山茜草灣交戰，後來轉至稍州，結果葡萄牙人大敗逃亡。由這時開始，葡萄牙人在香港境內絕跡。

自葡萄牙人退出香港後，便分兩方發展。一方入侵福建漳

州附近的嵵嶼島及浙江寧波附近的雙嶼島，而另一方則侵佔廣州灣外的浪白澳。於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賄賂海道副使汪伯，因而成功取得停泊船隻於澳門的權利。後來，澳門漸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香港則得以脫離險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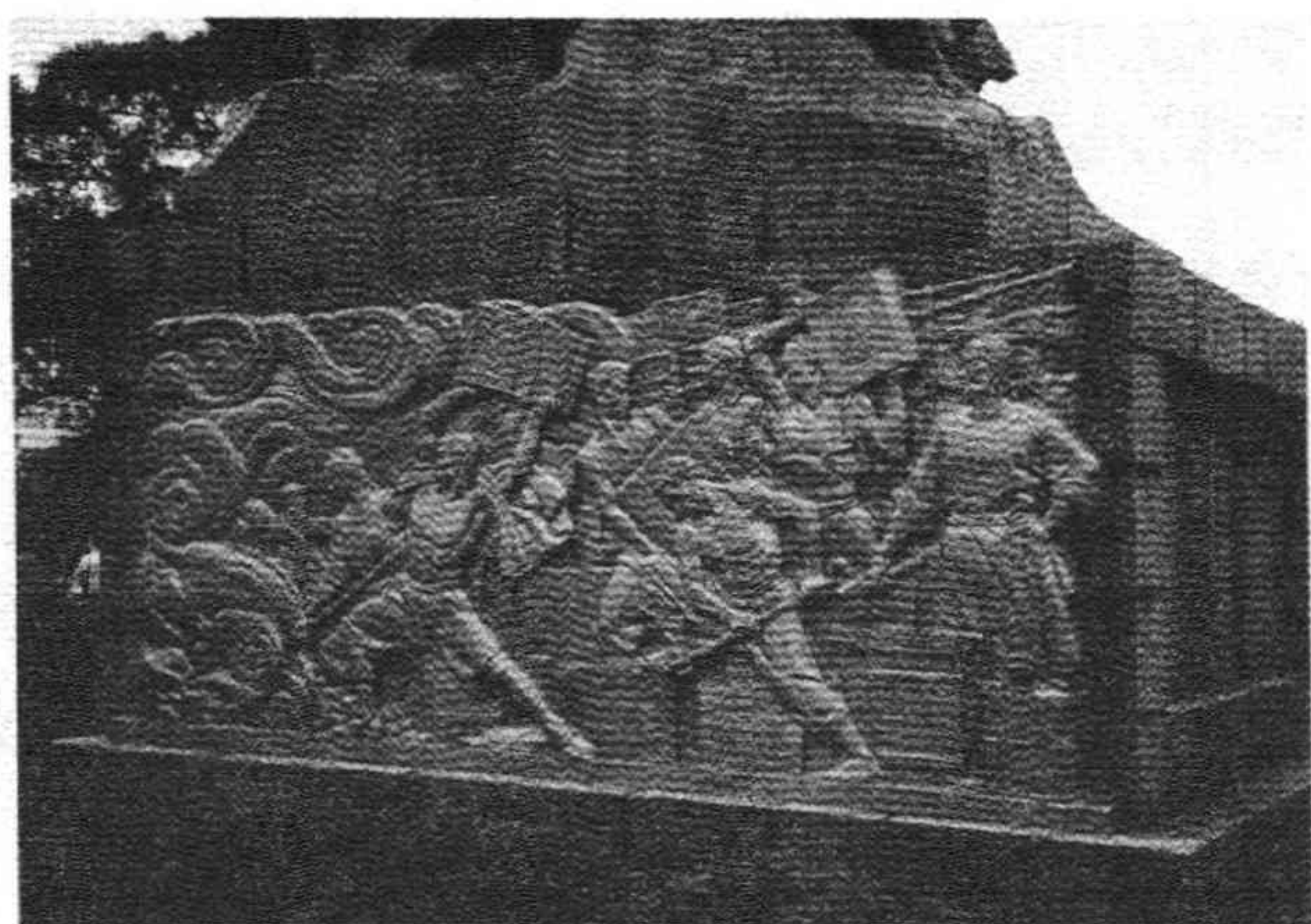
《穿鼻草約》：錯誤的割讓？

不少朋友也在史書中得知中國和英國間曾有《穿鼻草約》的協議。過去，不少史家都指出《穿鼻草約》是香港割讓的開始。事實上，這條草約從未簽訂，而且所割讓的地方亦只是香港島某部分地方，並非整個香港島。現在，讓大家重溫這段悲痛的香港割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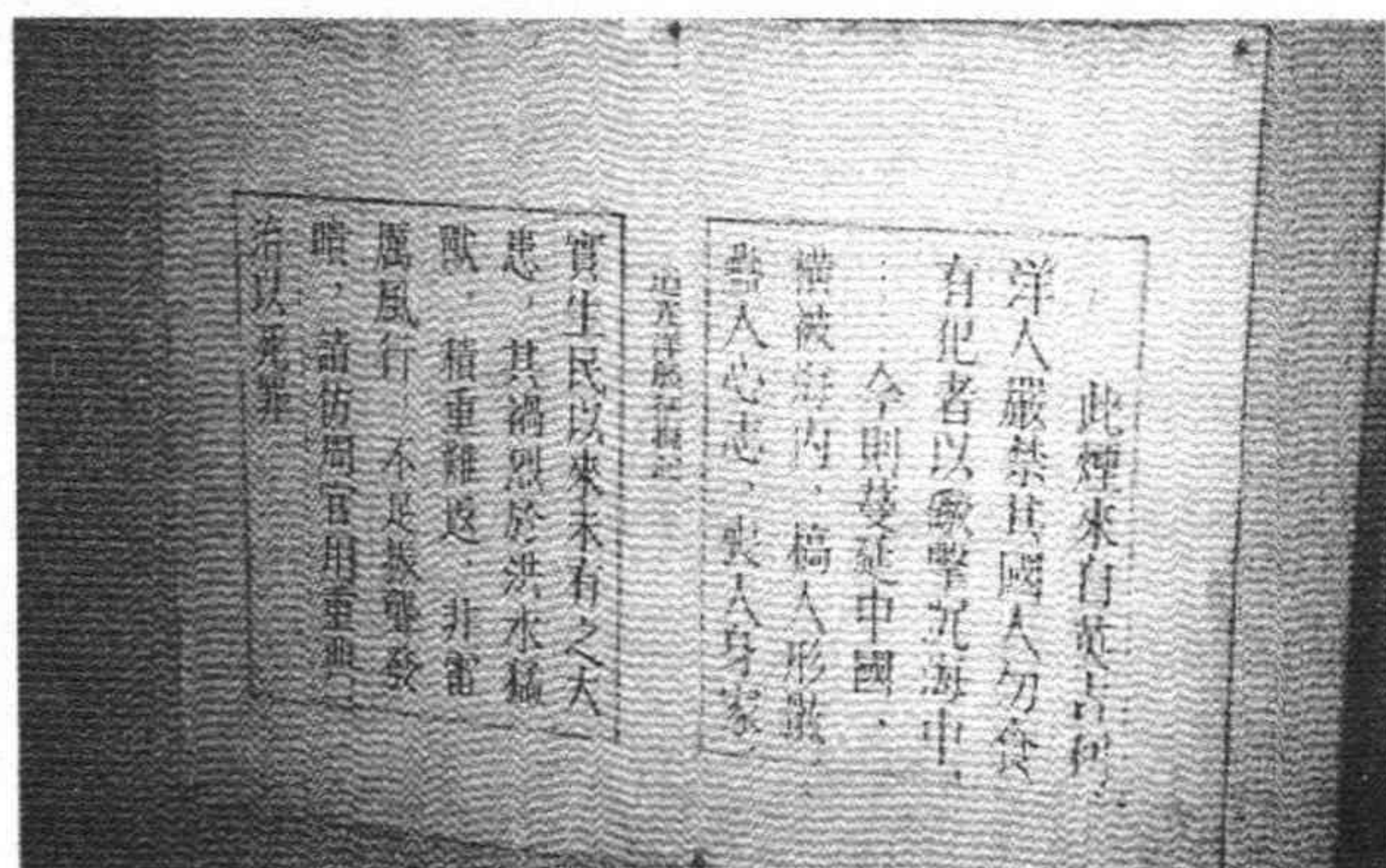
據史料考查得知，明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是英國船隻進入廣東地方的最早紀錄。英王查理一世派遣威代爾率領五艘商船進入虎門，提出貿易要求，但被明思宗所拒絕。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卡羅利那（Carolina）從澳門航行至大嶼山，並在該處停泊了兩個月，卡羅利那便成為第一艘來港的英國商船。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另一艘同屬東印度公司的船隻防衛號（Defense）曾停泊於澳門東面十五哩的地方，一些史學家認為該地可能是香港島。

鹵水生石灰燒鴉片

從這些史料得知，英國早在康熙年間對香港的情況略有所知。其時，英國商人來華貿易，主要是選購他們喜愛的中國茶葉。但由於英國商人沒有可用作交換商品，故不少英國商船運來大量墨西哥銀元，藉以換取中國茶葉。為改變貿易逆差，英



林則徐紀念館前紀念銷煙行動的石刻



關於鴉片事件的文稿，現藏於林則徐紀念館內。

商絞盡腦汁，最終想到「鴉片」。起初，鴉片本作洋藥進口，有鎮痛和止咳之效用。後來，鴉片成為毒品，不少國民染上毒癮。由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三年）至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間，白銀大量外流，多達二千多萬兩。

在此情況下，欽差大臣林則徐被道光皇帝派出南下查禁鴉

片。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則徐到達廣州後，隨即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相討禁煙事宜。於三月十八日，林則徐宣布所有外國商人均須在三天內將所有鴉片交出，並保證永遠不再輸入鴉片。否則，「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他更清楚表明「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

事實上，外商早已知道林則徐前來廣州禁煙的消息，故他們事先將鴉片躉船移至大嶼山南部。因此，當廣州禁煙事件發生後，香港便成為英國船隻的集中地，外商更在岸上建立居所。六月三日至六月二十五日期間，林則徐於虎門主持了銷煙行動。當時，虎門海灘被煙霧所籠罩，鹵水和生石灰把鴉片燬化成渣，並送出大海，半點不留。

同年七月，英國水手於九龍尖沙咀把村民林維喜殺死，但林則徐要求英國全權代表義律交出兇手時遭到拒絕。故此，所有英商被驅逐出境。然而，義律並不甘心，還攜同英商到停泊在尖沙咀海面的英船上。九月，義律向清廷索取食物時被清軍所拒，英軍繼而突襲九龍山上的清軍，史稱「九龍之戰」。十一月，英軍再侵襲官涌，但同樣遭清軍擊退。

於一八四零年二月，義律被英國政府正式任命為陸軍統帥。英軍再度攻打廣東，卻久攻不入，遂轉移北上向其他省份進行侵略。七月，浙江定海被英國主力軍進攻，最終定海淪陷，英軍登陸於舟山。當消息傳到北京後，道光皇帝龍顏大怒認為林則徐辦事不力，於是憤怒之下將其革職。

琦善到達廣州後，隨即把沿海地區的防守設備撤除。而另

一邊廂的義律卻步步進逼，親身前往虎門勘測地形，還向琦善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經雙方交涉後，只達成賠款六百萬元的協議，但琦善卻不敢答應割地的要求。十二月，義律一方面指揮英軍向珠江口內的穿鼻炮台進攻，另一方面則要求清廷開放定海、廈門和廣州三岸，以換取英軍撤出定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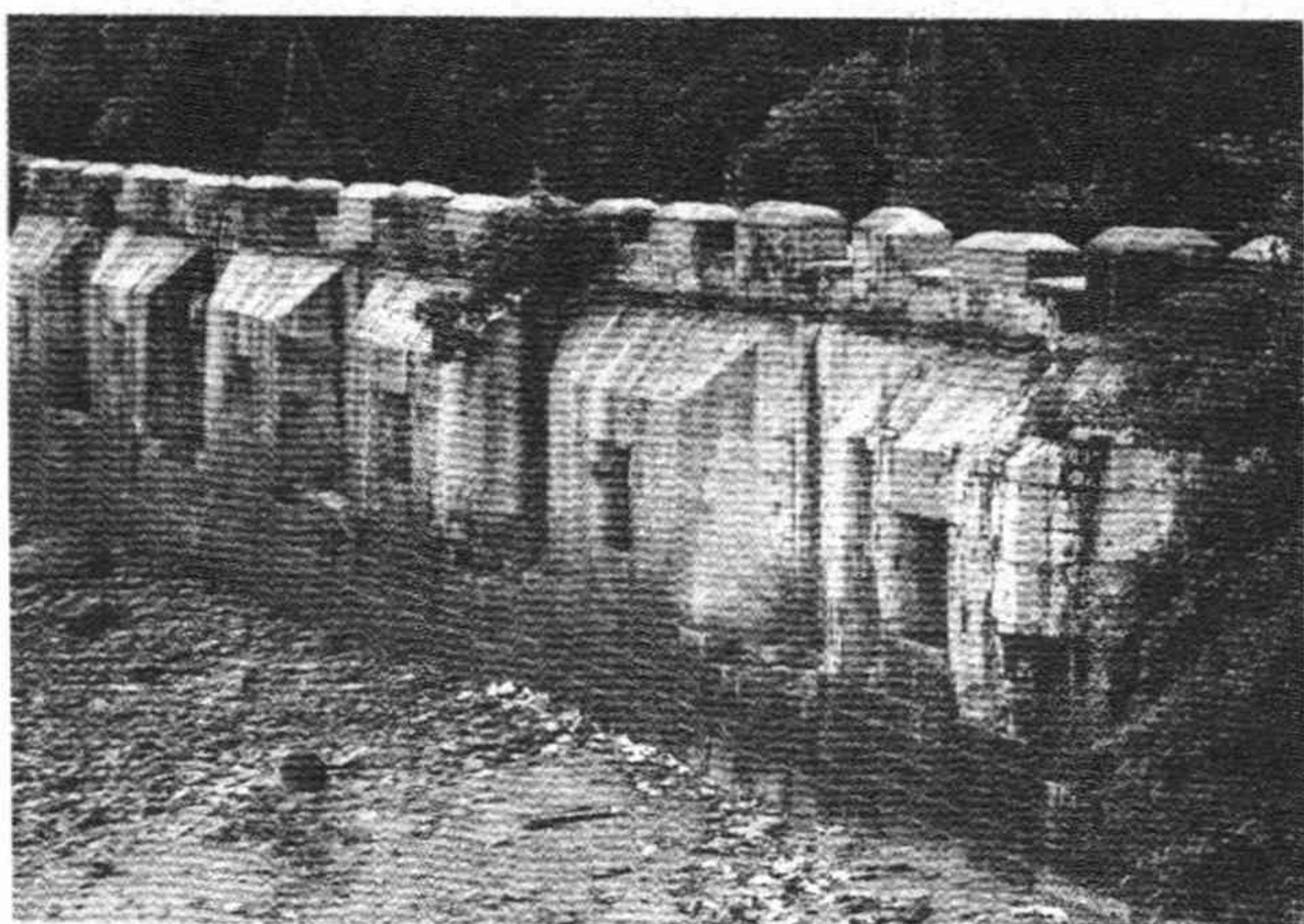
割香港仔變香港島

由於琦善對國際外交事務並不明瞭，故只懂用拖延方法。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虎門外的沙角炮台遭義律所攻陷。翌日，義律向琦善提出將已被英軍佔領的沙角一地，留給英人據守，並將沙角定為辦理所有貿易事務的地方。沙角位處廣東內陸，琦善認為道光皇帝一旦得知沙角被英人據守，定必大為不滿，更擔心遭皇帝斬首示眾，故他於一月十一日致函義律：「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琦善所指的「香港」，只是香港島的西南一隅（即今香港仔），因為當時「香港」一詞，並非全島的總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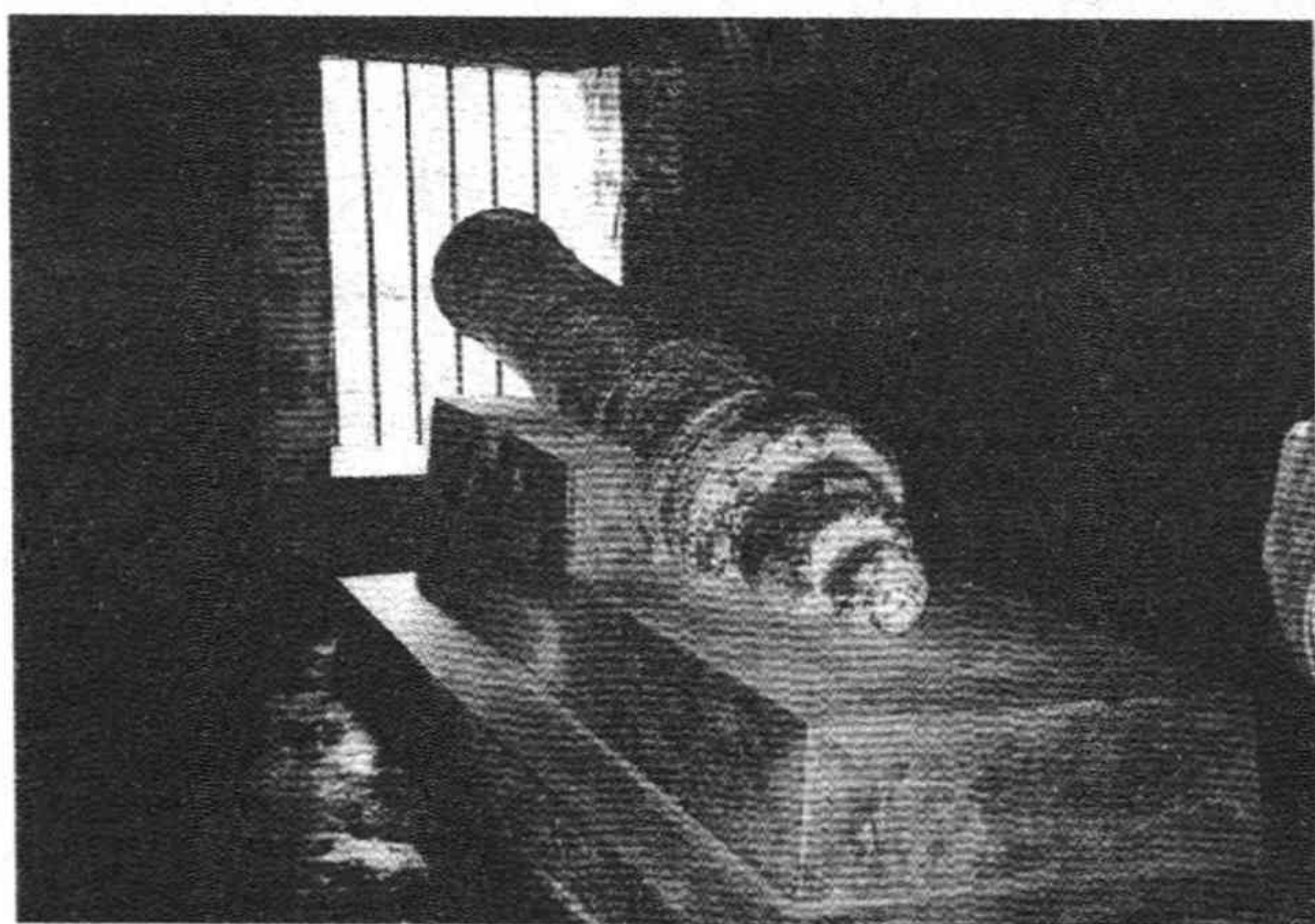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日，義律表示同意，並立刻歸還沙角。他更單方面發表公告：

「女皇陛下全權特使現在宣布與欽差大臣共同訂立了一項草議，其條款如下：

- （一）割讓香港島嶼和港口給英國君主。
- （二）向英國賠款六百萬銀元。
- （三）兩國之間實行平等的官方直接交往。」



威遠炮台外圍



威遠炮台

公布發表後五天，在艦長拜爾秋（Belcher）率領下，英艦琉璜號（Sulphur）船員於香港西北登陸。他憶述當時情況：

「星期一，上午八時十五分登陸，我們是第一批真實佔領者，我們便在領地上三呼萬歲，舉杯祝賀女皇陛下健康。」

英國人將此登陸地方稱為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即

今日上環水坑口街附近。今天，從水坑口街的英文名字 Possession Street 當中，可找到有關這段歷史的痕跡。

一月二十七日，義律和琦善在番禺蓮花山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義律取出其事先擬定的條約，內容與他單方面的公告相同。該次會議中，爭論點在於割讓香港全島或是香港仔的問題，他們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二月十日，他們又於穿鼻洋蛇灣舉行會議，該會議被稱為「穿鼻會議」。琦善再一次提出：「准令英吉利人前來廣州通商，並在新安縣屬之香港地方一處寄居。」但義律仍不同意，堅持要全島，故是次會議又無結果。

二月十三日，義律要求琦善在草約上蓋印。琦善道出：

「若現全島而論，東西約長五十里，南北約二十里。專就香港而論，東西約十里，南北約五里。……今該夷圖借全島，是其得隴望蜀，狡詐成性。」

此時，琦善已得悉自己因代英國要求在香港寄居一事，已被清廷革職，故他不肯簽訂該條草約。而此草約便成為一份空文。

同年五月十四日，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寫信抨擊義律：

「你和琦善之間不像簽署了割讓香港的正式條約，而且無論如何可以肯定，在你發布告示時，即使你有了琦善簽署的條約，它也是未經皇帝批准的。」

這條草約雖未蓋印，但已將割讓香港仔變為香港全島，簡直是歷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英國強佔香港

南京條約是割讓香港島的條約。條約簽訂後，香港便脫離母體。其實，鴉片戰爭仍未結束時，英國代表義律已帶領英軍強佔了香港島。當時，英國政府仍未滿足。外交大臣巴麥尊（Palmerston）認為義律所取得的賠償實在不足夠，故他致函向義律表示其將不能繼續保持在中國的職位。英國內閣於一八四一年四月三十日開會決議：

「必須要求中國政府對英國人過去所受的損失付出更大數目的賠款，並且對將來的貿易，作出更大的保證。義律大佐必須召回，並且派璞鼎查（Pottinger）前往代替。」

兵臨南京控制長江

另一方面，道光皇帝甚為憤怒，認為當時與英國洽談的代表琦善與英國協議，是喪權辱國的事，故把他即時革職，押返北京候審。其後，道光皇帝改派侄兒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及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共同率領湖北和湖南的綠營兵前往廣州與英軍作戰。中英雙方全面大戰即將爆發。

璞鼎查日夜趕路，終在一八四一年八月十日抵達澳門。他於八月十二日發布通告，表示不與廣東政府接觸，並繼續強佔香港島。八月二十日，他乘船到香港。翌日，璞鼎查親自率領三十七艘戰艦北上，佔領廈門，再度佔領定海，還侵佔了鎮海、寧波等地。其時適值英國內閣改選，新外交大臣阿伯利

(Aberdeen) 給予璞鼎查更大的決定權。

璞鼎查雖連番獲勝，卻始終缺乏援軍，於是他在—八四二年二月一日返港等候支援。六月，自印度前來的英國軍艦抵達中國。璞鼎查再度北上，指揮英軍攻打長江，並計劃下一步佔領南京，控制長江。八月四日，英軍已兵臨南京城下，而清軍再無餘力反抗，道光皇帝只好向英國求和停戰。

璞鼎查成首任港督

八月十二日，璞鼎查提出：

「讓地通商一端，大清必將香港地方讓與大英永遠據守。蓋大英之國體，既被大清之凌辱，理當讓地方以伏其罪，而補所傷之威儀也。」以「凌辱國體」的說法來迫使清廷割地賠款，可見其無理和野蠻！

—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代表耆英和伊里布來到停泊於南京江面的康沃利斯號（Cornwallis），與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該條約第三條是關於香港的：

「因大英商船遠運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英國由這天起便合法地統治已霸佔了一年多的香港。為表揚璞鼎查侵華的功績，他獲升為巴斯大十字最高級勳爵士（GCB）。後來，璞鼎查更成為香港第一任港督，展開了英國的殖民統治。

酗酒法官挑戰港督戴維斯

第一任港督璞鼎查，於一八四三年成立了香港法庭，而英國政府亦同時準備聘任法官來港主理法庭事務。可是，由於不少法官認為香港是個遙遠的孤島，且熱病猖獗，故把來港工作視為一件苦差，香港大法官一職因此而懸空多時。

自訂六個月年假

後來，英國政府殖民部官員以高薪三千英鎊聘請香港大法官，目的為了在香港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一八四四年五月，第一任法官休姆來港就職，但休姆為自己訂下了每年六個月的大假，結果一年內真正開庭審案只有半年時間，令不少案件長時期積壓。這事令當時香港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大為失望。

自一八四六年發生了甘頓事件後，大法官休姆和港督戴維斯之間的仇怨更深。甘頓是一位在廣東經商的英國商人，在一次交易時與中國商人發生衝突，雙方大打出手，不少貨物在混亂中被毀，造成數千元損失。事件發生後，甘頓被押至廣州領事館。在領事裁判權的規定下，香港法庭要對甘頓作出審判。

戴維斯認為甘頓確實違返了法律，應該受到懲罰入獄。然而，休姆卻持相反意見，只輕判甘頓罰款二百元了事。對於是次裁決，戴維斯大表不滿，更在交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指休姆缺乏作為一個法官的基本能力。



西環爹核士街街牌

受侮辱告上倫敦

後來，戴維斯和休姆的關係變得更加惡劣。在一次酒會中，愛好酗酒的休姆竟把襪子脫下，塞進戴維斯的鼻子中。戴維斯遭受如此侮辱後，怒髮衝冠，決定要將這個可惡的大法官趕走。因此，他隨即致函英國政府外交部，表示休姆是一位放縱的酒徒，經常爛醉如泥，缺乏擔任大法官的能力。

休姆與香港英商關係密切，戴維斯並不希望英國政府公開處理休姆的事。因為事件一旦遭洩漏，香港英商便會把戴維斯視為「眼中釘」，這將會對他日後推行政務構成不便。可是，英國政府並不明白戴維斯的苦衷，決定在香港舉行公開聽證會。戴維斯對於英國政府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終於在一八四七年七月辭職遠去。

三個月後，聽證會如期舉行。休姆結果被證實為一名酒徒，更屢次大醉。可惜，戴維斯已經離開香港了！

殖民政府的早年外交

一八四二年，清廷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條約內容除了割讓香港島外，還包括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以及廢棄公行制度。當時，百姓把英國視為仇敵，廣州居民更堅拒英國商人入城。

穗民衆拒「鬼子」入城

若要進一步擴展在華的勢力，英商必須進入廣州城通商貿易，而這個重任便落在第二任港督戴維斯身上。一八四五至四六年間，戴維斯曾多次與兩廣總督耆英和廣州知府劉潯商討入城日期。但此事洩漏後，廣州民衆大為憤怒，一起闖入劉潯的府第，將其朝服燒毀，並一致認為不可讓「鬼子」入城。耆英眼見民衆情緒激昂，隨即把劉潯辭退，還不答允英人入城的要求。

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戴維斯以六名英人於佛山一帶遭到襲擊為由，命駐港英軍攻佔虎門，進佔廣州城西的商館，還同時要求耆英訂立英人確實入城的時限。於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雙方終達成協議，英人得以在兩年後入城進行貿易。

同年五月，戴維斯企圖在廣州河南地區建立租界，於是在十八日及十九日在該區丈量土地，插旗劃界。當河南地區四十八鄉的村民得悉英人的舉動後，便齊集三千多人於四月二十

三日前往英國洋行商館與戴維斯進行交涉。但戴維斯卻不肯與村民正面交涉，此舉令村民更加憤怒，於是他們發表宣言，斥責戴維斯的行動。戴維斯知道租佔河南地區無望後，便撤退離去。兩年後，廣州群眾排外情緒仍然激烈，新任兩廣總督葉名琛採用拖延政策，故其時英人仍不得入城。

港督出使天京

廣西於一八四八年發生大旱災，當時出現了「屠人鬻於市」的悲慘情景，而一斤人肉只值數十文錢。後來，災荒連年，落第書生洪秀全認為時機成熟，遂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事，建號太平天國。

洪秀全拒見般咸

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太平軍還未攻佔南京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已提議香港第三任港督兼駐華公使般咸於太平天國起事後，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以索取更多利益。一八五三年初，太平軍自武漢順流向東進攻，江蘇官紳驚惶萬分，故江蘇巡撫楊文定通過上海道台吳健彰，向在上海的英國和法國領事提出增援的要求。

般咸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刻從香港趕赴上海，並下令英國軍艦齊集上海，準備對太平天國作出鎮壓。但太平軍行動迅速，已將南京佔領，還將南京改名為「天京」，而清軍則在長江流域全面崩潰，這迫使英國暫停以武力干預。為方便觀察形勢，英國唯有宣布中立。

一八五三年四月，太平天國建立天京剛一個多月，般咸已請求與天王洪秀全會面，但遭天王婉拒了。後來，般咸拜見了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他一方面表明英國不會干涉中國內

部事務，另一方面將《南京條約》的譯本交給太平天國，迫使天王承認清廷所簽定的條約。般咸更暗示若太平天國拒絕要求，可能會再次遭受如鴉片戰爭般的攻擊。太平天國將領並沒有因此而妥協，反而警告英國不要幫助清政府，否則太平天國將視英國為敵。般咸最終無功而還。

維持中立保利益

當般咸離開天京途經鎮江時，接到太平天國守將吳如孝及羅大綱的照會。於照會中，太平天國重申「清朝內毒生靈，外拒與國，天國將會惠外和中，商旅不禁，關市不徵。」可見英國的經濟利益不會受到影響。

在般咸交給外交部的報告中更清楚指出：

「我曾說他們（太平軍）已創立一種新宗教，可以稱之為一種偽造的啓示。這個宗教大概是以舊約和傳道小冊子為基礎。但他們已滲入迷信及謬誤成分於其中，足令一般毫無成見者懷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誠意，抑或只是幾個首領徒然利用其做為政治勢力之工具，借此盡惑衆教徒之心而望其矢忠不變。」

般咸對於太平天國雖然不滿，但認識到太平軍力量強大，清朝可能被推翻。因此，他向英國外交部報告：

「從任何角度看，中立是最佳辦法。因為若援助現在的政府，最後叛黨成功了，那麼我們在中國的地位就會極為狼狽。」

徐廣縉偽旨拒英人入穗

一八四零年，中英雙方進行大戰。這便是聞名中外的鴉片戰爭。兩年後，清廷戰敗，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條約容許英國人進入廣州城。可惜，清室卻一再拖延。第三任港督般咸上任後，隨即向兩廣總督徐廣縉要求履行前任港督戴維斯與耆英先前所訂兩年入城（廣州城）之約。但徐廣縉表示該約只是一時權宜之計，還以民情未協為由加以拒絕。般咸並未因此而罷休，更親自前往廣州和徐廣縉談判。

英要求履南京條約

般咸和徐廣縉於一八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在廣東省虎門東江的英國軍艦上進行談判，他們所探討的問題環繞在應否實現英人於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起入城的承諾。經過一番商討後，徐廣縉仍舊拒絕英人入城，但同意上奏請旨由道光皇帝裁決此事。

徐廣縉自虎門返回廣州後，立即上奏道光皇帝。他在奏疏中指出：「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表示此事的嚴重性。從《軍機處錄副奏》中得知，上奏日期是二月二十日。而從《隨手登記錄》中得知，發文速度是「四百里加急」。道光皇帝得悉後，隨即下旨「暫准入城」，還讓徐廣縉「酌量日期，暫令人城瞻仰。」

徐廣縉上奏後的第二天，般咸要求與徐廣縉會晤於虎門，並要求他在四月一日或以前回覆。二月二十七日，徐廣縉答允般咸在四月五日前對其要求作出回覆。

道光皇帝在三月十一日發出的諭旨於三月二十五日傳達廣州，但由於廣州民衆仍對洋人極爲怨恨，徐廣縉實不能按道光皇帝的諭旨來辦事。於是，徐廣縉在三月二十七日用「四百里加急」發出一份奏折，勸諫道光皇帝不可讓英人入城。到了四月十四日，奏折傳到道光皇帝的手中，經過深思後，皇帝最終也接納徐廣縉的意見。

聖旨未到先斬後奏

三月二十七日，徐廣縉上奏時，由於已十分接近回覆般咸的時限（四月五日），所以徐廣縉來不及等待道光帝的答覆。於是，徐廣縉在四月一日發出照會通知般咸：

「本月初八日（即三月三十日），恭奉大皇帝諭旨，以本大臣由驛馳奏貴國現議進城一節，諭以：『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今廣東百姓，既心齊志定，不願外國人進城，豈能遍貼謄黃，勉強曉諭。』」

因此，徐廣縉在道光皇帝還未回覆時，已正式通知般咸有關英人暫不可入城的消息。

一八六一年，美國史家諾德根據《籌辦夷務始末》中三月十一日的諭旨、四月十四日的奏折以及四月一日的照會，在互相引證後，推論出徐廣縉偽造聖旨宣布英人不可入城。若推論

無誤，英人不可入城便是由徐廣縉一手造成的。

四月四日及五日，般咸再次上書投訴。而徐廣縉見般咸只在帕函中表示不滿，並無用兵之意。到了四月六日，廣州商館貼出了告示：「布告各國夷商，現已罷議入城。」而英人入城問題一直拖延下去，這更成爲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之役爆發原因之一。

早期的司法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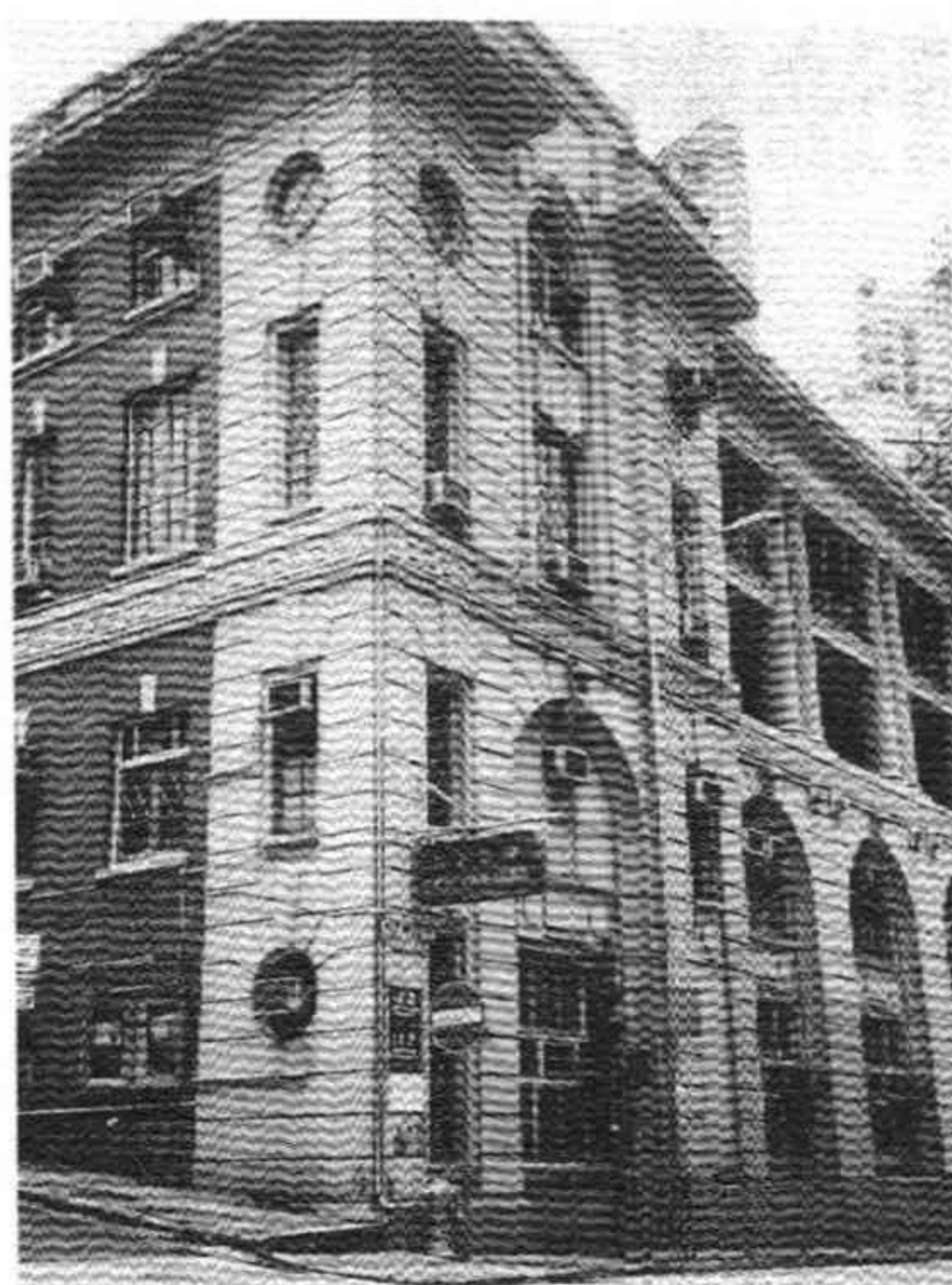
一八四一年一月，英軍攻佔香港後，隨即於二月初公布島上華人受英國官吏所保護，傳統風俗禮教一律依舊不變。而同年四月，英軍第二十六步兵團上尉威廉被義律委任為總巡理府一職兼任典獄長及警察長。一般華人案件由總巡理府負責審理，而重要的案件則由義律親自審理。由於威廉是一名軍人，並不瞭解法律精神，故刑罰的輕重只視乎其心情。

一八四三年一月四日，英國駐華司法院遷至香港，同時改名為香港法庭，香港殖民地時期司法制度的歷史便由這時開始。當時，香港法庭採用英國軍事法庭的司法形式，任何居民犯法，都會以軍法裁決。但這司法制度只是過渡性質，僅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

華人訴訟可用清例

一八四四年五月，英國政府派休姆法官來港主持法庭事務。首先，他公布了《司法機構條例》，廢除英國軍法，並實行新法。條例規定香港司法制度獨立，不受任何人士和團體干預。故當時港督亦放棄兼任裁判官一職，不能干預法院的裁判結果。另外，休姆宣布華人居民訴訟時仍可使用《大清律例》，以安定民心。

一八四四年十月，位於港島威靈頓街的高等法院已經成



中環警署外貌

立。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條例》，除了某些被認為不適用於香港的英國法律外，其餘都在香港使用。因為華人居民對英國法律程序並不認識，更不明白英國法律的精神意義，所以對於英式法庭在香港首次出現一事，表現十分驚訝。

香港當時的司法體系分為兩級：一級是裁判司署層面，而另一級是高等法院層面。前者屬於地方法庭，負責初級審訊。至於後者，則包括民事庭和刑事庭，負責審理裁判司署上繳的案件。一八四六年一月，政府設立了上訴機制。在此制下，任何對於高等法院裁判不滿的人士，可以向英國樞密院上訴。

隨着法院體制完備，與其相配合的檢察制度也逐漸建立起來。第一任律政司斯特林，於一八四四年七月來港籌組律政司署。當法院體系和檢察體系建立後，獨立的司法制度便得以逐漸形成。

英國覬覦九龍半島

香港島與九龍半島間的水域，是世界上罕見的天然深水港。這個港口面積達五千二百公頃，寬一千五百米至九千六百米，深二米至十四點五米。而南北兩岸山脈形成天然屏障，再配以狹窄的鯉魚門和汲水門入口，不論大小船隻，都能安全地往來和停泊。英國佔領了香港後，爲了完全控制這個條件優越的海港，便將九龍半島視爲下一個侵略目標。

尖沙咀宜作停泊處

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人已細心考察，認爲九龍最南端的尖沙咀是廣東沿海島嶼中最好的停泊處。林則徐亦曾經說：

「尖沙咀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島嶼又即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寬靜。英夷船已久欲依爲巢穴。」

義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率領英國艦隊突襲尖沙咀，史稱「九龍之戰」。英軍雖然最終被清軍所擊退，然而英國的野心並未因此而中止。一八四零年爆發了鴉片戰爭，英軍佔據沙角炮台。林則徐被撤職後，由琦善繼位，其主張與英軍妥協。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一日，義律和琦善就沙角炮台何時歸還一事進行談判。義律照會琦善：「今擬以尖沙咀、紅坎即香港等處，代替沙角予給。」可見義律認爲香港和九龍尖沙咀的重

要性遠比沙角爲高。

琦善撤兵不利清軍

一月十五日，琦善回覆義律：

「尖沙咀與香港，系屬兩處，本大臣爵閣部堂再三籌劃，雖地方所用較小，而實難奏請。」

琦善只願出讓香港一地。他曾經指出：

「尖沙咀新建炮台，設兵防守，非如香港之孤懸外洋可比。」

從中可得知尖沙咀遠較香港重要。爲了確保安全，義律在取得香港島後，便隨即要求琦善把尖沙咀一帶的駐軍撤退。結果，琦善因懾於英國的兵力，將尖沙咀軍防撤退至新安縣城。九龍半島因此兵力大減，這對清軍構成不利。

三月，駐港英軍暗中佔領了尖沙咀和官涌兩座炮台，後更將炮台拆毀，把石塊運回香港島作建屋之用。然而，由於英國政府認爲時機仍未成熟，故沒有正式肯定義律的軍事行動。

一八四四年五月，新任港督戴維斯上任後，發現英商於尖沙咀一帶建屋居住，隨即加以勸阻，更發出通告：

「獲悉有人未經許可在九龍半島建造永久性房舍，總督及行政局特告誡他們，這種舉動是沒有條約根據的。萬一中國政府動手驅逐他們，他們不能指望得到女皇陛下政府的支持和幫助。」

另外，他又致函清朝的欽差大臣耆英，表示英商在未經他

們允許和授權的情況下，於尖沙咀一帶建屋。

港島風大阻礙貿易

雖然英國政府對侵佔九龍採取不一致的態度，但不少英商和軍人都支持早日侵佔九龍。自抗英事件三元里事件發生後，英商暫不敢前往廣州經商，於是邀請廣東商人來港貿易，但他們都以香港島風浪太大為由加以拒絕，故此英商希望將貿易地方遷往九龍尖沙咀。至於軍人則認為，九龍的港口可在颱風季節作為船隻（包括軍艦）的避風港，而且九龍是香港島的天然屏障，可以確保香港島的安全。再者，九龍環境優美，地勢平坦，沒有香港島流行的熱病，十分適合陸軍駐守。

為避免其他國家佔領了九龍，英國商人和軍人都要求政府盡快採取軍事行動。由此可見，英國佔領香港後仍不滿足，更有侵佔九龍的野心，九龍已經岌岌可危了！

葉名琛堅拒修約要求

一八五四年，《南京條約》締約十二年剛屆滿。由於《中美望廈條約》及《中法黃埔條約》條文中有「十二年修約」的規定，英國駐華公使兼香港總督寶寧便援引最惠國待遇，聯同美國駐華公使麥連和法國駐華公使布爾有隆，一起向清廷提出修約的要求。英國駐華公使寶寧在修約內容所要求的，包括開放中國全境通商、把鴉片貿易合法化、廢除進口貨物關稅以及外國公使駐京等。

要求開放全境通商

四月，寶寧與法國及美國駐華公使致函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向其提出上述的要求。由於葉名琛不諳當時世界外交事務，故對他們的要求沒有作出任何回覆。直至六月，寶寧因等候多時還得不到葉名琛的回覆，於是便前往昆山向兩江總督怡良提出修約要求。怡良不敢貿貿然答應，故以「辦理外交事務應由兩廣總督葉名琛負責」為由，要求寶寧往廣州商討。

當咸豐皇帝得悉此事後，一方面稱讚怡良辦事恰當，另一方面指示葉名琛：

「仍遵前者，設法開導，諭以堅守成約，斷不容以十二年變通之說，亡有覬覦。」

八月，寶寧等人向葉名琛再次提出修約的要求，但他仍以

「拒接見，避回覆」的態度對待寶寧等人。葉名琛實際代表了清廷統治階層中的一班閉關保守派，如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及戶部尚書肅順等。這班閉關保守派擔心英國等國會乘機在太平天國起事後，以不同藉口入侵中國。

美遣中國通交涉不遂

寶寧在多次與清廷交涉不果後，於十月率領三千多名士兵北上大沽口，要求修約。但清廷此時仍不知事態嚴重，只派出低級官員長蘆鹽政文謙及前長蘆鹽政崇綸接見寶寧，然而他們再次要求寶寧重回廣東交涉。

此事令寶寧十分不滿，他於是進一步提出更苛刻的修約條文，並以戰爭作為威脅，強迫他們答應。但文謙不敢答允，而崇綸則主張答應部分條文。後來，文謙向咸豐皇帝表示：

「若竟一無所遂，必致羞忿而返，雖不敢據肆虐張，惟南氛未靖，儻再暗生詭計，辦理更為棘手。」

結果，咸豐皇只肯作出少許讓步，答應減免外商所欠的廣東茶稅和上海海關的關稅，至於其他要求一概拒絕。

中英大戰再次爆發

當寶寧得知其主要目標不能達到時，便建議英國政府出兵干涉，但英國和法國正忙於克里米亞戰爭，故無暇兼顧中國事務。而美國這時便成為修約的主角。一八五六年，由於《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十二年期已屆滿，美國政府遂

派出一位傳教士擔任公使來華，他便是著名的中國通——伯駕。伯駕到達香港後，便與寶寧策劃如何成功爭取修約。一八五六年五月，伯駕前往廣州向葉名琛提出修約的要求。及至七月，葉名琛依舊不肯答應修約。

經過多次要求修約均未能成功，加上克里米亞戰爭剛結束，英國政府決定以武力迫使清廷答允修約。同年十月，亞羅號事件挑起戰火，中英雙方爆發另一場大戰。

九龍本是租借並非割讓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廣東水師士兵接報得知有走私船隻進入中國，他們便立刻搜查一艘停泊在珠海的嫌疑船隻亞羅號（Arrow），還拘捕了船上十二名水手。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得悉此事後大怒，指出該船已在香港註冊，屬於英國船，所以廣東水師無權上船搜查。事實上，該船的註冊牌照早已過期。同時，巴夏禮還指責中國士兵上船調查期間曾扯毀船上的英國國旗，他更趁機與當時港督兼英國駐華公使寶寧向清廷發動戰爭。

英法聯軍攻佔廣州

十月二十二日，英海軍司令西摩率領大軍炮轟廣州。後更於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三日兩度攻入廣州，但因廣州軍民的反擊和英軍準備未足，英軍兩次都被迫撤退。

廣西西林縣在戰爭爆發前，發生了法國馬賴神父被殺的事件，故英法兩國便在一八五七年組成聯軍入侵中國。英法聯軍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攻佔廣州，並俘虜了兩廣總督葉名琛，而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皆投降。一八五八年一月，在以巴夏禮為首的三人委員會下，柏貴等人成為了傀儡政府，統治廣州歷時三年之久。

英法聯軍攻佔廣州後，繼續北上，更於五月佔領了大沽口

炮台，直逼天津。由於形勢危急，清廷立刻派出代表前往天津議和。終在六月與英法兩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而英法兩國根據條約獲得賠款、增加通商口岸等權益。

一八五九年，英法駐華公使前往北京與清廷換約，但兩國使者不願依從清廷所規定的路線進京。他們經由大沽口炮台入京時被拒，故英法聯軍於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向大沽口炮台進攻，但遭清軍重創，死傷者多達數百。

然而，英法兩國並未就此罷休，還於一八六零年二月再度發動戰爭。三月初，英國派出克靈頓將軍率領一萬多名援軍抵港，但由於這隊軍隊在香港島找不到營地，故登陸九龍半島尖沙咀駐紮。此時，巴夏禮乘機建議克靈頓和當時港督羅便臣向廣東租借尖沙咀，作為英軍的駐紮地。結果，他們擬定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

炮台以南年租五百兩

巴夏禮在三月二十日下午把文件交給勞崇光（柏貴於一八五九年死後，廣西巡撫勞崇光轉任廣東巡撫，後更升為兩廣總督。）英國以九龍半島治安不好，對香港島的安全構成威脅，令英國利益受損作為租借的理由。英國還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法：第一個方法是在九龍駐紮一支軍隊，用武力驅逐破壞九龍半島治安的人士出境，以穩定民生。第二個方法是由廣東在九龍半島上劃出一條界線，把界線以南的地方割讓給英國。但鑒於其時廣東當局並未有割地的權力，故在戰爭期間只好暫時以



界限街街牌

出租形式處理。

勞崇光對於英國的要求不敢不接納，故於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在英國擬定的文件上簽字，即在九龍半島劃一界線，把九龍炮台以南的地方以每年五百兩租借給英國。

九龍的悲劇——租借變割讓

一八六零年七月初，遠征軍成功租借九龍半島的消息傳到英國，為當地大小官員帶來意外驚喜，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好開始。英國大使額爾金來華時指出：

「巴夏禮已經獲得九龍半島的永租權，考慮到全部情況以後，認為有必要獲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

咸豐皇帝熱河避難

一八六零年八月，英國遠征軍攻陷大沽，佔領了天津。大軍繼而向北京進發，並於十月抵達北京西郊。十月十三日，天安門已失守。當時，咸豐皇帝已經由北京逃至熱河避難，北京只剩下親王奕訢掌管大局。

額爾金於十月十六日向奕訢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限期前簽訂《續增條約》和交換《天津條約》等。史載：

「以貴親王真便宜行事之權，於本月初十日（一八六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必將續約劃押、八年條約互換……否則咨會大將軍克日入京，將皇宮攻取。」

為了迫使奕訢盡快答允，額爾金更縱容部下搶奪當時著名的文化寶庫——圓明園。十月十八日及十九日，英軍更放火把圓明園燒毀。



圓明園遺址

奕訢無奈應允割地

事情到此地步，奕訢已無可選擇，只好屈服。額爾金認為此時是奪取九龍半島的好時機，於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即限期前最後一天，突然向奕訢要求增加「廣東九龍司地方，並歸英屬香港界內。」奕訢雖然面對這個不合理的要求，但在劣勢下被迫答允。事後，奕訢解釋：「惟其地與香港毗連，繫海口餘地，非內地要隘可比……臣等逐條籌思，雖諸多違疑，但關係大局，未便過於拘泥，因即允其敘入續約章程內。」事實上，他並無選擇的餘地。

一八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中英雙方簽訂《北京條約》，內文的第六款中載：

「前據本年二月二十八日（一八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交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大英駐紮粵

省暫充總局，正使功賜三等寶星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

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英國政府在九龍舉行接收九龍半島的儀式，額爾金、羅便臣和巴夏禮都有參加。儀式中，英國旗幟冉冉上升，禮炮響起，九龍半島便正式脫離中國的懷抱。

英國私吞深水埗

英國佔領了九龍半島後，內部曾經爲了如何使用這塊新增的土地而發生過長達數年的爭論。爭論過程中，主要分爲兩派，一派是英國軍方，另一派是香港政府。英軍方面認爲九龍半島問題最初是從軍事目的出發，故主張把土地全歸軍方管治，作爲駐防的軍事基地。而香港政府則認爲九龍半島從租借到割讓都是由香港政府直接策劃和安排，故主張土地應撥歸香港政府，作爲民用。

軍用與民用之爭

一八六零年四月，英國海軍司令公開發表聲明，在充分考慮英國政府的需要前，不要分配九龍半島任何土地作殖民之用。他還建議將九龍半島某些部分留給海軍和陸軍使用，其餘部分則留待同中國再次發生戰爭時，供接待部隊之用。當時，港督羅便臣強烈反對，在給英國殖民大臣紐卡斯爾的信中指出：「默許司令的建議，會使奪取九龍半島變得對本殖民地毫無意義。」

除了海軍渴望取得這塊美土外，陸軍亦不例外。一八六一年一月，英國陸軍司令格蘭特致函英國陸軍大臣帕爾，主張新佔的九龍土地由女皇政府保留，除非是將土地出租，否則一律不要出售給私人，而政府亦有權把土地隨時收回。他更指出未



深水埗警署外貌

來的軍營應設於九龍半島。港督羅便臣對此甚為不滿，於是再致函駁斥，認為若九龍的土地只是短期出租，任何人都不會修建堅固長久的建築物，格蘭特的建議無非只想將土地留歸軍隊使用。其後，港督羅便臣重申《北京條約》規定了九龍半島是歸屬香港殖民地。

私自擴界並無知會

為了平息英國軍方和香港政府的衝突，英國政府安排英國陸軍代表派曼（C. F. Mann）、英國海軍代表博萊斯（J. Borlace）及香港政府代表克萊弗利（Ch. St. G. Cleverly）三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提交一份九龍半島土地使用的方案。可是，他們最終亦未能一致達成共識。

當時，九龍半島的市民完全沒有發言權，不能發表他們的意見。一八六四年，爭論仍未結束，英國最終用了一個不合情

理的方法來平息此事。英國於同年三月，在九龍半島南部私自擴界，將其伸展至西北部的深水埗。這次移界，英國並沒有通知中國，更未獲中國同意。英國政府將原本的土地分給香港政府和英國海軍，而將新增的土地則分給英國陸軍，但規定英國陸軍在必要時才可使用。英國軍方和香港政府雙方各得所需後，爭論始告結束。

罷市反英顯愛國

英法聯軍之役期間，不少愛國的香港市民對於英國的舉動感到十分憤怒。不少市民更離港返鄉，還在各處張貼海報，號召其他居民加入離港行列，以示不滿。在此惡劣情況下，政府更頒布了《華人屋宇及妨害公安條例》，對華人居民屋宇窗口間隔作出規定。這條條例的規定，本是出於衛生上的考慮。但在戰爭期間，市民卻認為這條例是對他們的一大歧視。

英人吃砒霜麵包中毒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華人市民團結一致，決定在翌日舉行全港罷市，以示抗議。翌日，華人商店皆停止營業，市面上秩序大亂，政府更調動軍隊鎮壓。最後，政府與華人妥協，接受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制止苛索勒詐、修改公安條例、不得使用私刑毆打和污辱犯人等。

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五日，四百多名英國人吃了由裕盛辦館提供的麵包後嘔吐不止。政府隨即派出醫療專家進行化驗，證實麵包內含有大量的砒霜。由於當時不少麵包商憤恨英國的侵略行為，均罷市停工，只有裕盛辦館繼續包辦英國人的膳食。警方後來將裕盛辦館的店長張亞霖和其他員工拘捕，但因缺乏充分證據，被捕者最終也獲釋。此事發生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

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英國商船皇后號由澳門駛往香港途中，十多名乘客要求歐籍船員將船駛入內河，反抗的船員遭即場殺死。後來，皇后號船長被迫將船駛往佛山附近的青霞村河面，船上的鴉片被運往山邊燒毀。

晚上八時實行宵禁

在香港的英國人，這時期的日子真不好過。從當時舉人陳芝廷致兄長的書函中，便可得知當時英國人生活的苦況：

「看來英夷非常小心，夜間定時打炮以維持士氣。汽船及其他船隻，大小不一，共二十艘，日夜巡邏不絕，每一家洋行，都有夷兵守街，一到薄暮，即準備大炮以為防衛。警察以十八人為一隊，出巡各街道，巡至認為危險地帶，即集合更多的人數，先行放槍，才敢前進。」

在這時期，政府定時在夜間放炮，以示威權。政府更在深夜時分派出警察在各大小街道巡邏，防止叛亂。政府先前所訂立的宵禁時間則不斷推前，由十一時改至十時、九時，最終更改至八時。雖然香港市民始終不能在英國和法國侵略中國的事情上有任何作為，但亦向英國政府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精神。

村民誤殺流氓獲特赦

不少朋友也知道第一任港督是誰，但對於其餘港督卻不太知曉。以下的《首八位港督小歌》，希望有助大家認識首八位港督所施行的主要政策：

「砵甸乍詐取香港，戴維斯統計人口，般咸北上探天王，寶寧大審麵包案，大羅便臣取九龍，麥當奴以賭制賭，堅尼地改善治安，軒尼詩廢除酷刑。」

事緣馬頭圍村命案

在以上港督的名字中，最常被大家提及的可能是堅尼地，因為港島有堅尼地城區。至於其他港督的名字，則多出現於街道上，如寶寧道和般咸道等。在堅尼地管治香港期間，曾發生不少大案，其中以鍾亞二案最為著名。這案可與近年的張子強案相比，兩者皆成為城中熱門話題。

當時，九龍馬頭圍村曾發生一宗打鬥命案。一天，流氓鍾亞二進入馬頭圍村，調戲村婦，結果引起村民公憤，他最後更活生生地被村民打死。馬頭圍村是馮姓聚居的地方，在此案發生後，四名馮姓男子被警方拘捕。

一八七四年三月，香港法庭開審此案。經過多番聆訊後，法官最終裁定四名馮姓村民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當市民大眾得悉此判決後，皆感到驚訝萬分。他們認為馮姓村民只是保

護婦女而誤殺他人，並非故意謀殺，故不應判以死刑。而陪審員亦認為鍾亞二之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本身行為不當所致，馮姓村民將其殺死，應按過失傷人罪判決，故此陪審團要求港督從輕發落。

堅尼地首頒特赦令

後來，堅尼地對案情經過一番審慎查閱後，表示同意陪審員之看法，決定將這四名馮姓村民改判為終身監禁。堅尼地後更行使特赦權，頒布特赦令，將四位馮姓村民釋放。

當時，不少英國士紳都認為堅尼地的做法是嘩眾之舉。他們指出華人是次等公民，故身為港督的堅尼地，絕不應在次等公民身上濫用特赦令。但另一方面，華人則認為堅尼地是一位明白事理、深明大義的港督。

由此可見，堅尼地在聽取多方意見後，終能作出英明的決定。這個歷史經驗，使統治者明白到一意孤行是難得民心的，更難有善政的道理，這實值得當今統治者作為借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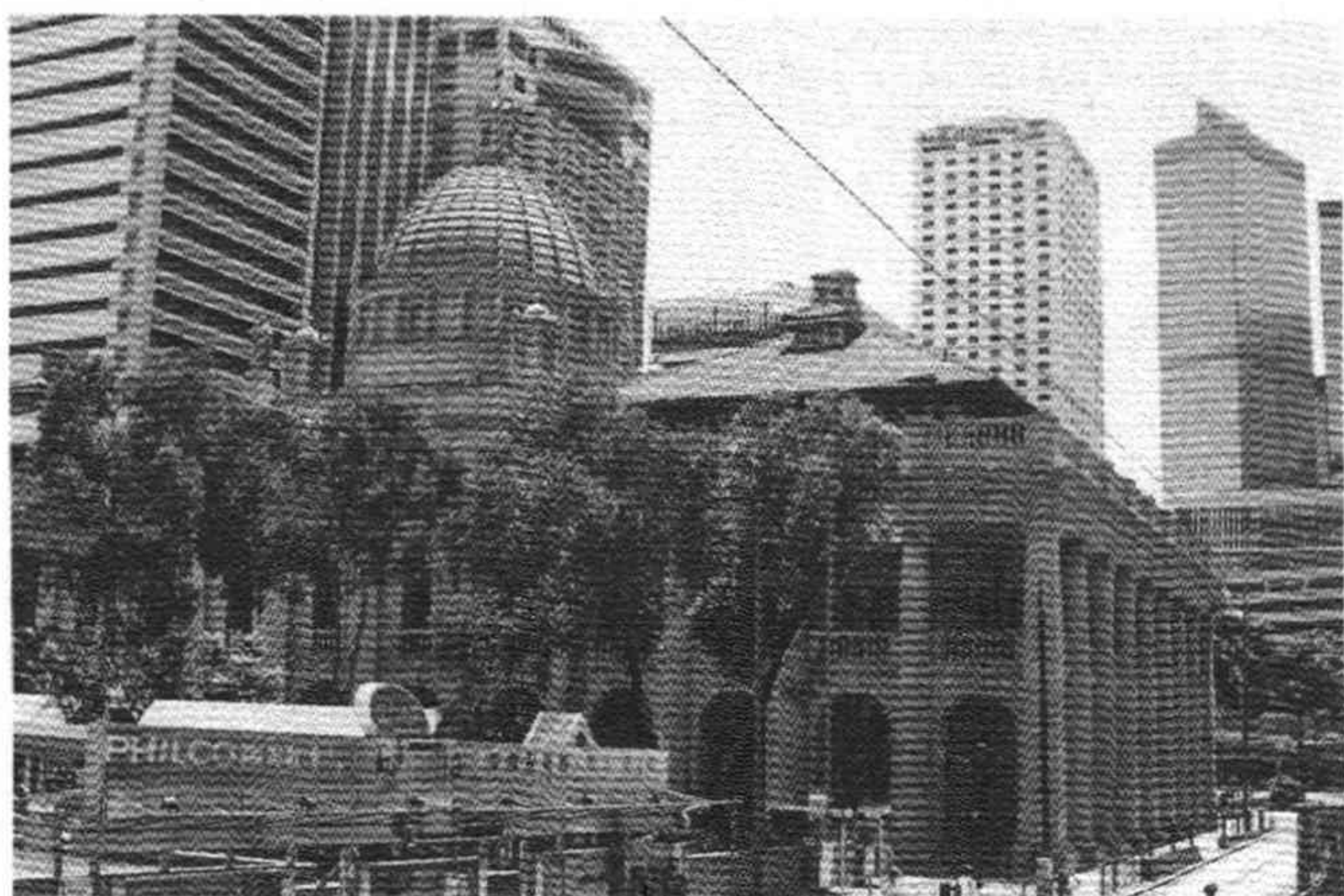
百多年前的立法局大變革

第九任港督寶雲曾被稱為香港政制改革的始祖。為了令香港政治更開放，寶雲上任後不久便改組立法局。其時，香港第一位華人立法議員伍廷芳計劃返回中國加入洋務派，於是向政府提出辭職請求。最終，英國政府接受了他的請求，但仍表示希望在立法局中保留華人席位。

當寶雲得知英國政府的意向後，便把握時機，於一八八三年四月四日，向英國殖民地部提出改組香港立法局，增加議員人數。他指出一個健全的立法局，議員的數目不可太少。他提議立法局的官守議員由五人增加至八人，而非官守議員則由兩人增至六人。非官守議員任期為六年，當中兩位由商界代表擔任，餘下的則由港督委任。但規定在這六名非官守議員中，最少要包括一位華籍人士。（詳見下表）

	原有席位	新建議席位
官守議員	五人	八人
非官守議員	兩人	六人（內有兩位商界代表）

英國政府聽取多方意見後，終決定採納寶雲的建議，但就認為在非官守議員人數上，仍以五名為佳，這是因為英國政府殖民地部覺得立法局中有一位華人代表已經足夠。另外，為了防止華、洋間產生的糾紛，英國政府將兩名商人代表減至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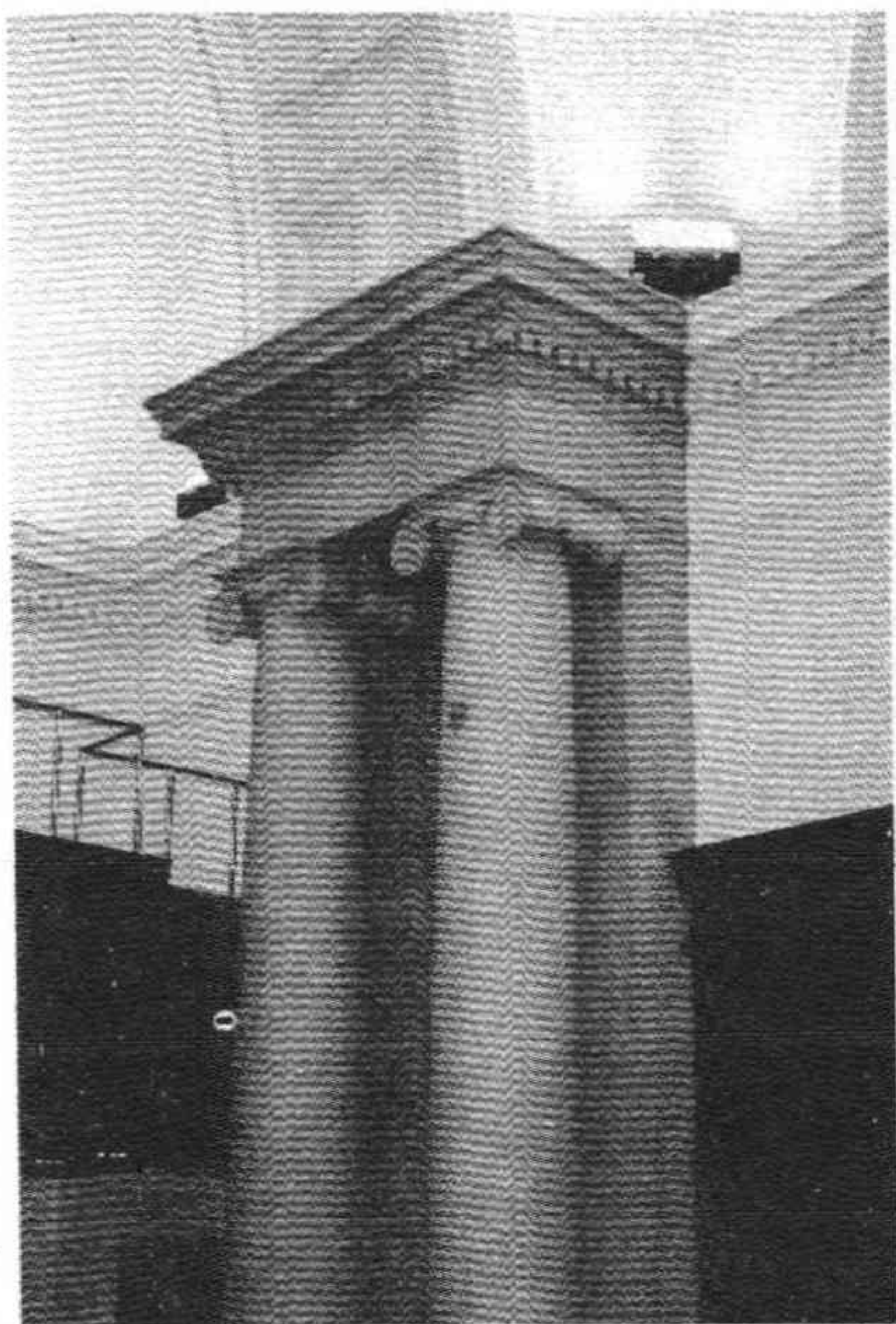


現時立法會大樓外貌

黃勝任法律委員

新組成的立法局於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五名新當選的非官守議員分別為匯豐銀行總經理、怡和洋行總經理、端納洋行總經理、沙遜洋行總經理及香港商會代表。除了他們外，還有一名華籍非官守議員，他便是黃勝。由此可見，商人代表在立法局仍佔多數席位，平民百姓的聲音始終未能充分表達。

當第一次會議召開後，寶雲又在其內部進行重組。過往立法局僅設有一個財政委員會，以協助港督管理香港的財務。為了進一步加強香港的法律秩序建設，協調勞資雙方的關係，解決一些下層居民的實際問題，寶雲在保留財政委員會之餘，還增設了工務委員會及法律委員會。在法律委員會的五位成員中，黃勝便是其中之一。這樣的安排，令在港華人的一些意願



立法會內部建築一隅

得以迅速反映。故此，不論歐籍人士還是華人社團，都認為寶雲對立法局進行改組的行動，是他任職期間最成功之處。

海獅候命吞噬新界

一八九零年，香港第十任總督德輔（William Des Voeux）向殖民地部報告：「有傳言清政府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砲台，俯視殖民地。」殖民地大臣收到他的報告後，隨即派出英國駐華公使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詢。清政府其後回覆：「中國並非修砲台，這只是鐵路工程。」

商人遮打促拓邊界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中日雙方在朝鮮爆發大戰。一年後，勝負漸趨明朗，清政府開始產生向日本求和之意。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乘時向英國殖民地部提出拓展香港殖民地邊界的詳細方案。他指維多利亞港東西兩面的入口，即鯉魚門和青洲，以及九龍城一帶均屬於中國。一旦中英雙方交戰，中國或另一個國家，便能輕易地從珠江北岸或鯉魚門外的大鵬灣登陸，南下九龍半島，這不僅能攻擊英軍，還易於在中國領土上砲轟維多利亞港，並且截斷香港的糧食供應。故此，羅使臣爲了香港的安全，建議香港的邊界應拓展至大鵬灣到深圳灣一帶，包括橫瀾島、大嶼山和所有香港三英哩以內的海島。

數天後，羅便臣進一步向殖民地部施加壓力，把香港商人遮打（C. P. Chater）的一封信轉呈殖民地部。遮打指出應趁清政

府在甲午戰爭失敗之際，提出拓展香港殖民地邊界的要求。他在信中表示：

「目前正是向內外交困的清王朝提出展拓香港殖民地的邊界、攫取整個九龍半島的最理想的時候，機不可失。中國的國力現正處於最低點，但聯繫到日本的進步，五十年後，也許十年後，中國可能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開發她的自然資源。那時候，如果香港邊界仍像現在一樣，中國的艦隊停泊在九龍灣，周圍的山嶺和島嶼都為中國所有，我們往哪裏躲。」

英國海陸軍聯合防務委員會於一八九五年五月，發表了一份關於殖民地香港邊界問題的報告，報告從所謂的軍事角度出發，公開地提出調整香港邊界的要求。報告內容重申，爲了確保香港安全，除了要完全控制香港島及大陸之間的水域外，還有必要控制其南面和北面的海岸。南面的海岸目前已由英國掌握，北面的海岸仍然由中國管理，應該盡快將其奪回。

民間侵略野心盡現

除了香港政府和英國軍隊外，英國商人也積極地侵吞九龍以北的土地。一八九五年八月，福建古田發生教案，英國傳教士死傷衆多。英國商人認爲這教案是英國向清政府提出拓展邊界的藉口。同年九月，遮打代表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香港總商會的支持下，再度致函予羅便臣，重申拓展邊界對香港的重要性。後來，該會代表團更親自前往英國，拜見首相索爾茲



梳士巴利道是以英國首相索爾茲伯來命名的

伯里（Lord Salisbury），正式向英國政府提出拓展香港邊界的要求。

面對香港政府、軍方和商界的請求，英國政府保持沉默，不置可否。英國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已經確立了在西方列強中的霸主地位。其對華貿易額遙遙領先於別國，長期把持着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等要職。對於西方各國在中國獲取的權益，英國又通過最惠國待遇而從中獲益。故維持目前現狀已成為英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內容。結果，英國政府暫不作回應，但民間侵略的野心卻盡現。

新界誕生記

一八九四年，日本與中國爆發甲午戰爭。當時，港督羅便臣上書英國政府，建議趁甲午戰爭擴大對中國領土的佔領。羅便臣曾說：「我不得不鄭重指出，調整和擴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他認為香港邊界應該擴展至大鵬灣，從那兒再延伸到後海灣。而橫瀾、加普礁、大嶼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內的海島，均應割讓予英國。不然的話，一旦戰爭在香港爆發，英軍便難以防守。

九龍城仍歸華管轄

一八九五年，中國戰敗，中日雙方簽訂了馬關條約，各國開始對中國虎視眈眈。馬關條約簽訂後二十多天，英國海陸軍聯合委員會便發表了《關於殖民地香港邊界問題的報告》，提出為確保香港的安全，有必要對香港邊界作出調整和擴展。它除了需要完全控制香港島與大陸之間的水面外，還要控制港島南面和北面的海岸，此報告隨即獲得英國海陸軍大臣的同意。

德國、法國及俄國三國成功阻止日本奪得遼東半島，故三國常恃功在華迅速發展權益。而英國本土和香港各界的侵華輿論亦同時不斷增加。英國政府在這情況下立即照會清廷，向清廷提出以租借威海衛的方式來平衡在北方的均勢。清廷不敢拒絕英國政府的要求，但就附加一項條件，懇求英方在租借威海

衛後不要再提出新領土要求。結果，英方照常租借威海衛，但不理會附加條件。而英國政府卻訓令其駐華公使寶納樂（Claude Macdonald）要把界址擴大，所有從深水灣到大鵬灣沿線以南的土地，包括兩灣間的水面和靠近的島嶼，都被列入擴界範圍之內，這都是爲了陸海防衛而設。

一八九八年四月，中法換文租借廣州灣，寶納樂奉命與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進行交涉，其指出英國議院本企圖在浙江的舟山及福建一帶佔領口岸，但因念着中國情勢危急，故只就原有之香港，拓展界址。中英雙方於四月二十八日舉行談判，清政府答應由英方起草協議，但提出英方須繳付租金，以保留使用九龍城碼頭的權利，而九龍城仍歸中國管轄等作爲附加條件。

訂約租借九十九年

六月九日，李鴻章在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該條約全文內容如下：

「溯查多年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爲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再行劃定，以九十九年爲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

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建築砲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受，此約應於畫押後，自陰曆五月十三日即西曆七月一號開辦施行。其批准文據，應在英國京城速行互換，為此兩國大臣將此專條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由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新界一地便誕生。當時的新界，是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以及附近的二百三十多個的島嶼，包括大鵬灣、深圳灣在內，其總面積達九百多平方公里。中英雙方議定租期為九十九年，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止。

鄧氏村民臭蛋「宴」英軍

現在，大家向銀行借貸，也要付利息。但英國租借新界地區，卻不用一分一毫。英國人這次强行租借的舉動，在進駐新界時曾與村民發生過不少衝突。

遣陸戰隊強入吉慶圍

英國人租借前的新界與英國人佔領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情況大為不同。在香港、九龍、新界三地中，歷史文化最悠久的是新界。宋朝末年起，本地居民和內地移民不斷開發新界。於英國租借新界時，該地已有四百多條村莊，人口多達十萬。新界居民世世代代已在此地耕耘和生活，故當他們得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感到非常憤怒。當時史籍對此有這樣的記載：

「新安民風強悍，租界內村莊不下萬戶。食毛踐土，二百餘年，一旦聞租與英國管轄，民風強悍，咸懷義憤，不屬歸英管。」

根據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條約開始施行的日期是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但英國人正式接管時間卻延遲了九個月，關鍵原因在於英人懾於新界居民的反抗。一八九八年七月，英軍進入新界進行實地考察時，首先遭到錦田鄧氏村民的反抗。當時，鄧氏村民聚集在村口，以臭雞蛋來對付英軍。後

來，香港政府輔政司駱克（Stewart Lockhart）決定派遣七十五名英國海軍陸戰隊，強行進入錦田村吉慶圍。同時，駱克迫使新安知縣盧煥把新界的田土登記註冊簿交出，藉此掌握英人接管新界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地理及文化等第一手資料。再者，駱克收買了一些喪失民族氣節的鄉紳，為他提供情報，以了解當時新界居民反抗行動的最新動態。

英國強借新界不付租

最後，英國終於宣布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九日簽署《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合同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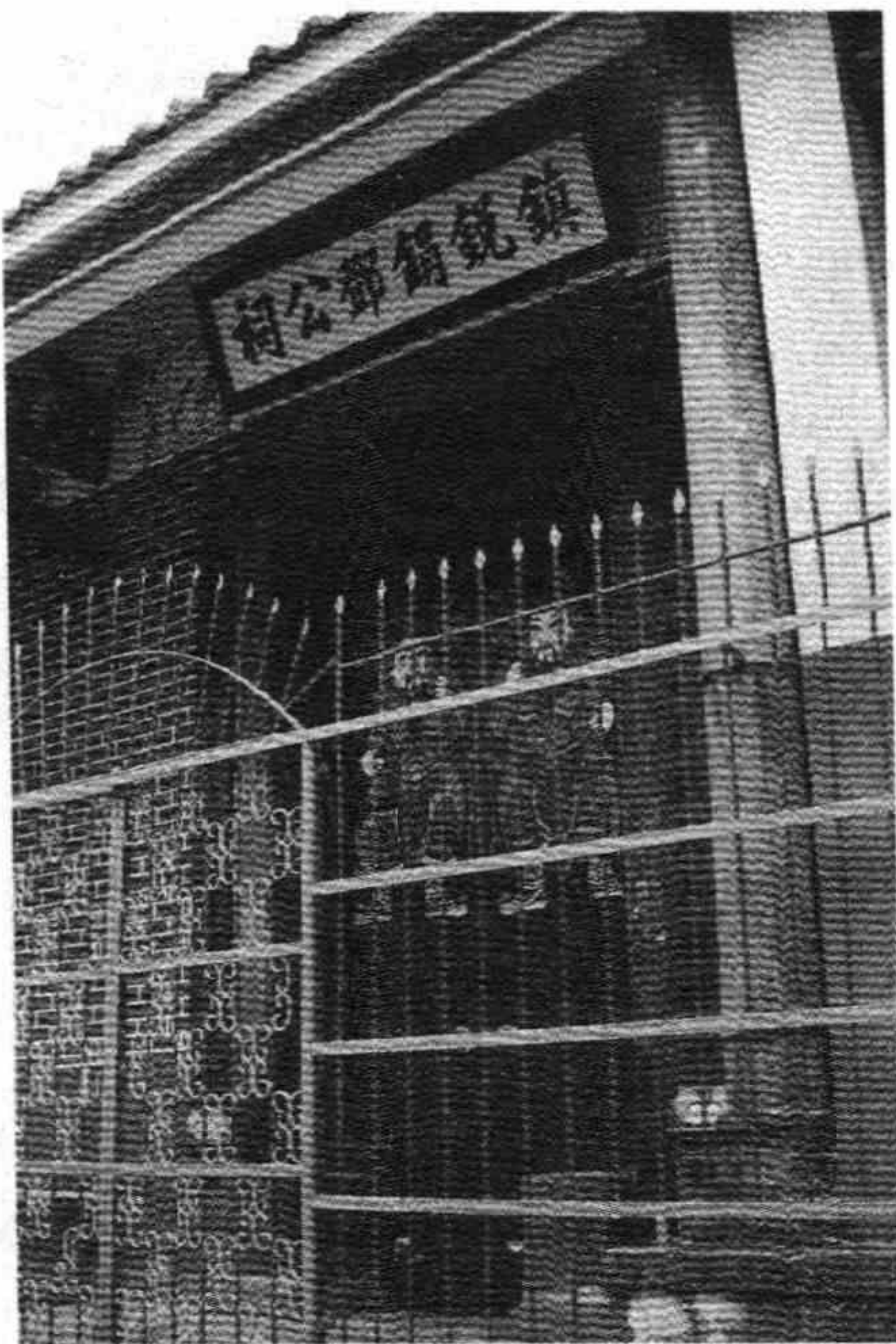
「北界始於大鵬灣，英國東經線114度30分，潮漲能到處，由陸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樁，接近沙頭角（即土名桐蕪墟）之西，再入內地不遠，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線，右界田地，東立一木樁，此道全歸英界，任由兩國人民往來。

由此道至桐蕪墟斜角處，又立一木樁，直至目下涸乾之寬河，以河底之中線為界線，河左岸上地方歸中國界，河右岸上地方歸英界。

沿河底之線直到逕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樁於該河與大道接壤處，此道全歸英界，任兩國人民往來。此道上至一崎嶇山徑，橫跨該河，復重跨該河，水面不拘歸英歸華，兩國人民均可享用此道。

經過山峽約較海平線高五百尺，為沙頭角與深圳村分界之線，此處復立一木樁。此道由山峽起，即為英界之界線，歸英

國管轄，仍准兩國人民往來此道。下至山峽右邊，道左有一水路，達至逕肚村，在山峽之麓，此道跨一水線，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約距百碼，復跨該水路，右經逕肚村，抵深圳河，約距逕肚村一英里之四分之一，及至此處，此道歸入英界，仍准兩國人民往來。



鎮銳銅鄧公祠外貌

由梧桐山流出水路之水，兩國農人均可享用。復立木樁於此道盡處，作為界線，沿深圳河北岸下，至深圳灣界線之南，河地均歸英界內。其東西南二面界線，均如專約所載。大嶼山島全歸界內，大鵬、深圳兩灣之水，亦歸租界之內。」

租金方面，英國曾在會談時表示可於日後商討。清政府代表王存善於勘界時提出此事，而駱克只回答：

「我不知道。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德國政府償付租金嗎？俄國政府的旅順呢？」

最後，租金之事不了了之。

三不管地區——九龍寨城

現在，九龍城已成為九龍寨城公園。其實，英國租借新界後，進駐九龍城一度成為主要關鍵問題。一八八九年四月，當新界居民反抗英國的活動沒有停止之時，英軍認為這是要求中國軍隊撤出九龍城的最佳時機。英軍可以藉口指駐紮在九龍城的中國軍隊參與新界的抗英行動。

當時，港督卜力奉英國政府之命，指示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於明天出兵攻擊九龍城。翌日，英國皇家威爾斯火槍隊以及香港志願隊幾百名士兵對九龍寨城進行攻擊。清兵最終戰敗，百多名平民被驅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五月二十二日發出一份緊急電報予英國外交部，抗議英國出兵攻擊九龍城的行動，指英軍違反了中英所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要求英國



寨城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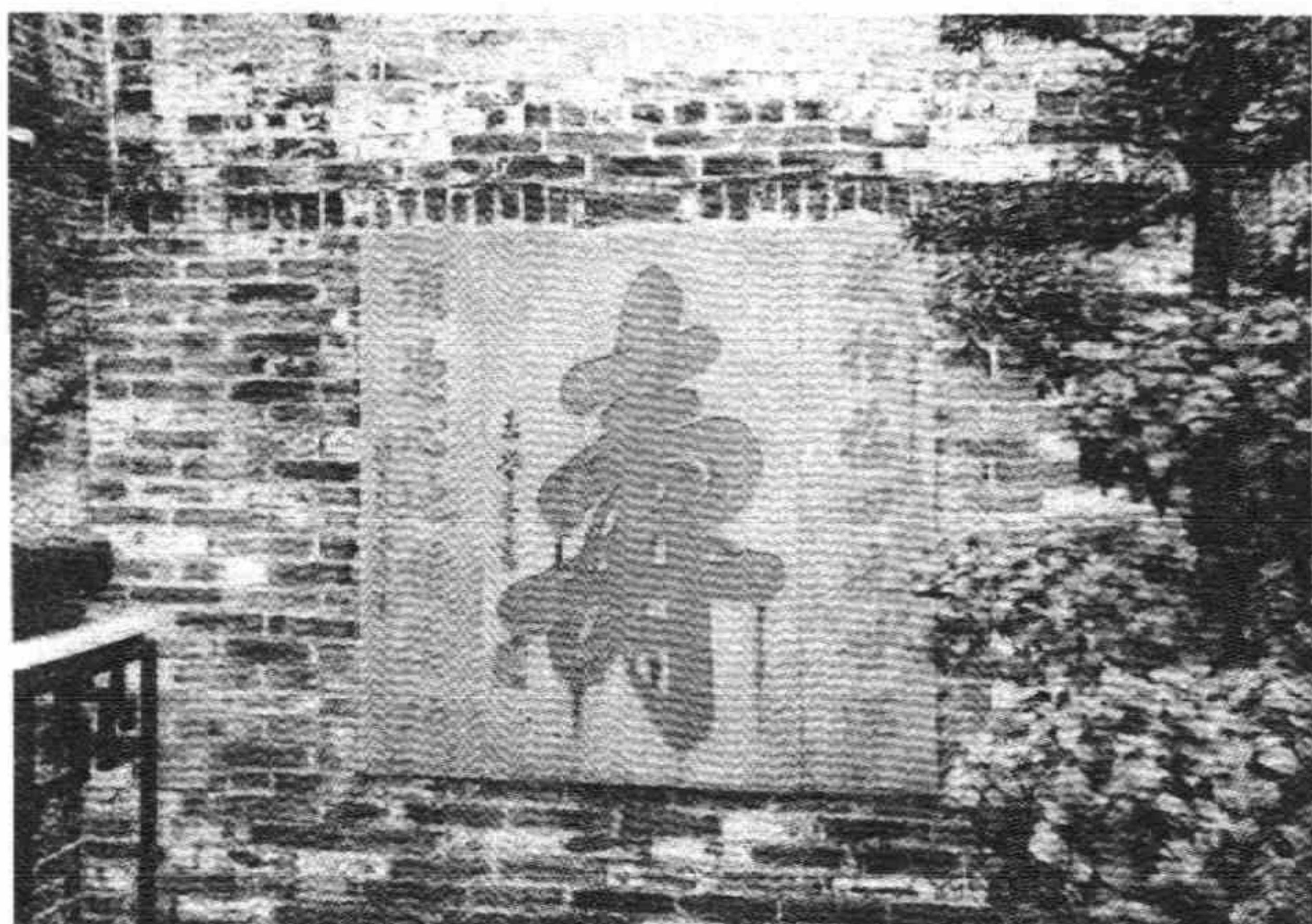
政府立刻下令將軍隊撤走。但英國政府毫不理會，仍舊派軍駐守九龍寨城。

英國違約派軍駐守

同年十一月，英國政府指示卜力通知清政府，表示今後九龍城在各個方面均歸英國管轄，有關內容的樞密院令即將發出。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政府仍然沒有放棄收回九龍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英軍從一度佔領的深圳撤出後的第三天，清朝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英國從深圳撤軍表示讚賞，同時強烈要求英國遵守條約，恢復中國對九龍城的合法管治權。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國政府修改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日英國樞密院通過的新界敕令，把當中第四款作廢，並通過新的九龍寨城敕令，單方面宣布九龍城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所規定：「租期內實際上成為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後並於一九零零年二月二十日在《香港政府憲報》上正式公布。現把公布內容節錄如下：

「鑑於女皇陛下與中國皇帝於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達成的條約，鄰近殖民地香港的英國領土將依據上述條約以租借給女皇陛下的形式拓展。又鑑於女皇陛下樞密院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日政令，其中：上述條約規定的邊界範圍內之土地，是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它實際上已成為上述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樣。香港總督在立法局勸諭和同意下，有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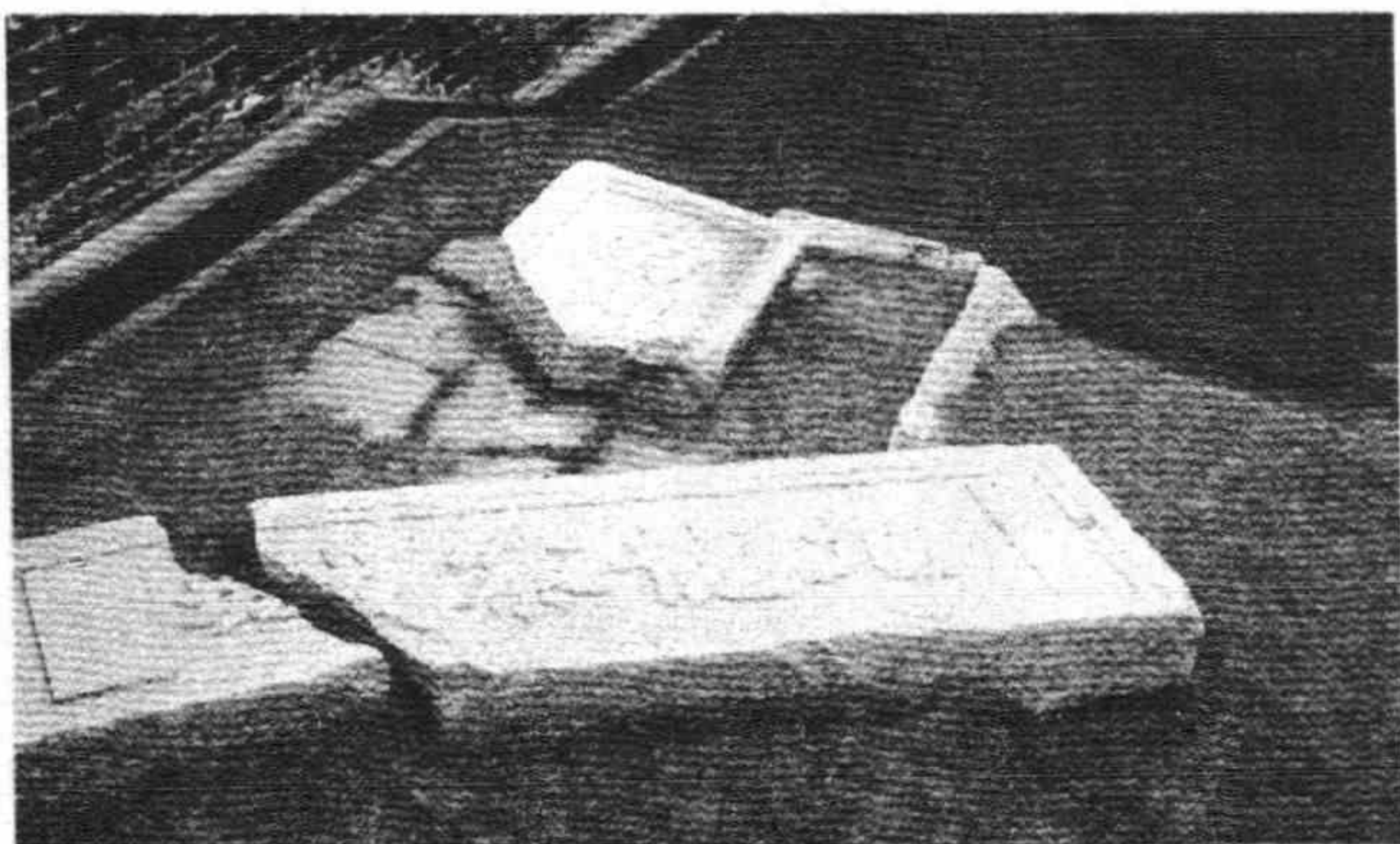


九龍寨城牆壁上的張玉堂將軍拳書

訂法律，以確保作為本殖民地的一部分的那塊土地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管理。又鑑於上述樞密院令第四條，即在發布該政令時駐紮在九龍城的中國官員不受該政令的限制，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又鑑於九龍城內的中國官員行使職權，構成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上述樞密院政令第四條應予廢除，九龍城的中國官員應停止在城內各司其事，且九龍城在上述條約的租期內實際上成為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女皇陛下接受樞密院的規勸，現高興地發布敕令如下：

（1）女皇陛下樞密院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日政令第四條作廢。

（2）九龍城在上述條約租期內成為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它實際上已成為所述殖民地的一部分一樣。



九龍寨城牌坊遺蹟

（3）上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日樞密院政令開列的條例，適用於九龍城，該城已在上述樞密院政令中被宣布為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廷堅持擁有主權

清政府對於英國殖民者進駐九龍城，以發布九龍寨城敕令的方式單方面宣布租借九龍城九十九年，始終堅拒承認。一九零零年，李鴻章前往廣州就任兩廣總督途經香港時，與港督卜力就九龍城的問題進行正面交涉。李鴻章表示清朝政府絕不會放棄對九龍城的主權和治權，並指英國既然與中國簽訂了條約，就應該遵守該條約，若英國不尊重九龍城在條約中明確規定的地位，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後來，清政府不斷向英國政府施壓，表示擁有九龍城的主權。英方在中方強烈抗議下，雖然依舊不甘示弱，但一些英人畢竟覺得擁有九龍城既名不正，又言不順，並不是一件光彩的



寨城公園內展覽的古大炮

事。因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明文規定是雙方必須共同遵守條約的，不能單方面廢除或修改。在英國官員權衡後，英軍最終撤出九龍城。而中國政府一方面堅持對於九龍城的合法管轄權，但同時卻沒有力量重新進入九龍城恢復管治；而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一直堅持九龍城是女皇陛下殖民地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但卻不敢把英國法律延伸至九龍城，直接統治九龍城。在此情況下，九龍城就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三不管地區。直至回歸前，政府才將九龍寨城拆卸，改建成今天的寨城公園。

英國圖謀獨立兩廣

一九零零年，中國發生了義和團事件。當時，慈禧太后支持團民在北京城攻擊外國領事區，甚至焚毀外國領事館。六月十九日，德國公使更被殺死。事件不斷惡化。後來，八國（包括德、英、美、法、日、意、俄、奧）聯合起來，回應義和團的行動。當八國聯軍進攻中國之際，香港成為聯軍的後勤基地。香港位於中國南部沿海地方，最適合扮演支援角色。不少軍備物資也會途經香港才運往前方，不少傷兵也曾在港停留。

拉攏孫中山李鴻章合作

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英國政府擔心法國會乘時奪取兩廣等地。香港位於兩廣南部。若兩廣落入法國手中，對英國會大大不利。英國政府官員深明此點，指示港督卜力要利用這個時機，圖謀令到兩廣脫離清廷，以防法國乘時搶奪。當時，孫中山先生在港策劃革命，以圖推翻清廷。卜力便希望利用這股反清力量，以求達到目的。

卜力通過行政局議員何啟和兩廣總督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希望拉攏李鴻章和孫中山合作，促使兩廣脫離清廷獨立。李鴻章是清廷重臣，德高望重。卜力知道若得到他的支持，迫使兩廣獨立是易如反掌。孫中山是反清義士，深得海外華人支持。若果卜力得到他的支援，兩廣獨立是可以實現的。

促使李鴻章和孫中山合作，先是何啓得到港督卜力授權下，與革命黨人陳少白秘密商議。陳少白是四大寇之一，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後來，何啓更將革命黨人致函港督的書稿譯成英文，轉交給卜力。卜力希望透過這封信函，由他出面勸服李鴻章和孫中山合作，以圖促成兩廣獨立。

李鴻章詳細考慮後，得悉清軍系與八國聯軍實難相比。作為一位有識之士，他瞭解西方軍力的實況。清軍多數也會戰敗。若義和團和北京守軍戰敗，禍害更可能波及兩廣。若兩廣脫離清室，被牽連的機會可能較少。他與幕僚經過多次秘密討論後，終決定接受卜力的建議。他委派劉學詢致函孫中山，以作試探。

當時，孫中山已發動過一次起事，但最終也失敗。他也曾上書清室，以求變革，惜也不被接受。對他來說，清廷是一座破舊不合時宜的古屋，清臣是一些守衛古屋的八股之士。與李鴻章合作，他的信心不大。經過反覆思量後，他將這次合作當為一次嘗試。革命黨人仍希望以革命形式推翻清廷。他們積極籌劃惠州起事，對此事頗冷淡。

後來，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慈禧太后出走逃難，急召李鴻章回京處理議和事情。李鴻章也被迫北上，離開管轄的兩廣。他和孫中山的合作也告結束。卜力的拉攏也告失敗！

民生百態



李鄭屋古墓——漢人衣冠冢

香港地區臨近大海，自古以來是海鹽的重要生產地。由於漢初時期的鹽業並非國家專營事業，所以不少諸侯藉着經營鹽業來發展本身的經濟力量，試圖挑戰中央政府。漢武帝爲了防止地方政府擁有過大的經濟力量，威脅到中央政府，遂實行鹽專賣政策。武帝在全國各地建立鹽官制度，至於管轄香港的番禺縣亦同樣設有鹽官。這些鹽官負責海鹽的生產和買賣，防止私人侵佔鹽務。

墓主疑是鹽商或鹽官

當時，香港地區亦有不少鹽場。隨着時間的流逝，香港鹽業已一落千丈！在今時今日在香港，要找到大規模鹽場，並非一件易事。幸好，李鄭屋古墓正好彌補這個不足。因爲一些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經過深入考查和研究後，認爲古墓的主人翁可能是一位鹽商或是與鹽業有關的官員。

一九五五年八月，爲了緩和當時急劇增加的人口，香港政府決定興建李鄭屋徙置區。當建築工人於深水埗東京街北端的李鄭屋村動工的時候，在挖土過程中無意間發現這個千年古墓。當香港大學的講師及學生得知這個消息後，甚爲驚嘆，認爲這個古墓對於研究香港歷史有極大幫助。後來，香港大學林仰山教授更親自動手，與同學們一起進行發掘。



李鄭屋古墓外貌

古墓內並無發現屍體

經專家考證得知，這個千年古墓興建於東漢中期，約在公元一世紀末至二世紀中。此墓是用磚塊砌成，內裏有四室。墓的外形呈十字，闊五尺、長十二尺，高五尺。而墓的人口偏向東南方，這可能與風水布局有關。墓內部分磚塊有花紋及刻文，刻文包括「大吉番禺」、「番禺大治曆」和「薛帥」。前兩種文字稱「番禺」，而不稱「東官」（東莞）和「寶安」，即證明此墓是於東晉以前所興建，這是因為香港地區在秦漢時期才屬於南海番禺縣所管轄。至今最後的文字「薛帥」，估計是製造墓磚工匠的名字。

考古學家在古墓內發現了五十多件銅器和陶器，當中包括煮器、食器等。當時人民生活的部分面貌，都在這些器物中得以反映。但古墓內並無發現屍體，因此這可能是一個衣冠冢，用以紀念先人。現時，這個千年古墓已成為市政局香港博物館的李鄭屋分館。

屯門——古代海防重鎮

香港於漢代時期歸由南海郡番禺縣所管轄。東晉咸和六年，晉成帝將南海郡的沿海地方劃分出來，稱其為東莞郡。東莞郡管轄寶安、安懷、海豐、海安、興寧、欣樂等六個縣。其中寶安縣的轄地，包括香港和深圳等地。由此時開始，香港脫離了番禺縣的管治，成為寶安縣的轄地。

大嶼山先民疑為晉人

東晉末年，朝廷政治黑暗，貪官當政，人民生活困苦。一些農民長時期受到貪官所欺壓，難以維生，遂挺而走險起事反抗，其中以隆安三年的孫恩、盧循起事最為著名。東晉政權雖然腐敗，但仍不乏勇悍的軍隊。元興六年，孫恩敵不過朝廷的軍隊而壯烈地犧牲了，而盧循則帶領部隊南下佔領廣州。後來，晉將劉裕再帶兵攻擊，餘部進一步退至香港的大嶼山島，更在此定居下來。因此，不少歷史學家也認為盧循的餘黨可能是大嶼山原居民的先祖。

南朝劉宋時期，印度名僧杯渡到中國遊歷，其回國時曾經停居在屯門灣後屯門山上，故屯門山又被稱為杯渡山。當時，無人知道他的本名。一些鄉民曾見他乘坐一個大木杯渡過河川，因此賦予其「杯渡禪師」之名。杯渡行蹤飄忽，言談舉止極為奇特古怪。他走路時赤腳，但上牀睡覺時卻穿鞋，而且



杯渡遺蹟

愛好飲酒吃肉。不少人都認為杯渡與民間相傳的濟公和尚甚相似。

禪師復活長居屯門

據《新安縣志》所載，杯渡禪師曾替當時名士齊諧的妻子治病。其診治方法十分奇特，一來不診脈，二來不用藥，只是念禪語數句，齊諧的妻子便康復過來。齊諧見他道行高深，十分敬佩，於是拜其為師。後來，他們四處遊歷，杯渡禪師卻不幸地在途中病逝。齊諧便將杯渡禪師的屍首運回，葬於舟山上。一年之後，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位貴賓突然出現在齊諧的家中，他便是死而復活的杯渡禪師。齊諧發現後，驚魂還未定，杯渡禪師就表示要告辭去廣東遠行。後來，杯渡禪師便到達屯門，並長居於此。

《縣志》中杯渡禪師的故事十分神化，實在難以全信，但這個傳說卻反映了屯門在古代交通的重要性。屯門意思是屯田

防衛的海門。屯門三面環山，是一個天然的避風港。因此，不少外船（如波斯、印度、南洋群島的船隻）從外地來華時，也不會直航廣州，而選擇先停駐屯門，待補給後才再出發。華船出外時也會如此。

從以上兩件史事可見，魏晉時期香港發展蓬勃的地區並非在香港島，而是在新界屯門和大嶼山等地。西北地區遠比東方地區發達，其主因在於西北地區是中國南方航運的大門。時至今日，這個大門仍然擔當着重要角色，不少貨輪每天也要經此大門才可以深入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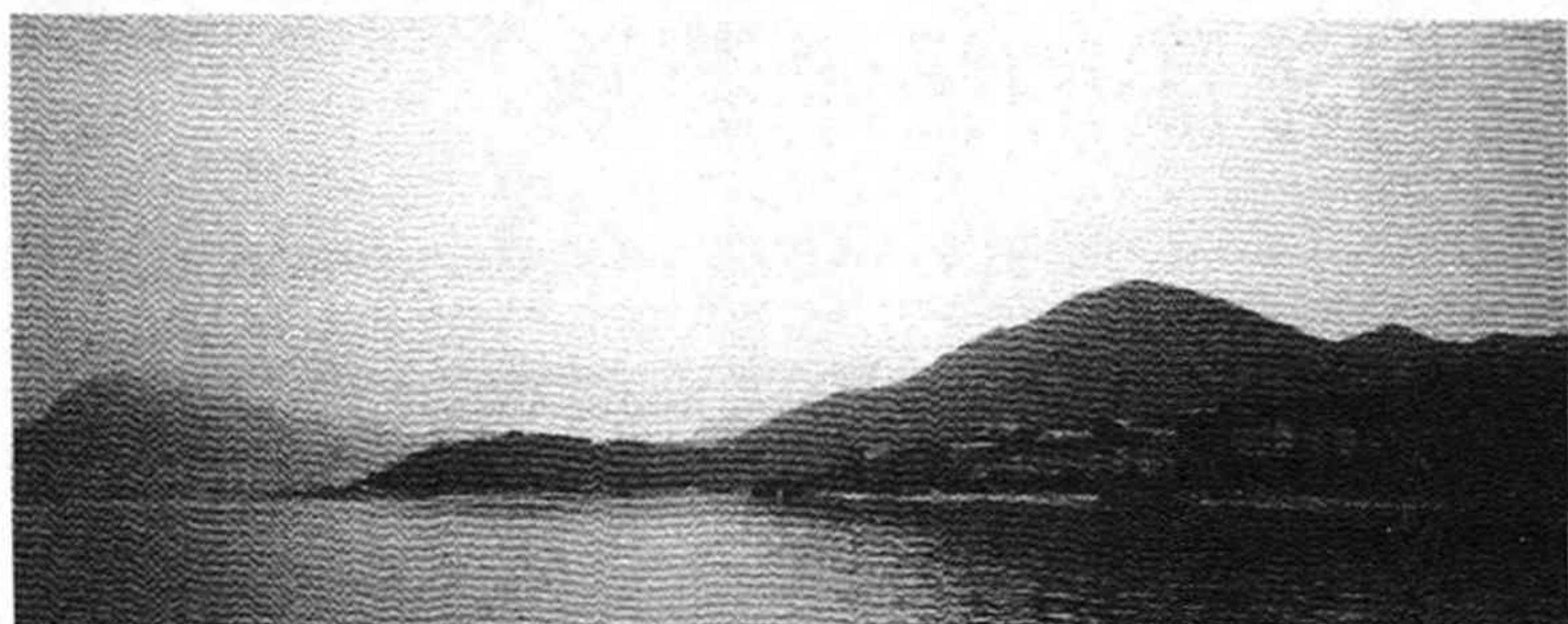
隋唐年間的香港要地

隋代開皇十年，隋文帝楊堅把東莞郡廢除，故此香港改歸廣州府寶安縣管轄。當時的香港，仍以屯門一地發展最為迅速。隨着中國對外交通由陸路為主轉至水陸並重，屯門的重要性也相對提高。唐朝時，政府設置了屯門鎮，並駐有官吏和軍士以作防衛。當時，大約有二千名士兵駐守該鎮，其屬於安南都護府。由此可見，屯門是唐朝南方的重要屯兵之門。

韓愈詩歌提及屯門

要知道當時屯門在南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性，其實可在唐朝詩人韓愈和劉禹錫的詩歌中找得一些線索。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中：「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摔。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發。兩岸雖云牢，木石瓦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而劉禹錫的《踏潮歌》中：「屯門積無風颿，滄波不歸成踏歌。轟如鞭石屹且搖，亘空欲駕鼉鼉橋。」

一些史學家更稱當年韓愈被唐玄宗貶官至潮州任刺史時，就是從廣州循海道經香港赴任。當其途經屯門時，曾上岸遊覽一番，欣賞當地景色。但另一方面，一些史學家則不認同韓愈曾遊屯門一地的說法，指出韓愈並非從海路赴任，而是取道東江，故沒有可能途經屯門。無論韓愈曾否到過屯門，但至少也有聽聞此地，對此地有一定的認識。



大埔吐露港一帶是古代著名的養珠地

玄宗天寶三年，浙江永嘉和明台等州海寇吳令光作反起事，沿海漁獵和農業受到嚴重影響，經濟損失慘重。因此，南海太守劉巨鱗在屯門鎮兵，聯同海南尹裴敦復一起進行夾攻，結果吳令光戰敗身亡。由此可得知屯門和浙江等地在當其時已有聯繫。

五代十國時，南漢（十國之一）於屯門設置市舶部門，對各國來華的船隻進行抽解。抽解即抽稅的意思。隨着中外商船往來頻密，屯門市舶部門逐漸成為南漢的主要稅收來源之一。南漢君主更將因杯渡禪師而命名的杯渡山易名為瑞應山，並在該處建立軍寨，設置靖海都巡、同知屯門鎮事。

募千鄉民大埔採珠

南漢最後一位君主劉鋹，對珍珠尤其鍾愛，故十分重視採珠業。由於當時的大埔是著名的養珠地，所以劉鋹在大埔設置媚川都，專門負責發展採珠業。政府官員招募了數千名鄉民在此採珠，更有數千名士兵長駐此地，以防鄉民貪利作反。

由此可見，大埔和屯門兩地在古代可謂重要之地。其中以大埔的養珠業更聞名中外，與廣東另一養珠地合埔齊名。可惜，後來各朝政府只顧採珠，卻不懂得保養珠場，結果至明初時珠蚌已多被前代採盡，令養珠業日漸式微。

清初遷界政策影響民生

清初，滿清政權剛剛建立，不少明代遺臣仍不斷地進行反清活動，當中以明朝遺臣鄭成功最爲人所知。爲了重建大一統政權，清初君主曾多次派兵征討，然而清軍多次亦敗北而還。順治皇帝先後頒布了禁海令及遷界令，以防止鄭成功聯結沿海人民共同反清。

嚴禁百姓沿海居住

清世祖於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頒布了禁海令，除了禁止沿海商民出海外，更不許外商來華貿易通商。中外貿易因而停頓，對經濟構成嚴重影響。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清世祖更頒布了遷界令，把廣東沿海地區包括東莞、香山、新安、海豐等地的居民向內遷移八十里，而香港大部分地區亦包括在內。清聖祖康熙皇帝繼位後，分別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及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重申此令，嚴禁百姓於沿海地區居住。

遷界政策對香港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農田荒廢，屋舍人去樓空，而海盜更乘機侵擾百姓，人民生活困苦。因此，不少居民提出廢遷界令的要求，望能重歸故土。廣東巡撫王來任和兩廣總督周有德目睹百姓苦況後，亦聯名上奏請求皇帝廢去此令。康熙帝是中國歷史上英明的君主，當他得知百



周王二公書院外貌

姓的苦況後，便宣布將部分地區復界。

康熙復界繁榮再現

香港地區居民得知復界消息後，隨即攜同家眷重返鄉土。爲了感謝周有德和王來任的功德，他們於錦田建立了「周王二公書院」，以表揚兩位恩人。海禁和遷界政策實施多年，人口急劇下降，四處蕭條。因此，清政府推行鼓勵生產政策，並招攬別區居民來港，令香港成爲多地區人士聚居的地方。這些新移民來港後，香港社會經濟得以再次發展。

遷界之前，香港經濟作業以煮鹽、採珠和種植香樹爲主。但由於遷界政策實施多年，不少鹽場、珠場和香樹林已經荒廢，加上新移民不懂煮鹽、採珠和種植香樹的技術，令原來的鹽業、珠業和香樹業不能回復昔日的興盛面貌。新移民來港後，便轉投漁獵、農耕和打石等行業。

康、雍、乾三代，史稱為清初盛世。當時的香港地區十分繁盛，百姓生活穩定，得以安居樂業。據嘉慶年間的史籍記載，其時香港地區共有二百七十條村落。可見香港已發展一個人口茂盛的漁港，不再是窮鄉僻壤了。

鴉片零售業

清廷和英國於鴉片戰爭後簽訂了《南京條約》，香港悲痛的殖民地歷史便由這時開始。鴉片是當時最重要的轉口貨物，而鴉片問題一直未有解決。隨着香港人口和鴉片消費量增加，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Stanley）於一八四四年二月向當時港督戴維斯提議向鴉片商徵收稅款，用作補貼殖民地的收入。

成政府第二大收入

同年十一月，政府通過新法例。在新例下，只有持牌的鴉片零售商才可售賣整箱以下的鴉片，以供消費之用，至於整箱轉運的鴉片，則不在此限。牌照由港督核發，無牌經營者罰款五百元。一八四五年二月，政府又通過《零星包賣鴉片細則》，詳細規定煙館地點、營業時間以及交易方式。自此，鴉片正式成為合法商品。

一八四五年三月，英國商人馬地遜（Mathieson）和都爹利（Duddell）依據上述法規，以每月七百一十元向政府承包一年鴉片零售特許權。其後，戴維斯發覺鴉片條例中有關「以供消費」的規定並不明確，不少煙商偽稱鴉片用作出口，非供本地消費，得以非法經營零售業務。此舉令擁有特許權的商人蒙受經濟損失，故他們向政府投訴，指非法鴉片零售嚴重破壞包稅制度。

七月，政府修訂法例，將舊有法例中「以供消費」的字眼廢除，以保障特許商的利益，確保稅收。此後，鴉片稅收持續增長，更成為政府第二大收入來源。一八四六年十一月，新任殖民地部大臣格雷（Grey）致函戴維斯，對其將鴉片納入稅收項目表示稱許。可見英國政府依舊把鴉片視為商品，從中取利，漠視人民健康和道德問題。

推牌照制月費十元

包稅制度實行後，政府稅收雖然穩定，但獨家壟斷的經營方式卻導致鴉片價格上漲，故不少煙館商人要求政府廢除包稅制度。而一些大鴉片商亦抱怨，指包稅制度令鴉片價格高漲，故不少中國內地煙販也不經由香港入貨。有見及此，戴維斯在一八四七年八月廢除了包稅制，改為牌照制。牌照分為三類，開設煙館商須繳納月費十元，販賣煮熟鴉片的煙膏商則須繳月費二十元，至於零售鴉片商就須繳付月費三十元。有關牌照由巡理府負責頒發，數量不限，有效期一年。

鴉片戰爭前，清朝政治腐敗，無力與西方的鴉片毒害對抗，令香港市民深受其害。戰爭結束後，香港被英國統治，鴉片更大量傾銷，嚴重影響市民健康。

第一次人口統計風波

自英國統治香港後，華籍人口增加了兩三倍。一八四四年四月，華籍人口已達一萬九千人之多。當時，中國式房子已在太平山區出現，而西北岸邊亦有不少葵棚。數以百計的華人勞工為求賺取每月兩三銀元的工資，更每天從九龍乘船來港，參與開山劈石及築路填海的工程。不少流氓更來港找尋生計，以搶劫和盜竊為生，對民生構成負面影響。

居民須交納登記費

當時，由於香港警察部隊還未正式成立，故警察裁判司堅偉少校（Captain Caine）常親自率領士兵於夜間巡邏，對付不法之徒，以維持社會治安。後來，他更頒布了「宵禁令」，禁止人民於晚上十一時後夜遊，但治安情況並未因此而得到改善。為了改善劣況，港督戴維斯頒布了《人口登記法例》。在此例下，執法人員可向形跡可疑者隨時查閱登記證，若疑人拿不出便會遭到懲治。

一八四四年八月，政府通過法案，定於十一月一日舉行首次人口登記。所有居港人士，不論任何國籍，都必須每年前往登記部門辦理一次姓名、職業和住址的登記手續，才可以獲取登記證。而每次登記時，每位居民均須交納登記費，外國人須繳交五元，中國人則一律收費一元。

中西人士大表不滿

英國商人起初以為只有華人才須要登記，後來才發覺中西人士均須登記。由於商人和苦力的差異只是數塊錢的登記費，英商覺得這令其失去面子，而華人則認為這是徵收人頭稅的開始。結果，中西人士皆大表不滿。

英國商人舉行大會，一致譴責該法案違反了《英國憲法》，還推舉一個委員會，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議。至於華人方面，工商業人士一致決定在十月三十日罷市和罷工，不少工人更準備集體撤離香港。港督戴維斯認為事態嚴重，於是急忙尋找對策。

十一月十三日，政府通過修訂法案，規定那些收入微薄的人士必須辦理人口登記，而凡是公務員、專業人員、軍人、店員、廠主、房東、商人、公地住客和每年收入達五百元以上的人士，均一律豁免登記。當得知法例修改後，中西商人不再反對，而此法案正式於一八四五年一月一日執行。

香港首個城市——維多利亞城

英國佔領香港後，義律在英國商行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如渣甸洋行、林賽洋行等）的支持下，決定把香港開闢為商埠。英國遠征軍最終選定了香港島南部赤柱為殖民地首府。赤柱不但遠離九龍半島，北面還有高山屏障，利於防衛，是理想的立足地。故此，很多原居在澳門的英國人都紛紛移居赤柱，但不少人卻因感染赤柱瘴氣（瘧疾）而病逝。

中環關「女王城」商業區

殖民政府在這情況下，決定另擇一地作為殖民地首府，而新地點便是中環。中環與九龍半島十分接近，兩地只是一水之



西環城市界石遺蹟

隔，而九龍還有清炮和清軍，這明顯對香港防衛不利，但為何英商和義律仍選擇此地呢？這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他們企圖進一步侵佔九龍半島，至於第二個可能是他們對於清廷的腐敗無能已瞭如指掌。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十多座洋房已在中環一帶建成，而第一條道路——荷里活道，亦在此時建成。後來，又建成了由中環半山直通海岸荷里活道的雲咸街，港島的交通因而得到改善。至於建路過程中所掘出的石塊則投入海中，並堆積成填海區，這便成為香港第一幅填海地。

同月，義律將填海地域分為四十段，每段約一百呎，讓英商公開投標，藉此在中環開闢一個名為「女王城」（Queen's Town）的商業區。結果，一共賣出三十三幅土地，最低價格為二十英鎊，而最高價格則為二百六十五英鎊。

義律實施自由港政策

當時香港陸路交通並不發達，水路交通則只限於帆船階段，故深水港的作用仍得不到發揮。為吸引外商在此轉口貨物，義律於是實施自由港政策，允許商船自由進出。

在政府的鼓勵下，不少英商決定在香港發展。由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三年，在香港建立的洋行已達十二間，而這些洋行大多屬於貿易業及貨倉業。當時，香港的平房多是三層式設計，上層為居所，下層為辦公室。為方便裝卸貨物，沿海建了許多貨倉和碼頭。除了貿易業和貨倉業外，一些英商更開辦輕



接近司徒拔道口的界址石遺蹟

工業，如水泥廠、糖廠、酒廠、冰廠等。而香港第一所銀行——倫敦東方銀行，更於一八四五年正式成立。

中區在短短數年間成為了貿易業、貨倉業、商業、銀行業和輕工業的集中地。此城後來改名為「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成為了東方的英國城市。

清理大火瓦礫掀填海之始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華人居住區發生了災難性的大火。起火現場為一間服裝店，店內布匹着火燃燒，大火很快便蔓延出去。當時恰巧遇上乾燥季節，水源不足，火勢更一發不可收拾。由於當時的房屋多由木材建成，加上街道狹窄，若一家失火，便導致萬家遭殃。

近五百房屋燒成灰燼

雖然政府派出大量消防人員前往救火，然而因火勢實在太大，始終未能將火撲熄。而軍隊後來也出動協助撲火，但依舊未能成功。大火後，位於消防局與鐵行輪船公司貨倉之間的四百七十二間的中式房屋全被燒成灰燼，死傷者達二十多人，整個華人居住區便在一夜間變成焦土。

港督般咸為了防止發生同類型火災，並迅速地重建該區，於是召集有關官員進行多次會議，商討對策。結果，般咸提出了一個新的城市建設方案。

方案規定今後所建造的房屋，都必須以磚頭和石塊作為主要建築材料。而房屋之間要做到橫有行，縱有列。行與列之間，要保持足夠的空間，以作緊急逃生之用，而這些空間更可以發展成綠化地帶或休閒場所等。

當年，政府正計劃進行首次填海計劃，擬從西環至銅鑼灣



由於填海地漸向西伸展，文咸街後來又被分爲東、西兩街。

一帶，增加海岸土地，但立法局議員以「有損沿海土地業權者的利益」爲由加以反對，計劃被迫延遲推行。而這場大火發生後，般咸爲了盡快清理災場，於是將大量瓦礫傾倒在皇后大道中的北灘，這便成爲香港填海之始。

新填土地命名「文咸街」

這塊新填的土地便是「文咸街」（Bonham Strand）。般咸的另一譯音爲文咸，Strand是指海旁的小路。由此證明，當時的文咸街原位於海旁，是港島最初的海岸線。到了後來，由於填海地慢慢地向西面伸展，文咸街被分爲東、西兩街。文咸街與皇后大道中之間有一條小街，原名爲「乍畏街」（Jervois Street）。乍畏是一八五二年至五三年間的署理港督，而此街便是用來紀念他而命名的。後來，不少商人在這條街售賣蘇杭絲綢，故改稱爲「蘇杭街」，但其英文街名則依舊不變。而文咸西街是以售賣南北物產聞名，又俗稱爲南北行街。爲了紀念般咸的功績，政府後來把半山一條街道命名爲般咸道。

撲朔迷離的黃墨洲案

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時，香港曾經發生一件轟動一時的大案，這件大案稱為「黃墨洲案」。黃墨洲是一名商人，但其實際身分卻令人撲朔迷離。一些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情報販子，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他是滿清駐港的偵探。黃墨洲有一位要好的朋友高和爾。高和爾自小在新加坡長大，曾任英軍遠征舟山群島，並能操多國語言，包括英語，漢語，印度語及葡語等。最初，他在裁判司署擔任翻譯員，後來轉任為副警察司。

商店內搜出賊贓

黃墨洲對當時海盜的情況非常熟悉，常把海盜的行蹤告知高和爾，令任職副警察司的高和爾屢破奇案，獲得稱許，後更得以升任為總登記官。後來，高和爾他更與黃墨洲合夥經營航運生意，可見他倆關係十分密切。

一八五七年七月，警方接獲線報，於是跑進中國商人黃墨洲的商店，並在店內搜出一批被海盜劫掠的食糖。而警察司查爾斯後來更在黃家中搜出高和爾寫給黃墨洲有關錢財往來的字據，查爾斯遂將此事匯報給代理輔政司布烈治。由於布烈治和高和爾素有交情，故布烈治得知這件事後，便立刻命查爾斯把字據燒毀。

後來，警察以接濟海盜和收購贓物的罪名控告黃墨洲。經

過兩個月的審判，高等法官於九月二日認為人證物證俱全，宣布黃墨洲罪名成立，隨即被押解北婆羅洲附近的納閩島充軍十五年。高和爾得知判決後，曾慫恿布烈治出面要求重審，但最終也沒有結果。

疑幕後操縱妓院

高和爾的舉動，引起按察司安士廸的關注。安士廸更在立法局發言，指高和爾不配作為太平紳士。他首先指高和爾與中國海盜勾結。其次，由於高和爾的妻子是一個青樓出身的華籍女子，故安士廸認為高和爾與妓院有密切關係，還指他幕後操縱妓院，並負責妓院執照的投機買賣。後來，安士廸更決定起訴高和爾。

為了平息此事，港督寶寧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任總測量官急卑利為主席。經過深入調查後，急卑利認為安士廸所提出的十九項罪名中，有八項欠缺根據及有七項無從證明，而只有四項尚屬確實。因此，急卑利認為若因此而要求取消高和爾的太平紳士任命，實欠缺充分理由。

安士廸否認其指控高和爾是其個人的見解，並認為他的指責都是起訴高和爾所必須進行調查的論據。而安士廸亦有指責其他官員貪污舞弊的情況，於是其他官員便反控他故意挑起政府官員間的內部紛爭。安士廸最終被停職，並返回英國。黃墨洲案除了顯示當時海盜搶劫的嚴重性，還反映了政府官員互相包庇的風氣。

早期的金融管理

自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以來，香港經濟經歷四年的調整還未完全復甦，一些市民生計無依，苦不堪言。大學畢業生難於找尋工作，「畢業」等於「失業」。他們為自己的前途而憂慮，還擔憂着香港的未來。事實上，十八世紀中葉時，香港的經濟情況也是如此。後來，經過眾人的努力耕耘，經濟才逐漸得到改善，最終走上繁榮的路途。

一八六二年前，香港幣制混亂不堪，通行貨幣既有墨西哥鷹洋、西班牙銀元、中國銀錢、亦有英鎊、澳洲金幣，以至印度盧比等。這樣混亂不一的兌換制度，對香港商業活動的發展構成負面影響。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港督羅便臣推行幣制改革，以銀元為基本法定貨幣，把匯率定為一銀元換取英鎊四先令二便士。自一八六二年七月起，港府全部收支均以銀元計算。

香港銀元英國鑄造

另外，港府還進一步在英國鑄造香港銀元，作為香港主要貨幣，同時鑄造銅元輔幣。由於市民大眾習慣使用舊有貨幣，故起初對新鑄的一元銀幣、一角銀幣和一分銅幣不太接受。但後來隨着這些貨幣日漸增多，市民逐漸習慣及樂於使用。這時期鑄造的貨幣，便是香港的第一代貨幣，而貨幣背面刻有一八

六三年的字樣。時至今日，這些珍貴的貨幣已成為收藏家的心愛之物。由此可見，穩健的幣制，對於香港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有了健全的幣制後，經濟發展持續穩定地成長。後來，顛地洋行和鐵行輪船公司香港分行總監湯瑪斯·修打蘭（Thoma Sutherland）建議在港籌組銀行。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正式成立，市民大眾多稱其為「上海銀行」。銀行資本額為五百萬元，共有四萬股，每股一百二十五元。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是一個國際性機構，董事包括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印度的巴斯坦人和猶太人等。其實，不少銀行早於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成立前，已經在香港經營業務，如東方銀行（一八四五年）、有利銀行（一八五七年）及渣打銀行（一八五九年）等。這些銀行的業務主要是匯兌，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則主要協助香港商人發展對華及對日貿易，可見當時的銀行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在性質上大大不同。而這種新的商業策略可說是逆境中的一個新嘗試。

成立商會互相合作

一八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外國商人更在香港成立「香港商會」（Hong Kong Chamber of Commerce）。在商會設立前，商人互不相助，各自為政，當同業出現財政問題時，更乘時搶奪其生意。自商會成立後，外國商人聯合一起，共同為促進香港的商業發展而努力。他們透過商會向英國政府表達他們

對華商業政策的不滿，從而爭取更大的利益。

百多年前，香港面對着幣制、銀行業務及對外貿易等問題；百多年後的今天，香港同樣面對相類似的問題。時代改變，令問題更加複雜。昔日港督羅便臣英明果斷，挽救了香港經濟；今天的特首董建華，又不知會用什麼方法，協助香港市民脫離困境呢？

十八世紀中的航運業

香港新機場啓用已有一段時間，大家在享用先進的航空服務之餘，又有否想過香港航運業的歷史呢？香港作為亞洲中心點，在對外交通方面一向十分發達。魏晉時代起，屯門在交通上的地位已日漸提升。自香港被割讓後，對外航運事業更漸趨繁盛。

中外交通重要樞紐

殖民地時代初期，只有鐵行輪船公司獨家經營香港和英國的定期航運。自九龍半島割讓後，另一間輪船公司——邊行輪船公司也投入服務。一八六一年，港督目睹航運事業日漸興盛，於是決定在太平山頂建立訊號台，由官員負責把船隻進港的消息，傳訊給輪船公司代理和有關政府部門。

除了港英航線外，亦有定期航班來往香港和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於一八六六年派船定期往來香港和三藩市，而海洋輪船公司則派船往返上海和香港。海洋輪船公司又名為藍煙通輪船公司，因為其屬下船隻的煙囪都是藍色，故俗稱為「藍煙通」。由此可見，香港確實是中外交通的重要樞紐。

當時的船隻設計十分獨特，可說是中西混合的產品。船身以葡萄牙式設計，而帆纜卻是中國式的，這種船被稱為「羅沙船」，而引發英法聯軍之役的阿羅號便是屬於這類船隻。當

時，外國人聘請中國人在中國製造西洋船，在設計師和工人靈機一觸之下，想起集合中西所長，結果製造出中西合璧的船隻，他們真是聰穎非凡！今天，香港無論在對外航空或是海運方面皆十分發達，但可惜的是，行走香港及外地之間的船隻和飛機卻沒有中西合璧的特點。

碼頭貨倉相繼發展

配套行業除了製船外，碼頭和貨倉都十分重要。一八七一年，英商保羅·遮打和凱福·曉士在灣仔創立了香港碼頭及貨倉公司，這是香港首間公共貨倉。在此之前，商人也曾經修建貨倉，但不收存同行的貨物。當時一些資本較少的商家沒有能力興建貨倉，令所運或所用的貨料缺乏容身之所。自公倉建立後，貨運業的發展比以前大為進步。

至於碼頭方面，香港海岸起初只有竹架的碼頭，十分簡陋。自遠洋來港的汽船不得在碼頭停泊，只能在海港中停留。直至一八六三年一月，灣仔春園麥奇利哥公司修建了一座以木材興建的新碼頭。這個碼頭是當時香港島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現代化碼頭，其長達二百五十呎，伸入海中，潮漲時也有二十六呎。

有了這些現代化航運設施後，香港與中國和外國間的聯繫大大加強了。不少商人、學者都選擇在旅途中暫居香港，有些甚或愛上香港，在此定居下來。昔日的碼頭，今天的機場，雖然兩者相距百多年，但它們也有一個共通點，便是帶領香港走進世界。

百多年前的金融風暴

十九世紀中期，九龍半島被割讓，促成了維多利亞港的擴展。而海港的擴充，推動了航運業及貿易業的蓬勃發展，於是倫敦殖民地大臣要求香港負擔駐港英軍軍費的一部分，即每年二萬鎊。英國政府過往一直給予香港政府財政資助，到了此刻，港府羽翼已成，已有足夠能力分擔部分防衛費用。

上海躍升最大貿易港

但是，香港在一八六四年突然出現經濟大退倒。從財政報告中得知，當年政府財政出現赤字。（見附表）

收入	637,845
支出	763,307
赤字	-125,462

香港經濟衰退的主因，是由於《天津條約》的簽訂。中國和英國簽訂《通商章程》，規定中國進出口稅率為百分之五。上海更因為長江的開放，而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港。據《香港總商會百年史》指出：

「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六年的十年間，上海貿易後來居上，趕過香港。」

一八六六年，麥當奴爵士繼位為香港第六任總督。面對險峻的經濟危機，他決定開徵印花稅，估計每年可獲得額外十二

萬元收入，以彌補財政的赤字。

印花稅開徵後，隨即引起很大的回響。商人團體紛紛上書要求政府停止徵收印花稅，而一些立法局議員也反對徵收這項稅款。但由於英國政府認為這是解決香港財政困難的一個良方，故對麥當奴的做法深表支持，而麥當奴最終也堅拒收回成命。一八六八年，港府的印花稅收入高達十萬零一千一百元，令港府財政危機得以紓緩。

擠提風潮銀行停業

除政府財政收支不足外，銀行更出現了擠提事件。總行設於印度的阿格拉與瑪斯特曼銀行，因受到一八六六年印度棉業風潮影響，出現財政危機。後來，香港分行更發生擠提事件，最終更宣布倒閉。擠提風潮延至一八六七年二月，其他印度銀行也相繼停業。結果，當時全港十一間銀行中，只剩餘五間。

在這場金融風暴中，剛開業不久的匯豐銀行，以及兩間英資銀行有利和渣打也均能化險為夷，但匯豐銀行的有力發起者顛地洋行卻自此退出香港貿易舞台。

雖然接連發生貿易減縮和銀行擠提事件，但麥當奴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反而積極重整香港經濟，度過難關。

麥當奴：以賭制賭

自香港被英國侵佔後，人口不斷增加，而賭博風氣亦愈趨熾烈。雖然政府曾明令規定不准開設賭館，但各式各樣的地下賭館仍遍布全港。一直以來，不少港督也曾積極地進行禁賭，但也不成功。地下賭館經營者不斷賄賂政府高官，以求保證豐厚的收益。

增加稅收 減少罪惡

第六任港督麥當奴面對這世風日下的賭博潮流，決定對賭博採取較寬容的態度。他認為既然不能有效地掃蕩地下賭場，抑制賭風，倒不如將賭博公開化和合法化。政府還能從中抽取稅款，彌補財政收入的不足。

在麥當奴擔任港督前，兩位前任港督亦曾提出將賭博合法化。但英國政府卻堅決認為，香港必須維護英國的社會道德觀念，香港政府不得允許市民在港公開聚眾賭博，故兩位前任港督的建議以失敗告終。為避免重蹈覆轍，麥當奴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一個新觀點，表示將賭博合法化經營，並非鼓勵賭博，而是正如中國人所說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是以賭博來制止賭博。這是因為香港賭風已經難以制止，假若任其在地地下發展，便會導致更多的犯罪活動。假如賭博合法化，讓賭博在政府監管下進行，一方面可以增加稅收，另一方面也可以減

少罪惡，可謂一舉兩得。

各界反對 恢復禁賭

不知是麥當奴理想化的描述，還是經濟的原因，英國政府一改過往態度，同意麥當奴以賭制賭的做法。一八六七年五月，立法局決議讓賭博合法化，並從中徵收稅款。及至六月，立法局頒布維護社會秩序及風化條例，宣布自七月一日起撤銷賭禁。施行方法是招商承辦賭館，然後領取經營執照，在總登記官的監督下正式營業。

自賭禁撤銷後，賭風頓時熾烈起來。灣仔、西營盤及皇后大道等地各處賭館林立。麥當奴以賭制賭的做法，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令更多人沉迷賭博之中。一些賭場中的失意者更鋌而走險，四出犯案，如偷竊、打劫和盜用公款等，治安日差。其時更有人把自己的女兒出賣，以求獲得金錢再入賭場豪賭。

據統計得知，一八六八年八月，政府在賭稅中獲得收入一萬五千五百元正，一八六九年六月增加至二十二萬一千七百多元。雖然政府從賭館徵得巨額稅款，但賭博合法化仍遭到大部分市民的反對，尤其是教會人士。他們不斷致函英國政府，斥責麥當奴的做法令社會動盪不安。結果英國政府最終作出干預，麥當奴也在各方的壓力下，於一八七二年宣布取消賭博合法化，並重新恢復了禁賭。

香港醫院之父——東華醫院

港督羅便臣在任期間，華人人口不斷增加，令居住區高度密集，衛生條件極差。為改善這個惡劣衛生情況，麥當奴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當時，香港街道殘舊不堪，一些市民更在家中飼養家禽，衛生環境極為惡劣。針對這個情況，政府首先翻新了破舊的街道，並改善地下排水系統。為了徹底改善衛生環境，政府更下令不准市民在家養豬、羊及其他動物。在云云衛生政策當中，麥當奴最大貢獻是籌建東華醫院。

政府撥款萬五元籌建

十九世紀中葉時，太平山街上的「廣福義祠」是香港島唯



東華醫院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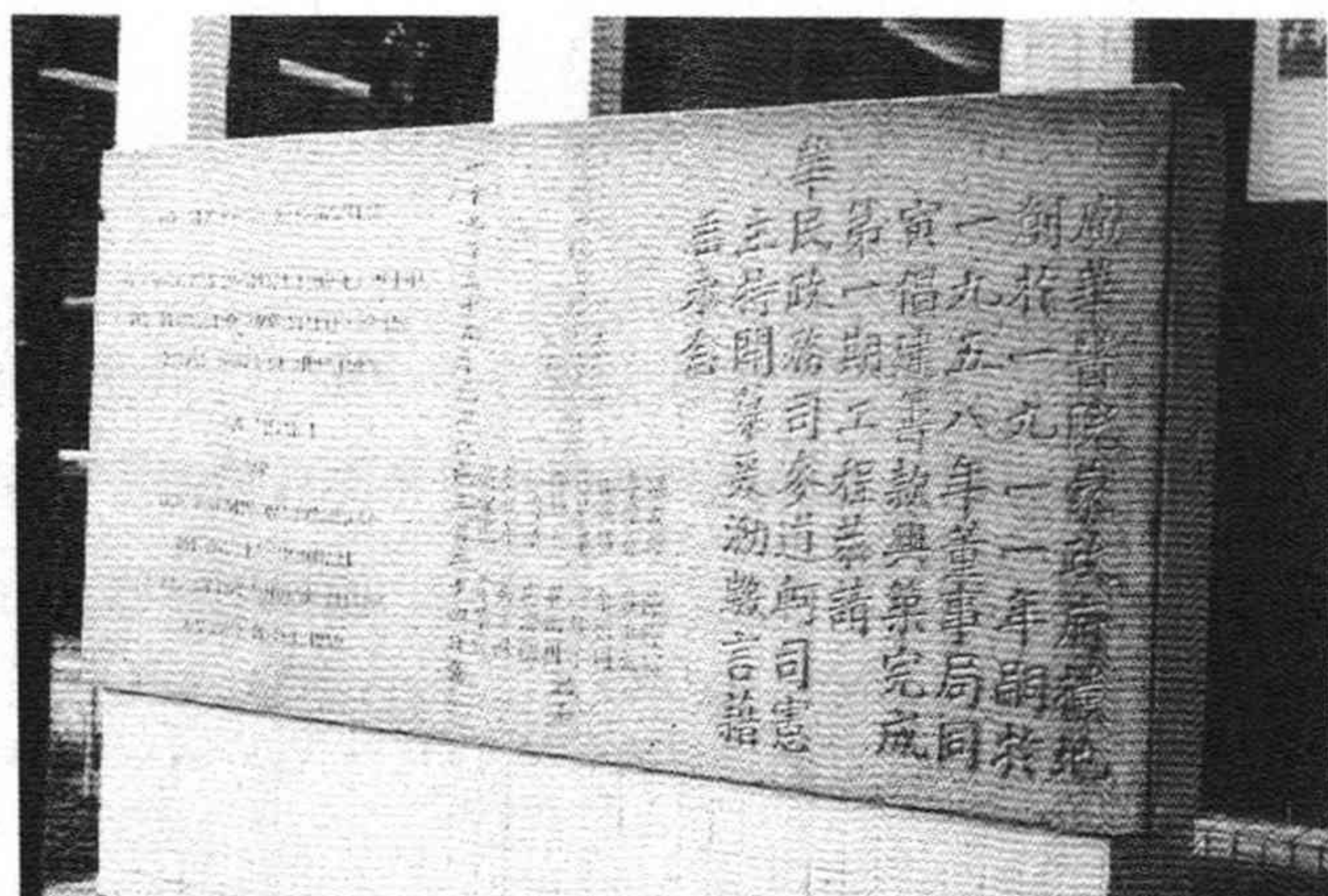
東華醫院石墊

——一座義祠，作為貧困華人暫居的地方。當時，部分流浪者死後會被裝入簡陋的棺材中，暫時安置在義祠，等待運返故鄉，故義祠的衛生條件很差。政府曾多次通過報刊對此進行指責，但情況依舊，所以不少華人要求政府設置醫院，收容貧病的居民。

為了根治這個社會惡疾，麥當奴決定撥款資助修建一座新醫院，該醫院取名為東華醫院（廣東華人醫院的意思）。這座醫院自一八六九年開始動工，港英政府撥款一萬五千元，作為籌建基金。除了政府的資助外，不少富商更捐贈集資興建。東華醫院於三年後落成啓用。

名士陳璞手書門匾

東華醫院的開幕典禮，是當時香港華人社會一項前所未有的盛會。《創建東華醫院序》由著名華人學者王韜撰寫，而創



廣華醫院奠基石

院總理是著名華商梁鶴巢，「東華醫院」門匾則是名士陳璞的手書。東華醫院建成後，本港的衛生情況比以前大為改善。昔日的貧病露宿者不用再留居在廣福義祠中，可以在東華醫院得到診治。

東華醫院建立後，一九一一年在九龍興建的廣華醫院以及於一九二九年興建的東華東院，合稱為「東華三院」。其服務範圍包括贈醫施藥、安老服務、殯儀服務、靈灰安置、資助教育、廟宇管理等。今時今日，東華醫院仍繼續發揚其救貧精神，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

西學始祖——中央書院

數年前，曾在本港培正中學受教的崔琦教授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一時成為教育界的熱門新聞。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向被批評為填鴨式，不少學生被視為唸書機器。但崔琦教授正好證明本港教育制度也有其優良的一面。

由四所官校合併

一八六一年，立法局決定購買美國浸禮會設在歌賦街的房舍，作為中央書院校舍。翌年，由四所官立學校合併而成的中央書院正式成立，書院的校長由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史釗域擔任。



中央書院舊址

一八六四年，中央書院約有一百二十名學生。該書院分爲中文部和英文部，中文部的學生必須學習《論語》、《孟子》及《中庸》等。由此可見，當時中文部學生具有深厚的文言文根基。

學生須要通過典籍口試，才能入讀英文部。英文部學生以學習英語爲主，但他們還要學習《五經》和《史記》等。而其他學科還包括地理、算術及歷史等。後來，在港督麥當奴的推動下，該校更於一八六九年開設化學和幾何科等。

事實上，當時學生所要學習的學科比現今學生少。現時的中一學生要唸十多科，實在十分吃力。過往，學生學習不注重「多」，而以「專」爲主。時至今日，會考八科狀元已不是什麼出奇的事，而九科狀元和十科狀元亦大有人在。隨着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學生所唸的學科也不斷增多。昔日中央書院的辦學模式，正是本港現今教育的最佳借鏡。

十九世紀的房地產

房地產可說是本港經濟重要支柱之一。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本港經濟衰退，樓市低迷，市民大眾叫苦連天。香港地少人多，地價一向十分高昂，樓價寸土如金。一些朋友曾問：「英國佔領香港初期，地價樓價怎樣？是否十分昂貴？或是十分廉宜？」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時光隧道，重返十九世紀，瞭解當時香港地產業的概況。

首次賣地英商為主

在《南京條約》仍未正式簽訂前，英國政府已急不及待把香港的土地出售。一八四一年六月十四日，義律將香港島皇后大道以北填海的新地劃分為四十幅，公開拍賣。當時，由於香港仍然是一個小漁港，故商人沒有多大興趣投資土地。

結果，政府土地官只能成功拍賣三十三幅土地，餘下的七幅土地仍有待認購。而拍賣價方面，最高的價格為二百六十五英鎊，最低則為二十英鎊。對於購買被英國霸佔的小島土地，華商的興趣不大，所以這些土地全由英商投得，當中包括林賽洋行和渣甸洋行等。

義律規定投得這些土地的公司只擁有土地的租用權，且須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的地租。渣甸洋行經理馬地臣於一八四八年致函英國下議院，要求英國督請港督更改土地政策，減少地

租。由此可見，英商所投得的土地，經濟利益並不大。

華人積極參與投地

六十年代，人口驟增，當中以香港島西區及中環地區的人口密度最高。維多利亞港西部的人口已達十萬多，平均每英畝土地便有一千六百人。市民的居住環境愈來愈狹窄，當時不少居民也渴望能居於中西區，但可惜因土地供應有限，不能配合需求。

除英商外，華商也有參與土地競投，希望從中獲得巨利。一八六五年，政府頒布了《購買地產條例》，以加強對房地產的管理。可惜，因金融風暴的出現，地價驟降！情況猶如今日般。

十年後，香港經濟逐漸復甦，地價回升，華商再次大量購買土地。由一八八零年一月至一八八一年五月，華商收購外商地產物業價值高達一百七十一萬元。一八八一年，港督軒尼詩透露，香港每季有十八人繳納地租一千元以上，其中十七人為華人，洋商則只有渣甸洋行。洋商於一八八九年再次集資五千萬，成立了香港置地公司，大力發展地產事業。在華商和洋商的努力推動下，本港房地產業得以持續穩定土地發展。

港督公館慘遭「開罐頭」

不少朋友爲了一睹千載難逢的天文現象，會不惜通宵達旦地觀星。大自然現象有着其美好的一面，但亦有其可怕的一面。一八七四年九月，本港便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天災，造成巨大的破壞。

堅尼地處變不驚

當年的九月二十四日，一股威力強大的颱風正面吹襲香港。當時，港督堅尼地正與朋友在山頂港督公館內飲酒閒聊。霎時間，狂風吹至，傾盆大雨。連新建不久的港督公館也抵受不住，兇猛的狂風把公館牆壁摧毀，除一間小房外，其他房間的屋頂均被大風掀去，猶如「開罐頭」般。

港督堅尼地雖然身經百戰，但身處這個劣境中，心裏也不禁惶恐起來。幸好，其本能救了他。堅尼地鼓起勇氣，立刻扔下酒杯，拉着身邊的朋友，並緊挨堅固牆壁，趕快躲進那間仍未倒塌的房間。他的朋友事後說：「沒有堅尼地，我可能沒命！」

雖然堅尼地慶幸能逃過大難，但其他香港居民卻不像他那般幸運。在強勁的颱風吹襲下，水位高漲，造成水災。停泊在海港的小船和大船都不能逃過這場厄運，不少船隻沉沒於深海中。而巨雨又釀成多宗山泥傾瀉，無數房屋因而倒塌，不少市

民無家可歸，被迫流落街頭。

風災過後祝融來襲

據非正式的統計，這場風暴最少奪去了二、三千人的性命。無獨有偶，風暴過後約三個月，香港又發生了一場驚人的大火災。不少市民的財產，都在這場大火中化為灰燼。這場火災由永安街燒起，火勢迅速蔓延，且連續燒了三日三夜。最後，堅尼地調動了多名消防員和警察，才能將火魔驅走。

大自然真是既可愛、又可惡。一方面，大家可在靜靜夜空中欣賞美麗的流星雨。但另一方面，大家卻又不得不提防風魔和火魔的侵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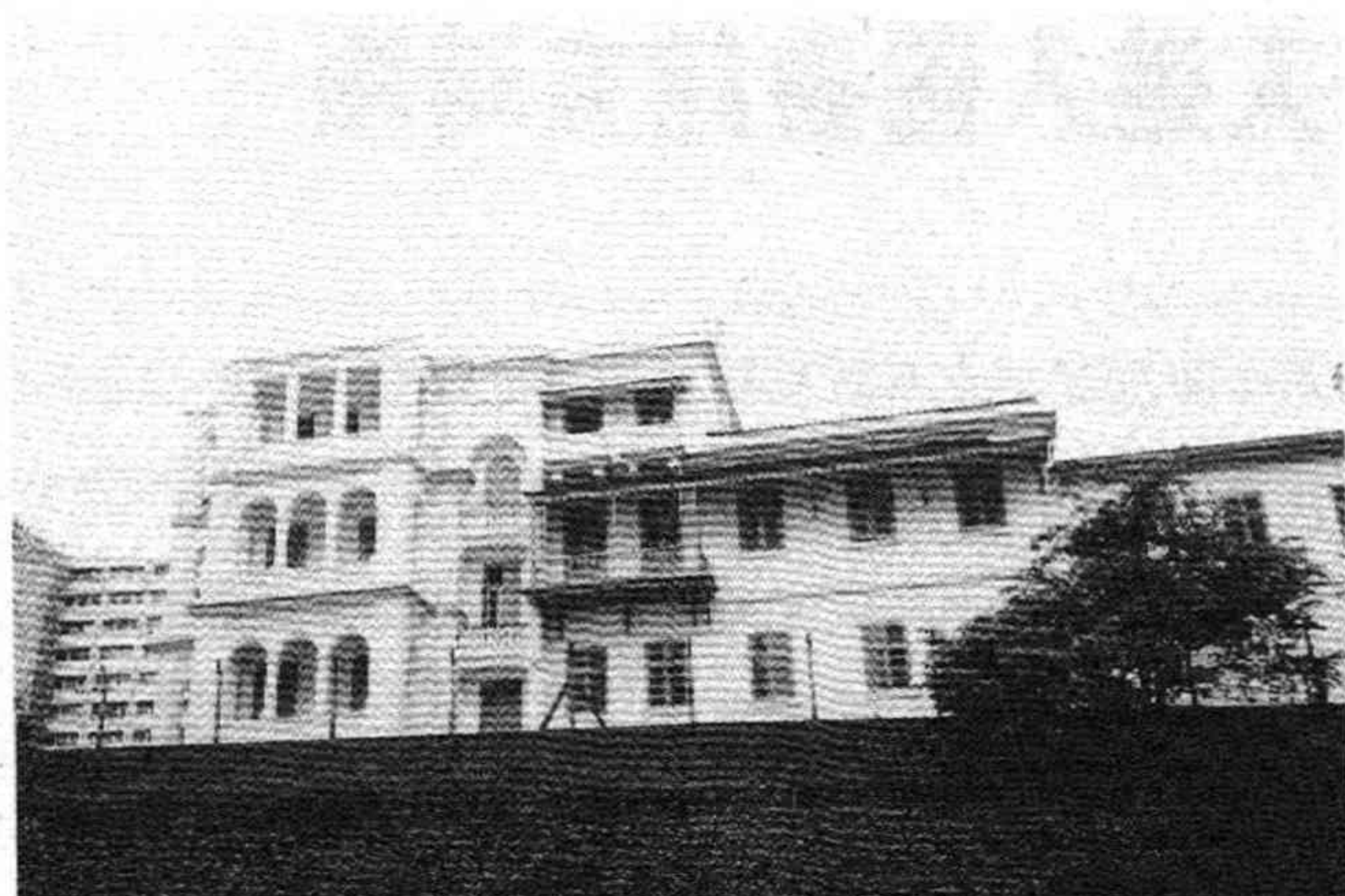
水警總部前身竟是鴉片船

香港水警總部建於一八八四年，距今已有百多年。這位位於尖沙咀山上的「將軍」，長年守衛着維港，負責看顧港內的船隻。水警總部內分為主樓、員工宿舍和報時塔等。主樓本是一所兩層高的建築物，至一九二零年代時，警隊獲得政府批准把主樓加建一層。而主樓旁的兩翼建築是已婚職員的宿舍。報時塔在十八世紀時十分重要，航海人員每每要依賴它才可得知準確時間。直到一九零七年，當訊號塔建成後，報時塔的重要性便漸減。

專載鴉片大型貨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侵襲香港。雙方經過十多日的對峙後，香港最終被日軍所攻陷。其時，日軍把水警總部封閉，後更在總部前的草地，加建地下通道，作為軍事用途。直至日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敗時，香港政府官員為了安全起見，將地下通道封鎖，並重鋪草地。後來，水警再次遷入，重新擔當守衛維多利亞港的要職。

對於以上水警總部的歷史，大家或許略知一二。但水警總部的前身是什麼，大家卻未必知道。原來水警總部前身是一艘運載鴉片的船隻。現時，水警經常在海上搜索船隻，檢查有否毒品之類的違禁品。但水警總部的前身卻是一艘鴉片船，確令



尖沙咀水警總部外貌

人有點兒詫異！

水警總部的前身是約翰·亞當號。它原是一艘大型貨船。自一八三四年起，這艘船以運載鴉片為主，經常來往印度與中國之間。後來，這艘船因為載運量過高，往返頻密，故船主認為不宜再作遠洋航行，於是將它賣給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後來把這艘大船重新粉飾一番，作為新成立的水警總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這位海上大將軍突然被烈火焚身，它最終亦逃不過葬身火海的命運。此後，水警總部便遷至岸上，其美麗的新居位於尖沙咀。

華人進入圖書館有時限

不少朋友閒時也喜歡到圖書館閱讀報刊和借閱圖書。不論你是什麼國籍的人士，也可以在開放時間內進入圖書館，借閱喜愛的圖書。但在十九世紀時，圖書館被視為高尚的地方，華人只可在指定時間內使用圖書館。

當時，大會堂博物館和圖書館的負責人由渣甸公司的大班威廉·賈士威克擔任。他規定在博物館和圖書館開放時間內，外國人可以自由出入，但華人卻不能享受同等權利，華人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內進入。若華人不遵守這一條規定的話，圖書館管理員有權將他們驅趕。

軒尼詩指種族歧視

當港督軒尼詩得知這個不合理的規定後，十分憤怒。他更指斥這個規定違反了英國的民主政治，有種族歧視之嫌。他對賈士威克說：「這是公益事業，就是為了讓所有人提高知識，何必要分不同的等級，請馬上改過來！」

但賈士威克卻不認同軒尼詩的說法，他說：「大會堂博物館和圖書館的經費主要來自各大商業機構，特別是渣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來源於政府，因此它們屬於民營機構，政府沒有權力指令我們作出任何變更。如果政府因此而撤消資助的話，我們也不在乎。」

港督軒尼詩從未遇過這般頑強的對手，故對於賈士威的回應感到有點不知所措。他們雖然經過多次討論，但始終未能達到共識。因此，軒尼詩向英國政府匯報，提出裁決的要求，當時他個人認為殖民地部會無條件地支持他。

可惜，答案剛好相反！殖民地部要求軒尼詩暫時擱置這場爭論，因為商業利益較為重要！軒尼詩認為這個命令難以接受，故決定辭職遠去。但英國政府不希望這位忠心耿耿的大臣離去，所以經過一番安慰說服工夫後，殖民地部批准他暫時離開香港休假，避開風頭，並口頭承諾支持軒尼詩的政策。有了這個下台階，軒尼詩只好從命。

《遐邇貫珍》成中文報刊鼻祖

不少朋友也喜愛閱報，我也不例外。現時，香港中文報刊的數量遠遠超過英文報刊，報業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數年前，香港報業更出現過減價戰，一些報刊更被迫停刊。回顧十九世紀，香港報業情況與現今大為不同，當時的英文報刊較為重要。

首份報刊：《華友西報》

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五日，《香港公報》（Hong Kong Gazette）在英軍支持下開始刊印。這是官方的公布，所以嚴格來說不是報刊，只是官報，但這總算是一個新開始！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七日，《華友西報》（The Friend Of China）創刊，成為本港首份報刊。一八四五年，《德臣西報》（China Mail）創刊，該報刊是鴉片商人渣甸所支持，其立場以英商利益為主。

這個時期，英文報刊發展迅速，與今時今日由中文報章主導的情況極為不同。一八五三年，英華書院《遐邇貫珍》創刊，創刊號有十頁，內容以傳揚基督教為主，其為香港中文報刊的鼻祖。《孖喇西報》於一八五八年創辦中文附刊《中外新報》，後來這份報紙得到廣告商垂青，於是改為以日報形式獨立發行，內容主要報導船隻及貨物資料。由於此報採用正式的

報紙形式，故部分史家視它為本港第一份中文報刊。

華人首份獨營報章

十九世紀初，英文報刊成為主流，內容以宣揚基督教或經濟消息為主，但很少涉及政治。而讀者以外國人士為主，他們大多居於中環，報社也多設於中環。當時，記者和編輯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度並不大，《華友西報》於一八五八年便因刊登了譴責政府高官的新聞而一度被迫停刊。可見那時市民大眾只可以閱覽政府官方認同的新聞。

由六十年代起，中文報刊發展較大。一八六四年，《德臣西報》翻譯員陳靄亭向德臣西報公司借用印刷機，並在當時名人伍廷芳的支持下，創辦了《華字日報》。一八七四年，王韜把已收購的英華書院印刷廠，改建為中華印務局。他後來更在該處成立循環日報社，創立了第一份華人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循環」的意思，是指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失敗，但仍可以藉報紙傳播革命思想，循環不息。陳少白於一八九九年，更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宣揚革命思想。

隨着中文報刊激增，報刊內容也相繼起了變化。政治性的內容較以往多，且內容與中國內地有密切關係。由於當時滿清政府腐敗不堪，不接納任何反對聲音，故令香港逐漸成為革命份子的立足地，宣揚反清思想。由此可見，報刊除了報道日常新聞外，還肩負起救國的時代意義。

中法大戰引發香港大罷工

一八八四年，法國爲求擷取更多利益，向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與法國在香港附近燃起戰火，港督寶雲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擔心戰火會影響香港，遂向英國政府求助，請求殖民地部支援香港的防務，建議在香港各個港口建立寨地築砲，用來防止來自海上的襲擊。寶雲更希望英國政府派出四艘戰艦來港，以加強防務。

英拒爲港防衛付鈔

可是，英國政府並沒有對寶雲的求救加以重視，大多數官員都認爲寶雲過分敏感。官員知道加強香港的防務是很重要的，但並非如寶雲所要求的那麼迫切和那麼多。在寶雲多次致函促請下，英國政府只好派出兩艘戰艦來港。然而，這兩艘戰艦年時已高，裝備落後。這令寶雲十分憤怒，但卻無可奈何。

英國政府不但輕視寶雲的防衛計劃，更把保衛財政的重擔全數推給香港政府，要求在原有防衛經費的基礎上，再增加五萬六千英鎊。

一八八五年，立法局通過了這個軍費分配方案。英國政府後來更額外要求增加軍費五萬四千英鎊。寶雲感到非常苦惱，正爲政府的財政運作而擔憂。

當時，英國政府宣布對中法兩國戰爭採取中立的態度。寶

雲便看準這個時機，鼓勵商人進行戰時貿易，鼓吹他們同時向中國和法國提供戰時物資，從中獲取豐厚利潤，以達到擴充香港經濟實力的目的。

不滿港府助紂爲虐

法國和中國獲得充分支援後，戰爭不斷擴大。而另一方面，寶雲這個政策間接地支持法國侵襲中國，令中國政府強烈不滿，市民大眾亦認爲香港政府的行爲無異助紂爲虐。於是，在一八八四年九月，香港碼頭工人、駁船工人及運輸工人等一起進行罷工，拒爲法國輪船進行貨物裝卸。法國政府和商人因此而感到不滿，認爲寶雲違反香港自由貿易的政策，損害法國利益。後來，法國商人更向英國法庭提出控告，十四名裝卸工人結果被法庭裁判有罪，須罰款結案。

十月，市民大眾對法庭裁判反應激烈，所有碼頭工人更因爲進行大罷工，香港港口頓時處於癱瘓狀態。但這場工潮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壓迫下，以失敗告終。雖然罷工失敗，但市民大眾的愛國心仍不減退。

世紀前的監獄生涯

爲了強化英國的殖民統治，香港政府早在一八四一年於香港島上建成第一座監獄——維多利亞監獄。這是香港在十九世紀時最主要的監獄，其管治權起初由總巡理府兼任。直至一八五七年，政府設立維多利亞監獄典獄長一職，專責獄務。

耳上刺青白水泡飯

早期，香港監獄中實行嚴格的種族分離制度，獄卒皆由歐洲人、印度人擔任，華囚和外國囚犯都必須分開監禁。據一八四三年《中國叢報》載：當時香港監獄中共有囚徒四百多人中，華囚約佔百分之九十，禁閉在兩所牢房中，其中一間長七十二英尺，寬二十九英尺，另一間長四十九英尺，寬十六英尺。外國囚犯約佔犯人總數百分之十，大部分是印度水手和士兵，也有少數葡萄牙人、英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的囚房長六十四英尺，寬三十英尺，平均每個外國犯人所佔的囚房面積比華囚大四至五倍。

華人經常在獄中被鞭打，刑具最初是藤鞭，後來則是有九種皮條的九尾鞭。一八五三年九月，政府頒布法例，要是犯人不守獄規，獄卒有權決定抽打十二至二十六鞭，並將犯人單獨禁錮三至十四天，期間犯人只准吃白水泡飯。麥當奴任職港督期間，爲防止華囚逃脫，他們的耳朵上都刺有箭形標記。再

者，麥當奴減少華囚的糧食，令華囚生活十分困苦，更有些死於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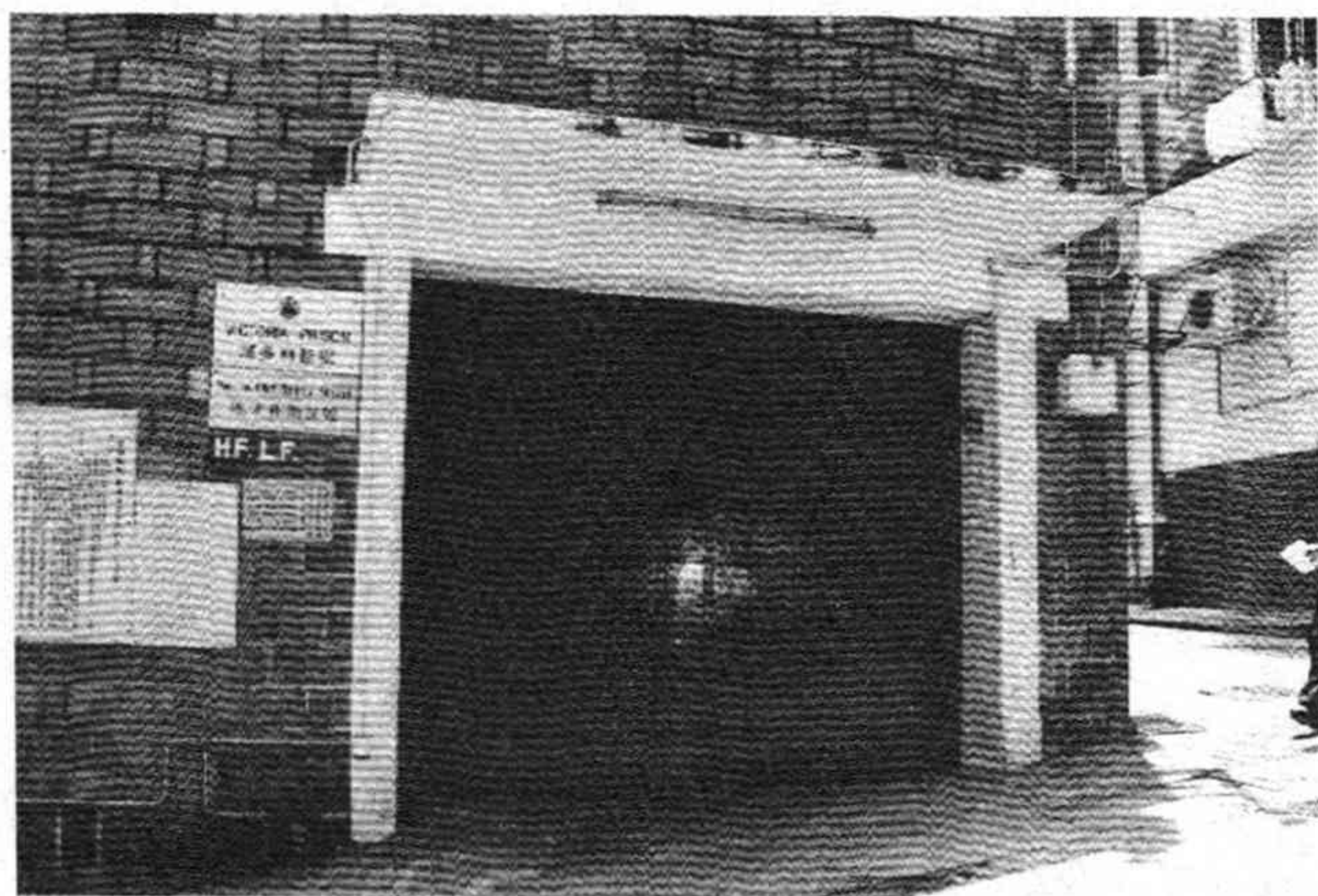
耄耋行乞慘遭刺面

當時的監獄擁擠不堪，香港總醫官在報告指出：

「獄中臭氣薰天，擠滿了上腳鐐的犯人，這種上鐐的方式將使人終身致殘。」

一八六三年初，爲了紓緩維多利亞監獄過分擁擠的狀況，政府購置了一艘舊船，名爲「壓羅爾色遜號」（Royal Saxon）。它停泊在昂船洲附近海面，政府把部分犯人押解到船上囚禁，並在昂船洲建立新獄。然而，這艘囚船的環境還比維多利亞監獄更加惡劣。其時犯人被鎖在甲板下的船艙，那兒異常狹窄，密不通風，這導致疾病流行，死亡率甚高。

爲了進一步擺脫獄中過分擁擠的情況，港督麥當奴於是宣



域多利監獄外貌

布對服滿三分之一刑期的華囚實行有條件的赦免。華囚須在面部被刺字後放逐到澳洲、新加坡或押解回籍。當時，兩名分別七十二歲和八十歲長期居港老人，因失去工作能力流落街頭，結果觸犯行乞罪而遭刺面和放逐。

一八七七年，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軒尼詩出任港督，他對華囚被虐的情況表示關注和同情。於是他向殖民地大臣提出三項建議：首先，今後對待中國犯人，只可鞭答一次，不可多次。其次，從判決鞭打至執行之日，犯人在此期間不再吃懲罰性飲食。第三，停止公開鞭打，改為監獄內執行。在軒尼詩的建議下，華囚的牢獄生涯才開始得到改善。

大頭綠衣

警察是維持社會治安的重要部隊。若警察不存在，盜賊猖獗，市民生活便得不到保障。不少朋友也會以為警隊成立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但事實上，早在英國佔領香港島不久後，警隊已經成立。

一八四一年四月，砵甸乍已設立了裁判司一職，並招募警察二十八名。他後來更招募二十五名印度籍警察，專責夜班值勤。當時，英國佔領香港不久，還未建立有效統治，於是一些匪徒乘時掠奪百姓財產。雖然警隊已成立，但罪案仍不少。一八四三年，政府成立治安委員會，委任四十二位有聲望的人士為委員，即為Justice of the Peace，中文譯為太平紳士，負責協助英軍和警察維持治安。太平紳士權力很大，除了可以入屋捉人外，還可以指揮現場和附近人士拘捕不服制止的人。不服從太平紳士指揮者，即被視作犯法。

警察部隊後來設立警察長一職，委任船長海利（Haly）擔任，但數天後改由船長布魯斯（Bruce）出任。政府官員從船長中挑選警察長，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人甚少願意當警察，他們都認為「好仔不當差」。結果，當時的警察多出身於英籍水手和印度籍兵士，但因為他們不懂中文，令執行職務時諸多不便。

一八四三年五月，政府決定重整警力。九月，英國派出警



灣仔警署外貌

司查爾·梅（Charles May）來擔任香港警察司。一八四五年二月，他決定從軍隊中招募歐籍人士擔任高級督察，並同時招募華人警察。結果，警察人數大幅度增加，維持治安的責任從這時起漸由太平紳士轉回給警察。

一八四七年，警察總人數已增至一百五十人，當中歐籍警察佔五十人，印籍佔八十一人，而華籍則佔二十四人。中央警署並於一八五七年正式成立。一八六零年，英國強佔了九龍半島，令管治範圍擴大，加重了警察維持治安的責任。除了警察人數不斷增加外，第六任港督麥當奴更於一八六六年成立了華人警隊，協助維持治安。香港治安自此逐漸走上軌道，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香港並不香

第九任港督寶雲離港與第十任港督德輔來港就任，期間相距長達二十二個月。英國殖民地部在這段過渡時期委任了輔政司馬殊擔任代理港督，後來他又被英國殖民地部委任別職，政務於是由駐港英軍司令金馬倫少將負責。

早期衛生問題嚴重

馬殊治港期間，香港環境衛生問題日趨惡劣。當時，排水系統未有改善，衛生設備依舊落後，市民大眾居住處臭氣沖天。雖然寶雲在職時已知道衛生問題的嚴重性，還成立了衛生委員會。但由於委員會欠缺有影響力的歐籍商人代表，結果委員會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爲了能早日解決這個累積多年的環境衛生問題，馬殊決定重組委員會。他增加了四名非官守委員，希望藉此改善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關係，更期望衛生委員會能擁有更大權力，加快改善本港衛生狀況。

結果，新的衛生委員會積極地提出改善建議。委員會成員一方面進行調查訪問，擬訂新的環境衛生方案；另一方面則提倡成立健康局，以令委員會擁有更大權力進行改革。當華人得知衛生委員會成員要求成立健康局後，群起反對。這是因爲華人大多居於衛生條件較差的地方，一旦健康局強迫執行衛生改革，他們便須花費龐大資金改建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屋宇。歷任

港督過去也多次表明進行衛生改革，改善華人居住區的衛生情況。但他們都只是强行清拆華人屋宇，一點也不提及賠償和安置問題。這不僅令屋主損失，更為租客帶來不便。

近五萬華人簽名抗議

直至馬殊離港，健康局的成立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金馬倫接任代理港督後，亦很重視改善香港環境衛生問題。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先要平息華、洋間的紛爭，更要立法作為保證。於一八八七年九月間，立法局在金馬倫的主持下，通過了《公共衛生條例》，取消成立健康局的建議，增加衛生委員會的人數。金馬倫除了繼續委派政府的總測量官、總登記官、警察司、殖民地醫官等為官守委員外，更把原來四名非官守委員增加至六名，還規定其中兩名必須是華人。這個新變動，是中西人士共同參與市政事務的開始，而衛生委員會的管理職能亦得以增加。但這條新健康條例通過後，華人社會中的不安仍未平息，他們依舊抗議，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第十任港督德輔抵港時，立即收到一份四萬七千名華人簽名的抗議書。這個難以解決的衛生問題，便留待他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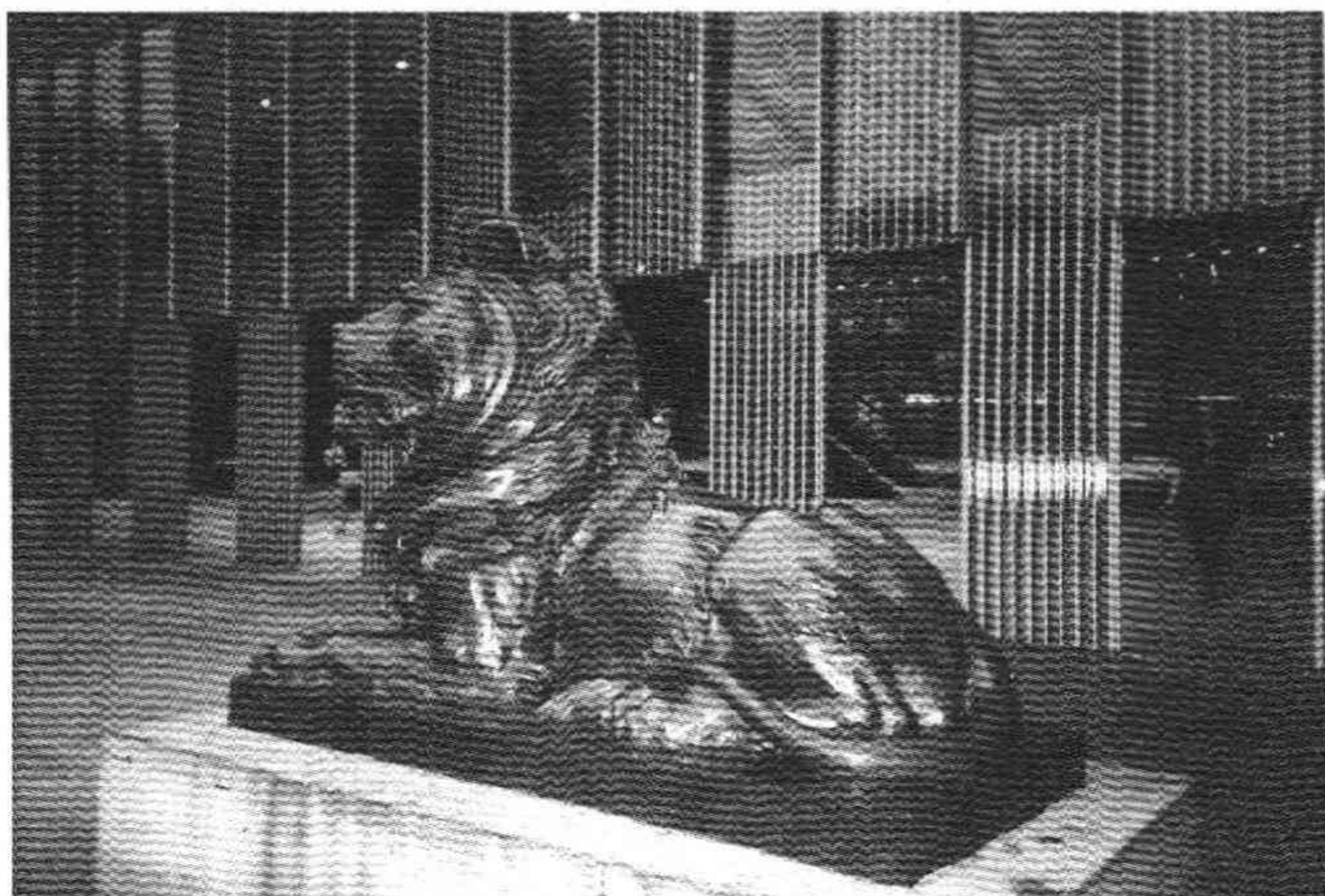
港府曾向匯豐借錢度難關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銀行多不勝數。不少人說本港銀行比米舖還要多，這絕對沒有誇張！大家只要到中環逛一逛，便可親睹本港銀行之多。本港銀行的歷史，要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五年，英國東方匯理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成為本港首間銀行。至於大家熟悉的匯豐銀行，則在一八六五年六月成立。匯豐銀行是香港歷史上第七間銀行，資本額為一千五百萬元。

借八萬元年息八厘

匯豐銀行成立首年，香港財政赤字高達九萬多元。港府隨即以年息八厘，向匯豐銀行借貸八萬元，以挽救當時的財政危機。香港現時經濟衰退，市民生活艱辛，情況與當年差不多。幸好的是香港政府財政充裕，不用如昔日般要向銀行借貸度日。一八七二年，匯豐銀行發行面額一元的鈔票，成為香港最早的紙幣。

香港至今仍未設立中央銀行。過往，匯豐銀行一直擔任着中央銀行的角色。香港在一八六七年發生了一場金融風潮，該風潮的起因是阿格拉與瑪特斯曼銀行設於印度的總行，因受到一八六六年印度棉業衰退風潮的影響而出現財政問題，令其香港分行發生擠提事件，後更結束營業。在連鎖反應下，香港六



匯豐銀行的標誌——銅獅子



匯豐銀行中環總行外貌



清廷曾向匯豐銀行借了逾千萬兩白銀修建頤和園

間銀行也被迫宣布結業。而匯豐銀行則憑着實力，得以化險為夷，不致在本港金融界消失。

清廷借錢修頤和園

一八七七年，清廷收復新疆後，急需經濟援助。左宗棠於是以關稅和稅票作擔保，向匯豐銀行借了五萬兩白銀。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時，亦同樣以海關關稅作擔保，向匯豐銀行借了白銀一千六百多萬兩。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大敗，國庫空虛，清廷於是再向匯豐銀行借白銀一千萬兩。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清廷無力償還條約中的賠款，又向匯豐銀行借貸三百萬英鎊。匯豐銀行可說是清廷的大債主。

匯豐銀行於十九世紀時，除了在香港經濟擔當重要角色外，更活躍於清代經濟。它為促進中港兩地的經濟發展而努力，可說是一位中港通的外國商家。

稅貢倍增妙計開源

德輔即位初期，香港繁榮興盛，政府財政收入充裕。當英國政府得知香港經濟狀況後，便向香港政府提出新的財政要求，規定港府繳交英國的稅貢，由原先每年約兩萬英鎊增加至四萬英鎊，增幅達一倍之多。

補足中區商用土地

雖然香港經濟發展旺盛，但政府亦難以負擔一倍多的稅貢。德輔頓感力不從心，但可惜成命難違，他唯有想辦法開闢財源，以協助繳付龐大的貢費。最終，德輔想出填海大計。

一八八九年，香港置地公司正式成立。這間公司是由歐籍人士保羅·遮打（Paul Chater）提倡集資組成。他在商界享有崇高地位，而且熱心於發展香港地產建設。香港置地公司成立後，董事局成員隨即策劃第一項大型投資活動——中區填海計劃。按照這個計劃，海軍船塢至屈地街長達兩哩的海岸被列入填海範圍，在此地填為平地後，便會開闢為新的街道。

干諾公爵主持奠基

當時，中區發展迅速，商用土地不足。保羅·遮打的填海計劃，正正配合當時所需，而政府高官亦很支持這個計劃。結果，中區填海計劃正式在一八九零年展開。適逢英國王子干諾



英國王子干諾公爵夫婦曾為中區填海計劃舉行奠基，干諾道因而命名。

（Connaught）公爵夫婦到香港訪問，德輔便誠意邀請他們參與工程的奠基儀式，干諾一口答允了。奠基儀式舉行當天，士紳商賢皆出席，熱鬧非常。

工程完畢後，新建的海旁大道被命名為干諾道（Connaught Road），至於干諾道後面的一條電車路，則被命名為德輔道（Des Voeux Road），以紀念德輔推動填海計劃的功績。

暴雨後重建記

第十任總督德輔任內，曾發生一場罕有的大暴雨。當時，市民大眾深受其害，被迫滯留家中，無法上學和上班。這場大雨發生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在大雨出現前數天，香港天氣一片晴朗。暴雨出現當天起，烏雲蔽天，大雨更連續下了十天之久，而最初三十六小時的降雨量竟高達三十八吋。

首要工作安置災民

後來，雨勢稍為減弱，曾一度出現陽光，但只維持了一小時，市民大眾又再次面對傾盆大雨。這場暴雨被當時官方形容為「一場殘酷的、帶着雷電轟鳴的大暴雨」。大雨來臨香港時，港督德輔正逗留在山頂公館中。而公館在狂風暴雨中猶如一隻小舢舨，雨水不斷從煤氣管道湧入，電話機也放出火花，公館內的僕人被嚇得不知所措。

身經百戰的德輔，無懼於這場暴雨，他沉着應戰，想辦法重建香港。當時，很多低窪地帶也被豪雨淹沒。至於山頂方面，泥石如瀑布般不斷從山上傾瀉而下。

在這個劣勢下，德輔作出了英明的決定，他認為首要安置災民，其次才重建交通。而市民大眾亦同心協力，共同為重建香港而努力。

開埠慶典顯示實力

大雨後的一年，開埠五十週年慶典和維多利亞女皇金禧紀念在香港舉行。雖然清廷與英國在一八四二年才簽訂《南京條約》，但英國士兵早於一八四一年登陸香港，故一八九一年正是香港開埠五十週年。由於當時雨災剛過不久，不少士紳亦認為不應大事鋪張。但德輔卻認為雨災已經是一年前的事，香港重建工作已完成，所以應大事慶祝，以顯示香港的實力。

德輔爲了組織這次紀念活動而花費不少。首先，他決定擴建港督府，增建一個大宴會廳，這項加建耗資四萬港元。宴會廳位於港督府的東面，面積達兩千四百平方呎，高二十六呎。宴會廳終在一八九一年初建成。二月十日，開幕儀式由德輔夫人主持，當時士紳名流雲集，熱鬧非常。這次開幕儀式證明了香港人自強不息的力量。香港人雖然在一年前面對暴雨的破壞，但一年後卻重現美好的建設。

德輔同年因患上惡疾，上書英國殖民地部請求提早退休。英國殖民地部五月時回覆德輔，批准他退休的請求。德輔返回英國後，再沒有涉足政界，他安心養病，平靜地度過餘生。

雲南瘟疫襲港

一八九四年，香港發生了一場名為Bubonic plague的瘟疫，患者身上長出不少結核，故又稱為「核子瘟」。後來，每隔一兩年，在春夏交替之際，瘟疫又在香港肆虐。醫生對此束手無策，不少人因此而病死，這種瘟疫直到一九零二年後才告消滅。當時，香港人口已達二十四萬餘人，其中華人佔二十三萬餘人。一九零零年，人口也只有二十六萬多人，當中華人佔二十四萬餘人。華人人口在六年間只增加了一萬餘人，充分反映了瘟疫的嚴重性。

拆毀疫區改建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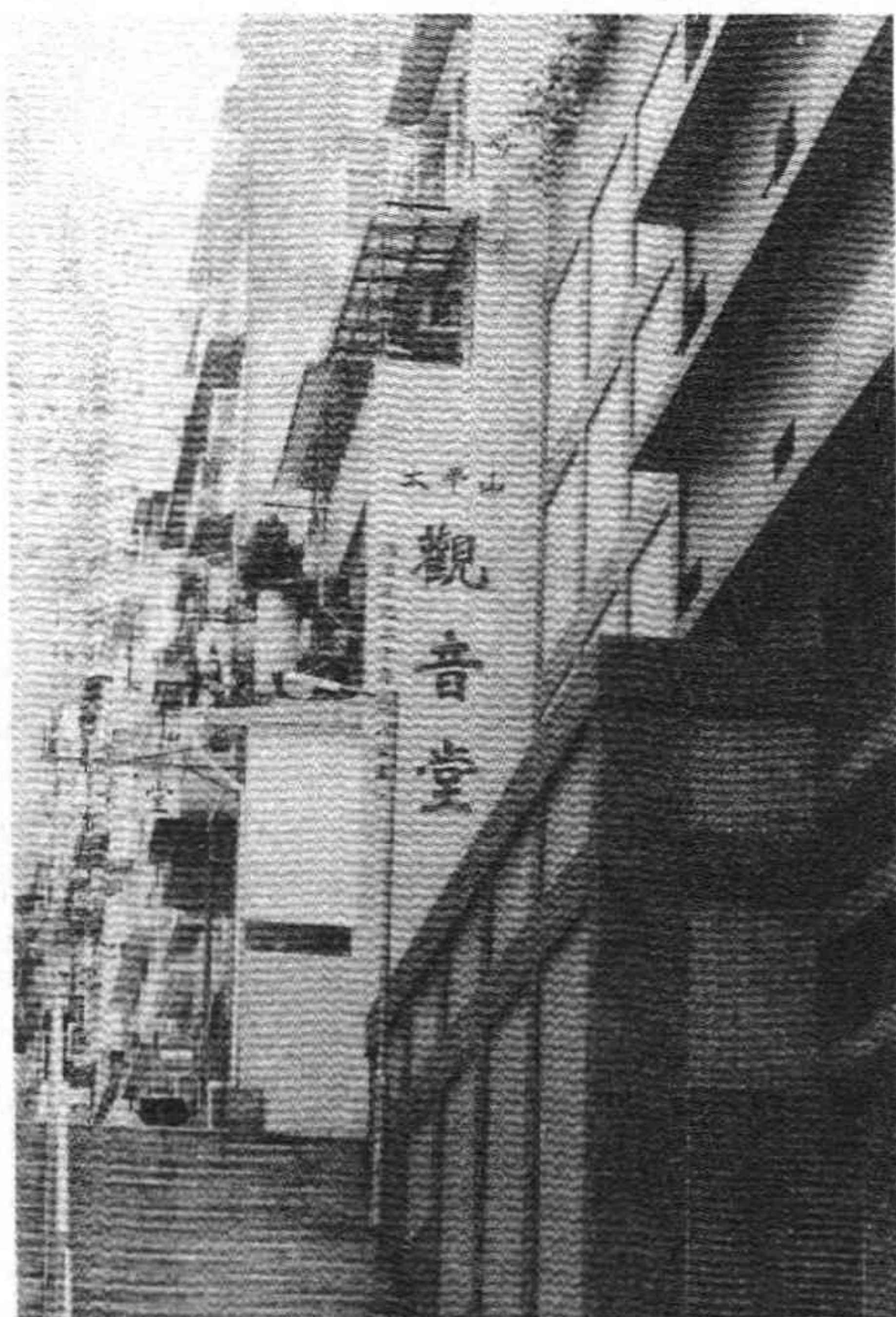
這次瘟疫據稱來自雲南，在一八九四年才開始襲港。起初，染上瘟疫而至死者已高達一百三十人，後來更增至四百五十人，染疫者多是居於上環太平山區的居民。衛生人員為了徹底隔離瘟疫病毒，下令封閉該區，而區內民居建築亦被拆毀，改建為公園，即今日的卜公花園。

瘟疫發生後，政府隨即宣布香港為疫埠，禁止染疫者出境。當時，華人曾聯名請求政府批准染疫的華人回鄉治療，但卻被港督羅便臣拒絕。一些外商打算離港，希望離開疫源。而不少華人員工為了防止染上瘟疫，亦紛紛向僱主請假還鄉。香港一時間變成死港，經濟生產急劇衰退。

當時，患病者多留在家中以中藥治療，倘若被衛生人員發現，會立刻被強迫送往西醫醫院。為防止擴散傳染，染疫者的住處會被全面消毒。至於染病而死者，屍體須先藏以石灰，才可埋葬。其時華人染疫者怕事，故多隱匿不報，死後則被秘密棄屍街頭。

加速改善食水供應

一八九六年，廣州亦發生瘟疫，羅便臣作出讓步，批准染疫者出境，而染疫者的屍體也可運回原籍安葬。羅便臣經過分析後，認為華人住宅區衛生環境惡劣是導致瘟疫的主因。因



太平山觀音堂

此，羅便臣頒布嚴格的建築物條例，拆除不合衛生的中式房子，數目約佔全港民房的十分一，並下令增加華人居住地區的食水供應，還加緊重建地下水道。

自一八七零年起，東華醫院一直以中醫治病。直至一八九六年，一些西醫及外國人士要求解散東華醫院，將其改為公立式的平民醫院，並以西法治病。他們指出以中醫治理疫症存在問題，羅便臣於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成員包括輔政司史徒華、何啓和遮打等。最後，委員會認為東華醫院以中醫治病是適應華人的特別需求，還可補充政府醫院的不足。委員會建議政府委派一位曾研習西醫的華人擔任掌院，考查在醫院裏病死的人，編製正確的死亡統計。

爲了獲得準確的死亡統計，政府決定接受委員會的建議，撥款僱用西醫書院的畢業生鍾本初爲掌院。而東華醫院又自組顧問委員會，共謀改善院務。

以上的措施推行後，瘟疫才告絕跡。近年來，禽流感侵襲香港，香港市民又受病毒的滋擾。百年前的瘟疫，百年後的禽流感，人類似乎總與疫病分不開！

香港大學早期只收男宿生

香港西醫書院於一八八七年正式成立，專門培訓醫療專才，孫中山先生更是該校畢業生之一。但西醫書院是由私人創辦，而且只培養醫學人才。自二十世紀開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迅速，對各方人才需求愈趨迫切。因此，當時不少有識之士不斷通過傳媒鼓吹成立一所大學。

建大學擴英人利益

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商報紙》所刊登的社論指出：

「在香港設立一所大學，會成為一項帝國投資，對於英國繁榮來說，為此目標使用一筆公費，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



香港大學外貌

這樣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說：二十世紀的遠東是屬於日本的。」

可見當時英國商人亦極渴望香港能建立一所大學，藉以維護和擴展英國人在亞洲的利益。

同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陸續建立新式的教育。當時，一些西方國家爲了增加其在華的影響力，於是也在中國內地創辦大學。不少學生更往外地求學。從當時投考高級牛津港區試的三百一十六名合格學生數字來看，香港學生已達到入讀大學的水平。因此，爲配合當時所需，香港政府官員便利用這些資料和傳媒輿論向英國政府申請在港建立一所大學。

在香港政府與英商積極籌劃下，香港大學隆重的奠基典禮終在一九一零年舉行。而香港大學於一九一一年三月正式成立，立法局更通過了《香港大學條例》。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正式開課，當時只有七十七名學生，全都是華商士紳的子弟。香港大學成立初期，學制定爲四年（醫科是五年），學科包括文科、工科和醫科，而全部學生均是男寄宿生。

高等教育發展里程碑

當時港督盧押在香港大學開學典禮上表示：

「本校的畢業生將會把他們受訓期間在校園及宿舍裏形成的人生觀、責任感、性格和理想帶到中國去。而如他們會說英語一樣，他們也會體現從英國教師那裏獲得的訓練。中國無疑



香港大學的校訓為「明德格物」

會有他自己的大學，但我們是這方面的先鋒，而本大學則在英國的自由制度下成長，享受着與英國大學為伍的好處，它將會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威信，為中國的大學樹立一個榜樣，並給予後來的大學以協助和指導。」

以上便是香港大學創辦初期的宗旨，其以英人的利益為依歸。

結果，香港第一所大學就在西醫書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後來，不少史家也視孫中山先生為香港大學早期的畢業生。

新界士紳力戰英軍保家園

一八九九年，英國乘清朝衰弱，提出租借新界的建議。但在正式簽訂租借條約前，香港政府已派出警察司梅軒利（Henry May）進入大埔搭置警棚以作準備。由於當時梅軒利沒有通知清政府和知會當地居民，故不少新界居民得知此事後深表不滿。一些鄉紳更集資購買武器，以作對抗英軍之用。

鄧族反對英人接管

從一些英國現存檔案中，可得知當時新界居民對於英國強租新界的不滿，以下是一些節錄：

「農曆二月十七日（即新曆三月二十八日，下同），梅軒利到屏山，欲覓一建警署之高地，該處有山崗名消灑窖山，宜於蓋搭棚屋，作為臨時警署之用，惟遭屏山鄉人反對，認為破壞風水。多人群集於鄧氏山門外，群情洶湧，指其不應默許。

農曆二月十八日（三月二十九日），鄧族父老鄧朝儀、鄧芳卿、鄧青雲、鄧衰臣、鄧礪生及鄧林，在廈村鄧氏大宗祠集會，屏山、廈村一帶鄉人雲集鄧氏宗祠前，均反對英人接管該地，其中廈村父老鄧國林、鄧青山、鄧植亭等反對最烈。

農曆二月十九日（三月三十日），元朗又舉行集會，反對英人接管租界。此集會包括八鄉、錦田及十八鄉父老。此外，屏山、廈村、屯門各區，均有代表參加。會中咸指英人租借此

地，實為購地公司所促成。其中鄧國林及青山代表杜堂滔指出英人風俗習慣均與中國迥異，實難保全各鄉傳統，力主以武力反抗。各鄉代表均舉手附和。惟餘則力排衆議，謂：此地既為皇上租與類人，若反抗則違抗聖旨，諸君宜加考慮，此其一也；若反抗，則宜從人力、物力、財力三方面考慮，以吾人之財力、物力，能抵抗英人乎？

農曆二月二十一日（四月一日），廈村父老鄧青士致函雙魚洞、上水、粉嶺、新田、大埔各鄉父老，上水廖雲谷、粉嶺彭沙垣、大埔鄧茂、丙崗候翰階、新田文禮堂，均應邀出席，到元朗開會。會中議決通告各鄉鄉人約束子弟，不許為英人工作，一致通過以武力對抗英人接管。推舉余為起草人，余唯唯以應。鄧青山乃主張以武力反抗最烈之人，為主此派之首領。余曾勸其認清形勢，蓋英國為一強國，不易由武力將其擊敗。惟鄧青山不受勸告，指為購地公司之陰謀，購地公司借外人之力量來接收土地，宜全力反抗，必可獲勝。」

港督遣軍炮轟海岸

由此可見，新界鄉民對英國租借新界甚為不滿，更準備用武力反抗。當時，一些瞭解時局的鄉紳明知英國兵力強大，鄉民實難以與其對抗，但士紳們為了保家園，不惜犧牲一切，力戰到底。

當時，新界四百多條鄉的士紳成立了太平公局，購買武器彈藥和招募壯丁。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港督卜力派軍艦駛



大埔文武二帝廟外貌

往大埔吐露港，以大砲轟海岸，為英軍登陸作掩護。經過一番激戰後，英軍控制了大埔附近的山頭，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得以成功進入大埔，後來更於大埔的墟頭舉行升旗儀式，宣布英軍正式進駐新界。

老鼠有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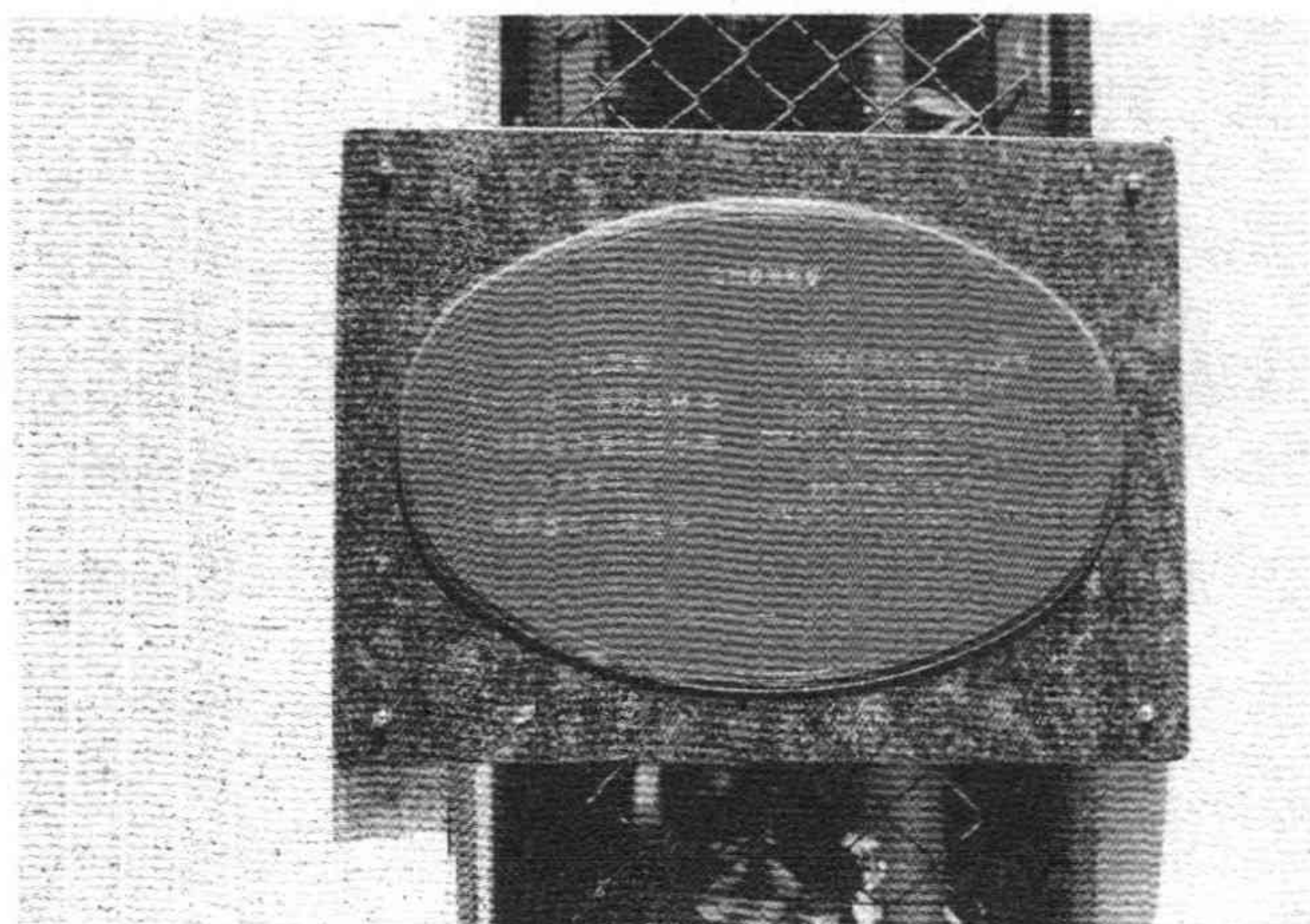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末，中國政局動蕩不安。外有列強侵略，內有百姓起事。清室雖曾進行兩次改革圖強，但最終也告失敗。在這惡劣情況下，沿海百姓黎民乘時逃離中國，其中不少廣東等地居民湧入香港。一八九八年，香港人口只得二十五萬；到一九零一年，已經增至三十餘萬。

偷運港外老鼠圖利

二十世紀初，人口迅速增長，香港衛生情況急劇惡化。自一八九四年香港發生了大瘟疫後，前港督羅便臣立刻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本港的環境衛生。可惜，這些措施大多未有成效。據史籍記載，十九世紀末，香港平均每年都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多人死於瘟疫。隨着大量新移民湧入香港，情況更形惡劣，一些歐籍人士也不能倖免於難。

當時，醫學人士對瘟疫病毒進行仔細分析，認為源自老鼠散播引致。香港政府為了徹底消滅瘟疫，決定推行滅鼠運動，號召居民人人動手滅鼠。為了鼓勵市民大眾齊來滅鼠，政府甚至出錢收購老鼠，來推動滅鼠運動。是時，一隻老鼠的價值竟高達兩個先令。

新移民來港後，失業率高企。不少市民也要面對經濟困境，苦不堪言。當他們得知貢鼠有價時，立刻加入捕鼠行動。



鼠疫曾肆虐香港近三十年

一些人更以捕鼠為業，添置不少捕獵工具。一九零零年間，政府官員們共收購了四萬三千多隻老鼠，成績理想。但香港的鼠患卻有增無減。事後，政府官員調查因由，發現收購的老鼠大多不是港島土生，而是來自於新界和廣東沿海各地。原來一些貪利之徒，利用政府收購老鼠之機會，竟從港島以外所捕的老鼠，偷偷地運進了香港，以求換取收入。當時，港督卜力得知後，真是有點哭笑不得之感。捕鼠換銀行動也告一段落。

強制推行城市清潔

為了改善香港的環境狀況，卜力只好採取一些新的措施。首先，卜力提出對環境惡劣的地方進行消毒清洗的建議，以徹底消除瘟疫。可惜，這個建議卻遭到不少社會團體的反對。他們認為這種做法與收購老鼠相似，會勞民傷財，成效不大。不少市民更擔心會影響居所及工地，因此，大家都作出強烈反

對。作為一個新任港督，卜力接受了這些社會團體的意見，不強行對環境惡劣的地方進行消毒。

後來，政府更擬定一份環境衛生調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政府指出改善香港環境衛生是當務之急。否則，香港市民健康將受損無窮。首先，香港市內一些不合標準的建築物必須進行清拆及重建。其次，鼠患和蚊患一定要有效地加以控制。根據這份調查報告，政府在一九零三年頒布了醫務衛生及建築條例，強制性地推行城市清潔、屋宇改造及防止老鼠蚊蟲滋生蔓延的計劃。自這些新計劃推行後，本港環境衛生才有較大改善。

九鐵修拱橋破世界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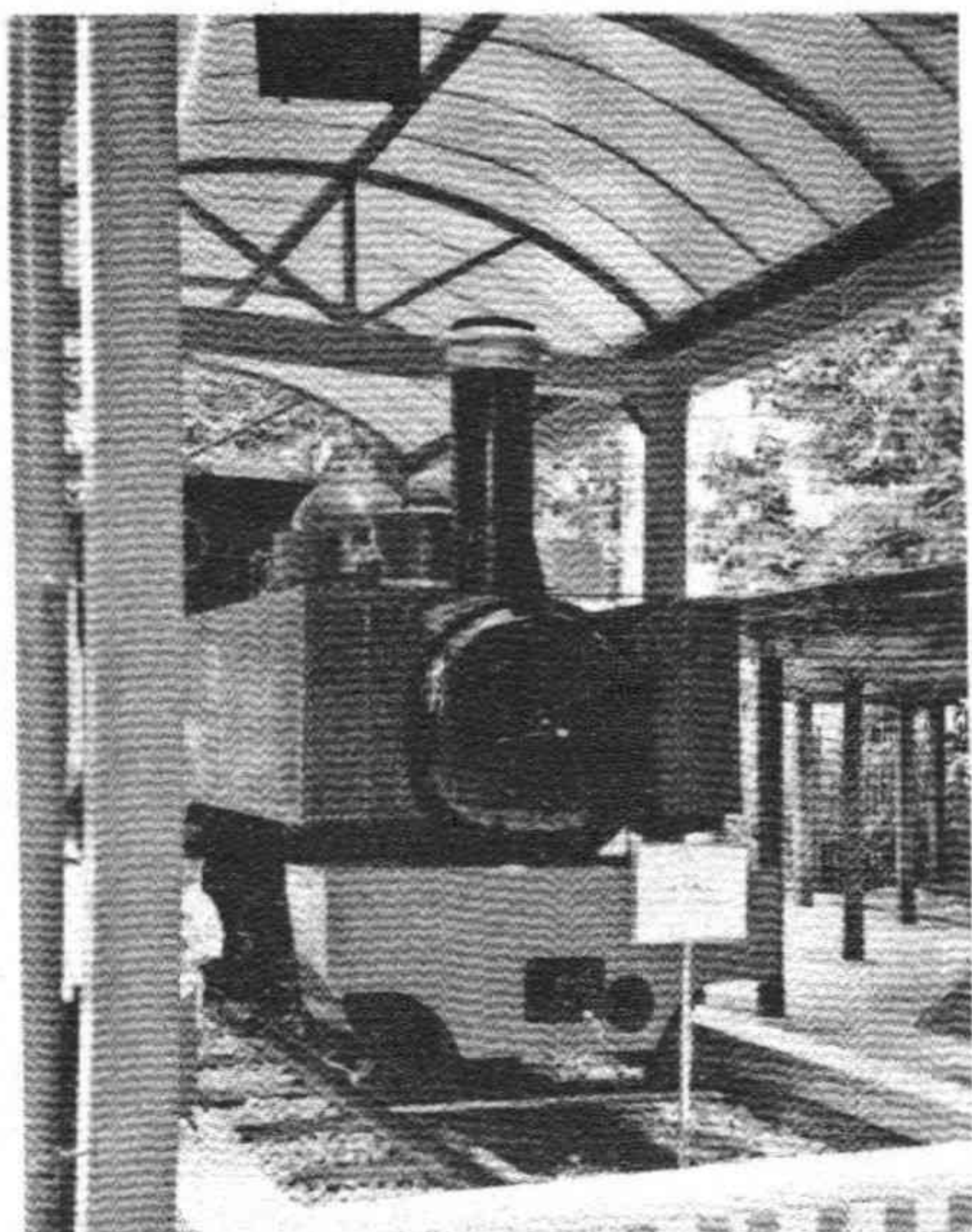
一八九八年，英國剛租借新界後，便建議修築九龍與廣州之間的鐵路。過去，英國商人一直在廣州通商，瞭解廣州之重要性。若九龍與廣州能連成一線，英國更易深入中國，擷取更多的利益。

詹天佑任鐵路顧問

一八九九年三月，英國經過多番遊說後，終於與中國簽訂了《九廣鐵路合同》，並迫使清朝鐵路大臣盛宣懷簽訂有關草約。九廣鐵路原計劃修築一百二十一英里，中間以深圳羅湖橋為界線，分為英、華兩段。英段部分由英國政府負責，資金由英國政府在香港以公債集資；華段部分由中國負責，由於清廷



昔日火車車廂



舊式火車展覽

多次戰後，賠款太重，根本沒有足夠資金興建鐵路，只好向英國借款。

一九零一年，中英兩國簽訂嚴苛的借款條約，借款額為一百五十萬英鎊，年息為五厘。中國每向英國借貸十萬英鎊，中國只實收九萬四千鎊。九廣鐵路的華段

是從廣州大沙頭到深圳羅湖橋。一九零七年，工程人員開始動工。鐵路雖然由英國人擔任總工程師，但著名的鐵路建築師詹天佑也擔任鐵路顧問。鐵路建設開始時，困難重重，僅修建鐵路拱橋一項就破了當時世界築路史之紀錄，鐵路全線共建築七座大拱橋。當時，中國工人只用了四年，便修築完成。

每里建築費一百二十萬

英段方面，鐵路由羅湖橋至尖沙咀。一九零九年，香港工人開始動工。鐵路長度雖短，但建築費卻是十分昂貴。據資料統計，每公里的建築費竟高達一百二十萬元。新界山脈繁多，崎嶇不平。修建工人要開鑿六個山洞，修築三十八條橋樑、還

要填補不少土地。其中以開鑿獅子山鐵路隧道最爲艱辛，所挖泥土最多。

一九一一年，九廣鐵路落成通車。當時，港督彌敦爲了將這條鐵路修築到九龍半島的最南端，不惜斥巨資在尖沙咀進行填海工程。梳士巴利道就是當時的新填地。著名的九廣鐵路終點站及鐘樓就是在梳士巴利道的末端。一



昔日九廣鐵路九龍終站位於鐘樓附近

九一六年，終站正式開幕使用。

關於九廣鐵路的興建，中英雙方曾多次爭論。原定通車大典由兩廣總督和香港港督一起主持。後來，太多不愉快的事件發生。結果，雙方決定改爲由次一級的官員主持。香港以輔政司爲代表，廣東方面則由次官李清芬和陳望曾爲代表，火車原計劃是從九龍尖沙咀直接通往廣州，後也改爲各自通車。

一九一一年八月，通車典禮如期分段舉行。港方輔政司在未建成的臨時尖沙咀火車站主持通車典禮，然後從嘉賓門登上火車，直接通往深圳羅湖。廣州方面由李清芬和陳望曾從大沙頭火車站乘坐第一列火車，開至羅湖。然後，穗港雙方官員在羅湖橋上，主持接軌典禮。

人物千秋



大海盜張保仔搖身變武官

香港位於南海之濱，多年來不斷有海盜出現，其中以張保仔最爲著名。清乾隆末年，越南爆發內戰。叛軍首領阮光平戰敗，兒子阮景盛則逃離越南。他聯同廣東及福建地區的海盜，如鄭七、梁寶、郭婆帶等回國擾亂治安。後來，在一次攻打越南的戰役中，阮景盛戰敗而亡，鄭七等海盜便將他的戰船瓜分，勢力不斷提升。

擁賊四萬東涌爲據

鄭七死後，他的心腹鄭一便成爲首領，以香港作爲根據地，並四處搶劫。其時，香港海盜派別衆多，分別以紅、藍、白、黑、黃、青等旗色以作辨別。紅旗的首領是鄭一，藍旗的首領是麥有金，白旗的首領是梁寶，黑旗的首領是郭婆帶，黃旗的首領是吳知清，而青旗的首領是李尚青。

張保仔，原名爲張保，廣東省江門人。張保仔本爲一名漁家子弟，十五歲跟隨父親出海捕魚時，不幸遇上海盜鄭一。鄭一除了搶劫張家外，還把張保仔擄了。他覺得張保仔並非凡夫俗子，於是將其招撫爲手下。張保仔精明能幹，處變不驚，很快就升爲小頭目。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鄭一遇上颱風，死於大海之中。鄭一的妻子被海盜們擁立爲首領，人稱鄭一嫂。



張保仔洞街牌

鄭一嫂十分器重張保仔，委其擔任要職。她與張保仔後來發生戀情，更將海盜統領權交給張保仔。自此，張保仔便成為稱霸一方的大海盜。據說張保仔甚少對細小的民間漁船進行侵擾，搶劫對象多是遠涉重洋的商船。張保仔的黨羽有四萬多人，而船隊則有三百多艘。

張保仔以大嶼山東涌作為基地，在香港島西營盤和鰂魚涌均設有寨台。清朝軍官曾屢次進行圍剿，但皆失敗而回。水師提督孫全謀更與葡萄牙艦隊共同圍攻張保仔，但仍無法取得勝利，他們最後唯有撤兵遠退。

歸降清朝官拜二品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年），黑旗首領郭婆帶向清廷投降，並表示願意協助討平張保仔。當時，兩廣總督百齡不但沒有加罪於歸降的郭婆帶，還對他加以獎賞。張保仔眼見不少海

盜先後歸降，清軍在海上的勢力不斷提升，形勢對其極不利。另一方面，百齡發放消息，聲稱張保仔若願意投降的話，清政府將予其三品官職，封鄭一嫂為三品夫人，部下則會按地位高低賦予官職，不願當官者就予以獎賞和耕地。

當時，多次替張保仔治病的澳門名醫周熊飛得知這個消息後，主動地擔任說客。由於他過往曾多次替張保仔治病，所以深受張氏信任，而他同時是百齡的好友，故由他擔任說客，可說最適合不過。張保仔聽過周熊飛的仔細分析後，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年），終決定在香山縣縣城石岐鎮歸降。

張保仔投降後，清朝政府委其擔任要職，並賜予重賞。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張保仔被升為福建閩安協副將，成為二品武官。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他更被升為總兵，但因林則徐上疏指其過往曾當海盜，或會驟變作反，不宜擔任總兵一職，故張保仔最終未能升任。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張保仔因急病而與世長辭，鄭一嫂則在澳門隱居，過着淡泊的生活。



張保仔洞出口處

砵甸乍：確立三權分立

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另一譯名為璞鼎查），是軍人出身。一八四一年八月，他率領英國艦隊到達中國，最終把衰弱的清朝打敗。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被迫簽訂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便由這天開始。

預言港成商業中心

早在《南京條約》簽訂前，香港已被英國佔領。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砵甸乍抵達香港，主持香港政務。兩日後，他將印度盧比、英國銀幣、西班牙銀洋、墨西哥鷹洋和中國銀錠一律定為法定貨幣，在市面流通，可見當時的香港已是一個小型的國際貨幣交易所。

為了鞏固其統治，砵甸乍仔細地對全島進行調查，並撰寫了一份報告，上呈英國政府。報告中指出，香港雖是一個貧瘠的島嶼，但它卻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和經濟地位。香港水深港闊，具有一切發展成為商業良港的條件。

再者，香港地處要衝，將對南中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發揮重要的影響力。砵甸乍更在報告中預言：「香港將會發展為一個巨大的商業和財富匯集的中心。」故英國政府應盡力保護這個小島。



砵甸乍街街牌

創立法庭自任裁判

當向英國政府匯報後，砵甸乍便開始建設香港。首先，香港被劃分為三區，分別是海域區、城市區和郊外區。海域區是指離海岸二百呎範圍內的地方，而城市區是指今中環海岸、赤柱、跑馬地和香港仔等區，郊外區則指餘下的地區。砵甸乍劃分行政區域後，於一八四三年一月四日創立了法庭，並親自擔任裁判官。起初，他用英國軍法來審判案件，直至英國派出法官休姆來港把軍法廢除後，才改用民法審案。

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維多利亞女皇簽署了香港憲章，並以英皇制誥的名義頒布，香港自此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同時設立香港港督一職，且由砵甸乍擔任。六月二十六日，砵甸乍宣布成立議政局（後來改稱為行政局）和定例局（後來改稱為法政局）。由這時起，香港正式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機



砵甸乍街俗稱石板街

構。

為使香港成為英國的東方站腳地，砵甸乍盡心盡力建設香港。可是，當砵甸乍要求英國商人協助建設時，他們毫不合作，只求賺取金錢。結果，香港並無突破性發展，砵甸乍最後致函英國外交部，提出辭職要求。一八四四年五月，戴維斯來港接位，成為第二任港督。砵甸乍返回英國後，擔任樞密顧問官一職。他於一八五四年離開政壇，並不幸於兩年後病逝，終年六十七歲。

戴維斯：寧管華人不管英商

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是香港第二任港督，十八歲已到廣州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工作。英國政府於一八一六年派使節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商討兩國貿易事宜。在東印度公司中工作的戴維斯被抽調為漢文正使，陪同阿美士德北上。後來，中英雙方因禮節上出現分歧，結果他們無功而還。

對英商販鴉片反感

一八三三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正式成立，戴維斯則被委任為第三商務總監，後因工作表現出色而被升為第二商務總監。在職期間，他對中國的政治、詩歌、風俗等方面均有強烈興趣。例如他曾將不少中國詩歌翻譯成英文，以便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因此，不少人稱他為「中國通」。但戴維斯對於當時日趨猖獗的鴉片貿易十分反感，故於一八三五年辭職，並返回英國。

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爆發。一八四二年，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第一任港督璞鼎查後來因為得不到居港英國商人和軍人的支持，感到孤立無援，所以辭職回國。英國政府隨後改派熟悉中國事務的戴維斯，擔任第二任港督。一八四四年五月七日，戴維斯抵達香港。

當時，由於戴維斯曾反對鴉片貿易，故不少居港的英國商人對這位新港督並無好感，多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戴維斯深知要在香港有建樹，就必須得到居港英商的支持，因他們在香港有極大的影響力，操縱着香港的未來發展。可惜，英商認為戴維斯會破壞興旺的鴉片貿易，所以由始至終他都不被英商信任。戴維斯遂致函外交部，表示他寧願管治兩萬多名中國人，亦不願管治數百名英國商人。

建賽馬場改善關係

賽馬是英國人的時尚活動，自英國佔領香港後，英商很希望能在香港舉行賽事，但香港卻缺乏賽馬場，故英商只可以每年在澳門舉行一次賽馬。爲了與英商改善關係，戴維斯於薄扶林村興建了一個賽馬場，並在每週週末舉行賽馬活動，希望以此博取他們歡心。在一八四五年的一個週末，他表示將會親臨馬場，頒獎給優勝者。

戴維斯親臨馬場頒獎當天充滿自信，希望藉此機會改善雙方關係。但事與願違，當英商得知戴維斯蒞臨頒獎後，便採取抵制行動，不准任何一匹馬出賽，戴維斯只好失望而回。

改革大使寶寧

第四任港督寶寧任職期間，主力雖然放在與滿清政府的交往上，但在管治香港方面亦有一番作為。寶寧於政治上一向主張透過選舉令從政者晉身立法局，但就認為從政者應繳納一定地租才可取得選舉權。因此，這種選舉只是階級選舉。儘管這方案最終沒有執行，但在一八五五年，政府也原則上同意提拔一些中國人擔任某些重要的行政職位。三年後，政府更通過法例，允許中國人作為陪審團的成員，並擁有擔任律師的資格。另外，寶寧曾嚴厲打擊政府部門內貪污賄賂的風氣，令不法勾當一時大減。

制訂方案改善教育

寶寧考慮到香港的居民主要是中國人，他們文化程度的高低，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成果有直接影響。於是，寶寧決定在教育方面着手。他制訂了一系列教育方案，務求改善本港教育質素。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九年間，政府資助的學校由原先的五間增加至十九間。一八五九年，全港入學的男生已有八百七十三人，而女生則有六十四人。

於治安方面，自一八五八年成立了中央警署後，警察人數倍增。當時的警察有「大頭綠衣」之稱，因為他們的制服顏色以綠色為主，而所戴的帽是用竹製成的。為了改善治安，香港

島被劃分為五個區域，當中四個區稱為「四環」，包括下環、中環、上環和西環。下環自灣仔道起到軍械廠為止；中環自威靈頓街起到瑪利街為止；上環自威靈頓街起到舊國家醫院為止；而西環則是自干諾道西起到堅尼地城為止。而另一個區稱為「山頂區」。四環又再細分為九個小區域，詳見下表：

第一約	堅尼地城至石塘咀止
第二約	由石塘咀至西營盤止
第三約	西營盤
第四約	干諾道西的東半段
第五約	上環街市至中環街市
第六約	中環街市至軍器廠地段
第七約	軍器廠至灣仔道止
第八約	灣仔道起至鵝頸橋止
第九約	鵝頸橋至銅鑼灣

有了治安分區後，各區警察便能更清楚明確地執行其職務。

華洋刑法一視同仁

刑法方面，寶靈在職其間，法治精神得以確立。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輪船馬斯狄夫號抵港。三名英籍水手鍾士、威廉及劫本因貪圖船上的藏金，故商議潛入船主室偷取，但他們的對話無意間被華人船員阿胡聽到，阿胡向船主匯報。當船主得悉後，便立刻報警求助，然而警方登船後卻未有



寶寧街街牌

任何發現。翌日，船主卻發現藏金全部失去，阿胡同時間失去蹤影。警方其後派員搜查三名英籍水手的房間，但未有發現藏金，故他們認為阿胡偷金潛逃。十二月三十日，海面發現一具浮屍，經驗屍官證實那是被勒死後拋入大海的阿胡。警員再次搜查三名水手的房間，結果搜出全部藏金。一八五九年三月二日，高等法院以謀殺罪判處鍾士和劫本死刑，而威廉則被判無期徒刑。三月七日，有二千多名市民觀看鍾士和劫本被執行死刑的過程。從中可見，寶寧任職期內的刑法也是一視同仁。

一八六零年，寶寧返國，被受命調查英國與意大利之間商業聯繫的發展狀況，並同時被招攬為皇家協會會員。寶寧一生著述甚豐，當中包括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論文，以及描述東方的詩詞等。寶寧於一八七二年逝世，而其兒子盧因在他去世後不久，根據他所遺留下來的一些資料，整理出版了一本《寶寧爵士自傳》，總結了寶寧的一生。

羅便臣：百政水爲先

一八五九年九月九日，第五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抵港履行職務。他是香港有史以來首名不需要兼任駐華商務總監和全權大使的港督。由這時起，羅便臣和他的繼承者便不用分心於其他事務，並可以專心一致爲香港的前途而設想。

整肅政風開新紀元

羅便臣繼位後，隨即整肅政風，把香港帶進新紀元。首先，五朝元老威廉堅吾要求退休，按察司曉吾也告老回國。而首席裁判司都德·戴維斯亦辭職離去，加入中國海關的工作。助理裁判司密轍爾也遞上辭職信。這些事情全都是發生在一八五九年。

一八六零年八月十三日，羅便臣委派的「公務員瀆職調查會」重新調查高和爾。當調查工作快將完成時，袒護高和爾的布烈治已悄悄離港。調查會舉行了三十天的會議，終於裁定高和爾勾結海盜的罪名成立，即時解除其公職。而警察司查爾梅則被判無罪。高和爾所引起的風波到此才告終結。

除整肅政風外，羅便臣還積極改善民生政策，當中以提供自來水的政策最爲著名，並獲得顯著的成果。自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外國居民常被瘧蚊傳染的熱病所感染，死亡率頗高。而外國人稱此病爲「香港熱」（Hong Kong Fever）。後來，隨

着華人人口急劇增加，不少華人被迫居住於狹窄的居室，家旁街道滿布垃圾，渠道充滿污水，令染上「香港熱」的華人逐漸增多。

供自來水改善生活

每逢夏天，熱病便更加流行；待秋天轉涼後，此病才告暫緩。一八五八年，前任港督寶寧的衛生局長哈蘭醫生，據說也是從患病的華人中染得該病而病逝。他已是第四位死於熱病的衛生局長。哈蘭生前曾多次要求改善衛生環境，設立排水系統及加緊清理垃圾，然而衛生局所修設的工程，總是趕不及市民的實際需要。

除了熱病外，霍亂也曾對香港居民構成威脅。一八六二年，霍亂在中國內地和日本等地非常流行。爲了防止霍亂流入香港，羅便臣委派了一個公共衛生委員會，負責檢討本港的衛生政策，預防霍亂病蔓延和傳播。委員會指出：「要對市內的排水系統進行改建，必須認真地處置從醫院排放出來的污水，爲港島居民提供清潔衛生的食用水。」羅便臣最終接受了委員會的建議。

爲了提供衛生的食水予市民，羅便臣決定在薄扶林修建一個水塘，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於一八六三年竣工，儲水量達二百萬加侖。後來在這基礎上，又進行了第二期工程，令薄扶林水塘的儲水量增加至六千六百萬加侖。這個水塘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居民食水的質量。由這時開始，香港市民可以使用自來水，生活質素得到改善。

麥當奴：紓解民困

談起「麥當奴」一詞，不少朋友都會想起某著名漢堡飽餐廳。其實，在香港歷史中出現過麥當奴這一名字，而且是一個重要名字。麥當奴是香港第六任總督，他在一八一四年出生於愛爾蘭。一八二六年，麥當奴大學畢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但他並沒有踏足文壇，反而對法律產生了濃厚興趣，故他轉修法律，並於一八三八年在愛爾蘭獲得律師資格。

文學碩士轉修法律

後來，英明果斷的麥當奴被英國政府高官賞識，被派往非洲岡比亞擔任高等法院法官一職。一八四五年，麥當奴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從此踏足政界。當時，英國殖民主義興起，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不少殖民地。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一年間，麥當奴成為了時代使者，出任英屬岡比亞殖民地的總督，後轉任聖盧西亞殖民地總督，更獲得三等巴斯大十字騎士勳章。

一八五三年，麥當奴離開非洲，被派到澳洲聖文森特島擔任行政官一職。三年後，他被委任為南澳大利亞的總督。一八六四年，麥當奴又被英國殖民地部調往北美洲，擔任加拿大東南部的一個半島新斯科舍的代理總督。可見麥當奴在非洲、澳洲和北美洲期間，累積了豐富的統治殖民地經驗。

經過多番考驗後，他又接到另一個新任務——擔任香港總

督。雖然麥當奴有豐富統治殖民的經驗，但由於中國文化有着其本身特色，故擔任港督一職並不容易。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一日，麥當奴抵港就職，展開其擔任港督的生涯。當時，香港正面臨經濟困境，市民怨聲載道，情況猶如今天一樣。作為統治者，首要任務是紓解民困，正如今天一樣。

政治方面，麥當奴整頓了立法局，建立固定基制。自砵甸乍以來，立法局也欠缺定規，沒有固定議員數目。麥當奴為建立健全的立法制度，於是確定了香港立法局的當然官守議員為五人，非官守議員為四人，並訓示議員要盡忠職守，協助港督管理香港事務。

統一貨幣促進經濟

經濟方面，面對當時經濟蕭條和財政赤字，麥當奴認為首先要統一貨幣。一八六六年五月七日，香港造幣廠舉行開幕典禮。該造幣廠原是英國皇家造幣廠在香港開設的分廠，目的是統一香港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然而，造幣廠經營不久便虧蝕了三十多萬，最後更被迫倒閉。而廠房賣給了怡和洋行，機器則轉運至日本。

在這嚴峻的經濟情況下，要在短時間內妥善地解決財政問題並不容易。因此，麥當奴積極地尋求解決方法，協助市民擺脫困境。為了紀念麥當奴治港期間的功績，香港中區半山有一條以他而命名的街道，該條街道西起自花園道，東至堅尼地道止。

堅尼地：起用華人擴充警隊

香港第七任港督堅尼地爵士，是一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他與第六任港督麥當奴既是同鄉，又是校友。堅尼地出生於一八一零年的愛爾蘭，他在大專畢業後便進入軍隊服役。一八四三年，堅尼地離開了軍隊，轉移投身政界，先後在愛爾蘭、非洲、澳洲等地擔任殖民官和總督。由於堅尼地長期在英國海外殖民地任職，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故他在麥當奴任滿後，很快便被殖民地部調派到香港擔任港督一職。堅尼地於一八七二年四月正式接任為香港總督，其時他已過花甲之年。

年逾花甲沉穩謹慎

堅尼地雖然與麥當奴的經歷大致相同，但兩人的性格和處事方法卻有很大的差別。麥當奴是一位熱情坦誠的人，而堅尼地卻是一個沉穩謹慎的人。堅尼地遇事時不易表態，喜歡聽取他人意見後，再權衡利弊，才作出判斷。他上任後，並沒有像麥當奴般，對香港各方面的發展策略提出個人見解，反而任由香港自然發展。堅尼地並非一個優柔寡斷的人，他處理香港政務時，常常表現出果斷，甚至是頑固的特點。以下新的治安政策正充分顯示他沉默的性格。

自香港開埠後，不少人士從四方八面湧入香港。這些新移民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帶來一連串的

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香港社會治安的問題。當時，偷盜搶掠日益加劇，各種犯罪活動變得有規模，犯罪分子甚至形成集團，對香港的治安造成很大的影響，而每晚很少行人敢於冒險逛街。這個劣勢的成因有很多，但最主要是香港的警力不足，警員質素很差，而警察活動又得不到香港華人居民的積極配合。

針對這個劣勢，堅尼地採取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首先，堅尼地試圖穩定現有的警察隊伍，決定把警察的薪金增加，以解決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這種做法得到不少人士的支持，當中更包括政府高級官員。他們普遍認為這個措施使警察士氣大大提升，令治安明顯改善。

力排衆議堅持主張

其次，堅尼地起用華人擔任香港警察，擴充警隊，以解決



堅尼地道街牌

香港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可是，他以華人擔任警察的政策上遇到很大的阻力，而反對最激烈的來自警方和軍方。當時，一位英國警察官員明確表示其反對擴大華人警察隊，他更聲稱華人不會是好警察。另外，駐香港的英軍司令也公開表示：「華人加入警隊起不到好的作用，還不如到西印度群島招募幾百人充當香港的警察效果更好。」

他們認為當時香港的社會問題，主要是由內地來的華人所導致，如果讓華人擔任警察，勢必會造成警匪勾結的局面，後果不堪設想，但堅尼地則不認同他們的想法。他認為若要解決當時的問題，便要有華人的參與和配合，否則問題便難以解決。結果，堅尼地也堅持實施其新政策。

第三個措施是驅逐犯罪人員。堅尼地上任後，宣布政府在一八五四年公布的《遞解出境條例》依然有效：凡被捕的不法分子，如非香港土生土長者，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則將其遞解出境。這措施遭到各界反對，連英國政府亦認為這個政策可能會引起不良的社會後果，會令政府承擔很大的壓力。

這次，堅尼地再次堅持到底，推行了自己主張的政策。

通過對警務的治理，堅尼地逐漸樹立了自己的形象，大家也不敢小看這位沉默寡言的總督。在其任內，他開闢了一條自半山通往東區的道路，解決半山交通不便的問題。這條路築成後，就用其名字命名，稱為堅尼地道。由此可見，這位新港督對香港也有不少貢獻。

無法抗拒的軒尼詩風潮

相信大家也知道軒尼詩道位於何處，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軒尼詩是何人呢？原來軒尼詩是香港第八位港督，他深受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所感染，上任後施行了不少改善民生的新政策。

當時，英國對香港的統治非常嚴苛，他們就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般，嚴禁平民百姓參與政治。由於英國人的身分是統治者，故擁有不少特權。他們視華人為次等公民，所以其時華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甚低。這情況與元朝人民分四等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效。現在，每位公民也有參政權及選舉權，能自由地表達意見。但當時，英國人要華人做順民，根本不接納任何反對聲音。

廢烙犯耳背及笞刑

軒尼詩來港後，香港的統治政策起了變化。當時，警察為了區分平民和罪犯，會在犯人的左耳朵下烙上個箭頭的印號，令犯人感受一生的恥辱。雖然犯罪者理應受到懲罰，但這種原始的烙痕記號卻絕對不符合文明社會的法治精神。以這種方法懲罰犯人，可能會令他們對社會更加仇恨，而不會改過自新。因此，這種懲罰犯人的做法受到不少市民非議。然而，過去的港督仍一意孤行，不肯作出任何讓步。

新任港督軒尼詩上任後，認為在犯人耳朵上燒上烙印是對



軒尼詩道街牌

待奴隸的做法，加上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故統治者絕不應施行該懲罰措施。軒尼詩這觀點受到當時不少華人的認同。清朝統治香港時，也未曾出現過這般野蠻無理的做法。而英國人則嘩然大叫：「軒尼詩不懂香港的情況。」他們更說：「他根本不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對待可惡的華人，只能像昔日般以大砲簽訂《南京條約》，決不能仁慈。」

另外，軒尼詩更主張廢除笞刑。笞刑是一種古代刑罰，即以荆條、竹片抽打犯人的臀部、背部及腳部。當時，犯人會在公開的場合被警察施行笞刑。犯人須脫下褲子，在眾目睽睽下被鞭打，他們心靈上的創傷可想而知。現今，老師也不會對學生施行體罰，學生更不會被抽打臀部。知錯能改是很重要的，大家也希望「以理服人」，不願「以刑迫人」！

軒尼詩指出施行笞刑是對犯人人格的污辱，這無助於教育犯人改過自新，反而只會加深犯人對社會的仇恨。但英國士紳

則認為華人是次等公民，以笞刑對付頑民，並沒有什麼不妥。這與某些老師的想法差不多，他們認為以體罰對付頑劣的學童是最佳方法。可是，這往往帶來反效果。今時今日，不少學校也設有輔導組和訓導組；兩者兼行，學生得以重新改過。由此可見，笞刑絕不可取！

軒尼詩來港後，掀起了一股無法抗拒的軒尼詩風潮。他發現上任後有不少東西與自己的觀念相違背，而且違背得甚遠，故新政策因而誕生。可惜的是，不少商人和官員也不認同軒尼詩的做法，結果造成無可避免的激烈爭論！

首位立法局議員——伍廷芳

回歸後，香港立法局改名為香港立法會，繼續履行立法職責。在立法會中，大部分都是華籍的議員，這有助反映本港華人的意見。百多年前的香港，情況並非如此。當時，香港人口雖然同樣以華人為主，但卻沒有華籍議員。直至一八八零年，伍廷芳成為首位華籍立法局議員，情況始有所改變。

聖保羅書院畢業

伍廷芳，字文爵，號秩庸，廣東新會人，父親是南洋富商伍榮彰。伍廷芳出生於新加坡，四歲時隨父返回中國，十四歲時到香港就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他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職通事（即翻譯）。任職數年後，他自費赴英國留學。當時，甚少華人選擇在外國留學，因為他們始終視英國等地為蠻荒之地。當伍廷芳抵達英國倫敦後，選擇入讀林肯法律學院。他經過多年辛勤學習，終於在一八七七年獲得大律師資格。

提創建車路計劃

同年，他返抵香港，成為本港首位華人律師。當時香港的交通混亂不堪，為了改善這情況，伍廷芳提出創建車路的計劃，並制訂了《車路則例》。翌年，伍廷芳被委任為太平紳士，開創了華人擔任太平紳士的先河。由於當時居港華人的經

濟力量日漸雄厚，他們遂向港督軒尼詩提出參政要求。軒尼詩作出了初步回應，委任了伍廷芳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本港立法局第一位華人議員就在這時誕生了。當時，不少華人都因伍廷芳而感到欣喜萬分，他們皆認為英國一向以封閉式統治香港數十年，直至現在才有些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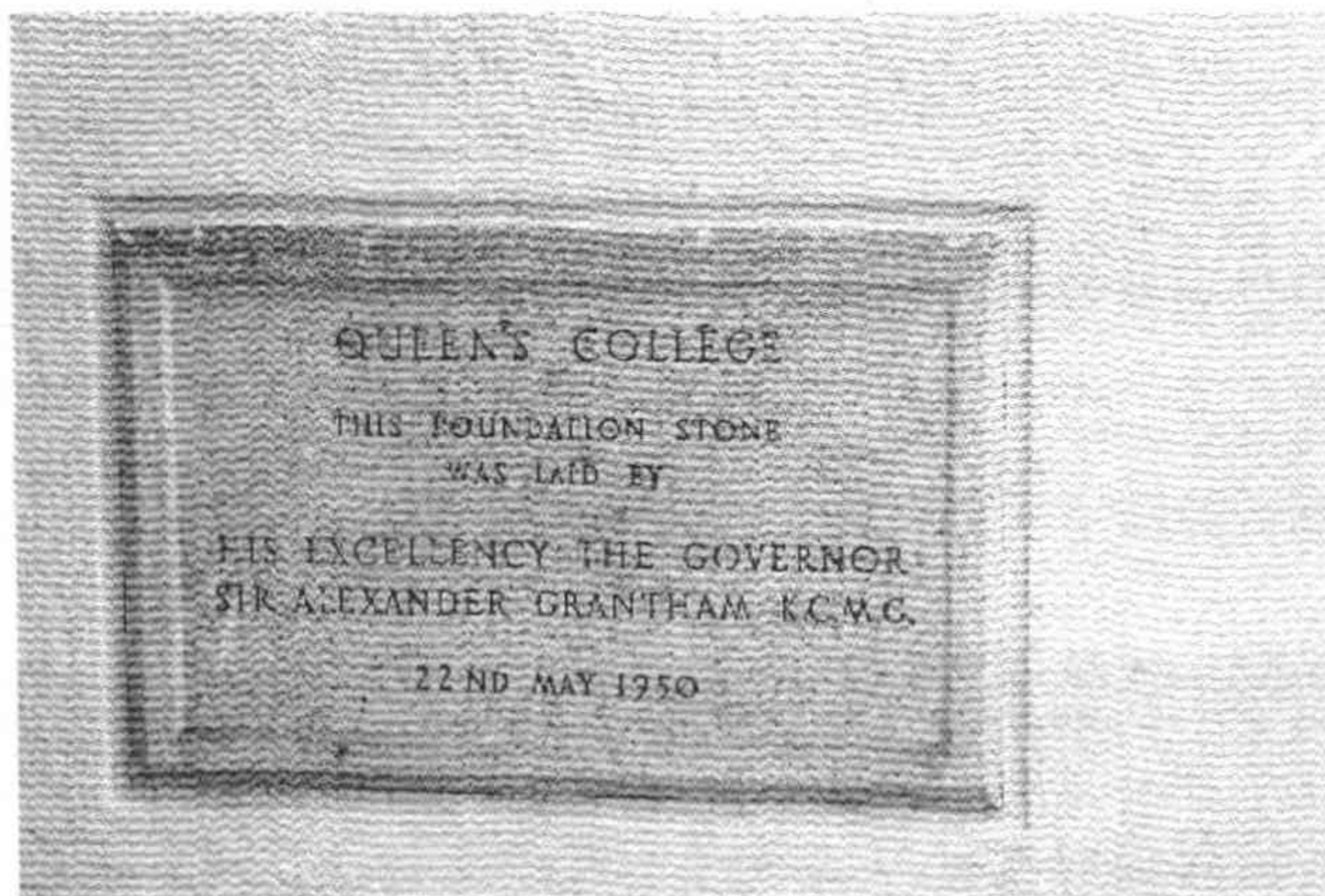
一八八二年，李鴻章招攬人才，積極推行洋務，改善國政。伍廷芳得悉後決定北上，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伍廷芳後來更出任中國駐美國、古巴、秘魯、墨西哥等地的使臣。辛亥革命於一九一一年爆發，革命軍把滿清政府推翻，並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更先後擔任了司法總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而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時，伍廷芳更擔任外交部長兼財政部長。由此可見，伍廷芳是一名在法律和外交方面的專才，被當時政府所重用。一九二二年六月，伍廷芳不幸在廣州病逝。不少人覺得十分惋惜，深感痛失良才。

寶雲：大學校長投身政界

香港第九任總督寶雲，曾在英國科孚大學擔任校長，後來放棄從事多年的教育工作，轉而投身政界。一八八三年，軒尼詩離任後，英國政府便派寶雲來接任港督。

大力推動市區建設

寶雲上任後，施行了連串改革。從中央書院畢業生中挑選政府官員便是其中一項新政策。中央書院建於一八六二年，很多畢業生都是名流紳士，如何啓、何東等人。該書院後來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而最終定名為大家所熟悉的皇仁書院。一八八四年，寶雲在中央書院畢業生中，挑選十二名學生進入政府任職。不少史家指中央書院培養人才，猶如古代官學般，這可說是官校訓練官員制的開始。



皇仁書院奠基石



寶雲任內，港島區獲電力供應服務：電氣道乃紀念此事而命名。

市區建設發展方面，寶雲亦作出過不少貢獻。原先在前任港督軒尼詩任內未完成的公共建築工程，例如政府醫院、天文台和銅鑼灣避風塘等，都先後得以興建。當時，香港衛生環境惡劣，不少前任港督們雖然注意到這個問題，卻始終未能徹底改善。寶雲抵港後，隨即收到一份報告。該報告指香港衛生狀況存在許多問題，若長此下去，會危及市民健康，甚至還會引發疫症，故政府必須採取切實行動，嚴格管理衛生環境。而報告亦提及許多房屋不符合建設標準，缺乏完善排水設施，自來水供應也不足，衛生狀況令人憂慮。報告最後指出，政府須全面改善香港的排水設施、衛生設備及居住環境，還須興建更多公共廁所與浴室，以應付市民大眾的需要。

港島開始供應電力

寶雲對這份報告十分重視，於是他委任了第一位衛生督



寶雲道是為表彰第九任總督寶雲的貢獻而命名

察，專門負責檢查和監督環境衛生。寶雲其後又成立了衛生委員會，討論如何解決環境衛生問題。該委員會成員全由官方委任，成員均為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但因為官方沒有委任歐籍市民作為非官守委員，結果引起歐籍居民的不滿。他們更對委員會採取不合作態度，令委員會不能發揮預期效果。

於排水設施方面，一個新水塘誕生了，這便是大潭水塘。第一期工程在寶雲任內竣工，水塘儲水量高達三億一千二百萬加侖，港島居民的生活在水塘建成後得到改善。至於電力方面，香港島開始有電力供應服務。為了增強香港競爭力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寶雲大力提倡發展電力。結果，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在一八八四年正式成立。

寶雲任期本為三年，但後因健康問題，於一八八五年向英國政府請辭。最後，他便退休返國，過着平凡的生活。

德輔：萬人上書抗議衛生惡劣

不少朋友也知道德輔道位於何處，但甚少人會知道德輔是何人。其實，德輔是第十任港督，全名為佐治威廉·德輔。一八八七年，他從遠方來港擔任港督，那時候，他得到成千上萬的市民迎接，但市民並不是前來歡迎他，而是借機呈上他們對衛生問題不滿的抗議信。昔日，香港衛生環境惡劣，很多市民更因此染上流行病。而政府曾經强行清拆衛生條件差的房屋，但因賠償問題引起官民衝突。

德輔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早在來港前已先後擔任斐濟總督和紐芬蘭總督等職位。因此，他知道在處理環境衛生問題時，不能操之過急，應逐步解決。他一方面強調改善環境衛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政府將會對所有因重建或改建而蒙受經濟損失的屋主作出合理賠償。另一方面，他指出要改善華人居住環境，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須經過很長時間才可完成。德輔提出了一個臨時解決方案，便是暫時寬鬆處理華人區內一些不合標準的房屋。

頒住屋法改善衛生

這本來不失為一個好措施，能解救燃眉之急。但一些不法屋主就趁德輔實行寬容政策的時機，於華人居住區內興建大量簡陋房屋，高價賣給房客。結果，華人居住區的衛生環境每況

愈下。同時，一些華商又在歐籍人士聚居處購買西式房屋，將其改建為唐樓，然後賣給或租給華人居住，歐籍人士居住區的環境衛生亦同受影響。

德輔有見及此，隨即採取補救措施，以壓抑華商屋主過分擴張的情況。一八八九年初，政府頒布《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港島的堅道與威靈頓街之間，只可興建西式洋房，其他類型的房屋一律不得興建。一八八九年五月，立法局又公布了《收回公地法案》，強制性收購部分人口擠迫的房屋，然後在政府資助下，把狹窄的小巷改建為大街，清拆和重建不合衛生標準的樓房，並規定樓房與樓房之間必須相距二百呎，作為通風之用。

有空的話，大家可到德輔道逛一逛，懷念昔日這位提倡改善衛生的清潔大使港督。若時間不足，大家亦可翻閱地圖，看一看堅道和威靈頓街之間的面積，想像當時歐洲人在香港的專區有多大。

威廉·羅便臣：妙化政治難題

香港第十一任總督威廉·羅便臣生於一八六三年，他前來香港擔任總督前，一直在殖民部工作，曾先後擔任要職，但從未被外派到海外殖民地。當殖民部首長通知他前往香港擔任總督時，他激動得有點不知所措。

英商要求地方自治

雖然第五任港督的姓也同樣是羅便臣，但他是軍人出身，性格較為果斷，來港時只有三十五歲。但這位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卻大大不同，他是文官出身，來港時已五十五歲。他在殖民地部工作多年，對那些工作已感到十分沉悶，欠缺挑戰性。因此，能夠前來擔任港督一職，對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

羅便臣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日首次踏足香港，香港的士紳賢達準備了鮮花和美酒歡迎他。歡迎過後，他們便有所求。首先請求發難的，是他同宗同族的英國商人。他們要求香港實行地方自治，認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議席，應通過自由選舉來產生，而非官守議員的席位應超過官守議員的席位，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上，應享有言論和表決的自由；至於立法局，則有權管理香港的一切事務，支配香港全部行政經費；而立法局亦有權優先參與所有涉及英國和香港問題的討論。

順水推舟平息不滿

羅便臣過去在殖民地工作多年，十分明瞭英國商人的動機。羅便臣知道他們希望利用香港居民對英國統治的不滿，藉着擴大立法局中非官守議員的比例，使他們的代表能參加香港政府的部分決策，以保障其本身經濟利益。羅便臣知道這個問題若處理不善，便會冒犯一些有實力的商界名人，他的日子將不會好過。

羅便臣十分聰明，知道這件事並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於是就將問題推給其上司。而英國政府明確表示，其絕不允許任何可能影響帝國統治的苗頭出現。殖民大臣瑞邦公開表示支持羅便臣，不應該談地方自治，而應維持原有的政治制度。

羅便臣得到支持後，心中便有了計劃。當這些商人不滿殖民地部的決定而向他施壓時，羅便臣就做了兩件事，令商人感謝他。一八九六年七月，羅便臣建議立法局增加一個華人議席，並由他委任了華人名士韋玉（寶珊）擔任。同時，他打破行政局常規，設立了兩個非官守議席，委派大地產商遮打及怡和洋行總經理艾溫和為議員。結果，他平息了英國商人的不滿，也使華人對他懷有期望，對他的統治有了一個好開始！

傑出學生之冠——孫中山

孫中山先生出生於一八六六年的廣東省香山縣。他後來到了香港，並在此度過了七個半年頭。其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皇仁書院及香港西醫書院，經常與同學談及革命救國之道。這時候的經歷，對他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亦令他日後由「醫人」走上「醫國」的道路。

商店掩護革命活動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並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目標。孫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重返香港，積極地與陸皓東、陳少白、楊鶴齡及尤列等人籌建革命組織。二月十八日，孫中山以「乾亨行」的商號作為掩飾，把興中會的分部設於香港中環士丹利街十三號，吸引了當時大批的香港商人和教師加入。不久，革命刊物《中國日報》在港創辦，報館位於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即現今著名的「陸羽茶樓」所在地，而該報編輯兼社長由陳少白擔任。

「乾亨行」一名是由新會員黃泳商提出。黃泳商與孫中山為同鄉，黃的父親是香港議政局議員，其與孫中山曾就讀過的雅麗醫校董事長何啟交情甚密。黃泳商便是經何啟的介紹而與孫中山相識，並加入興中會。黃泳商深研《易經》，深信物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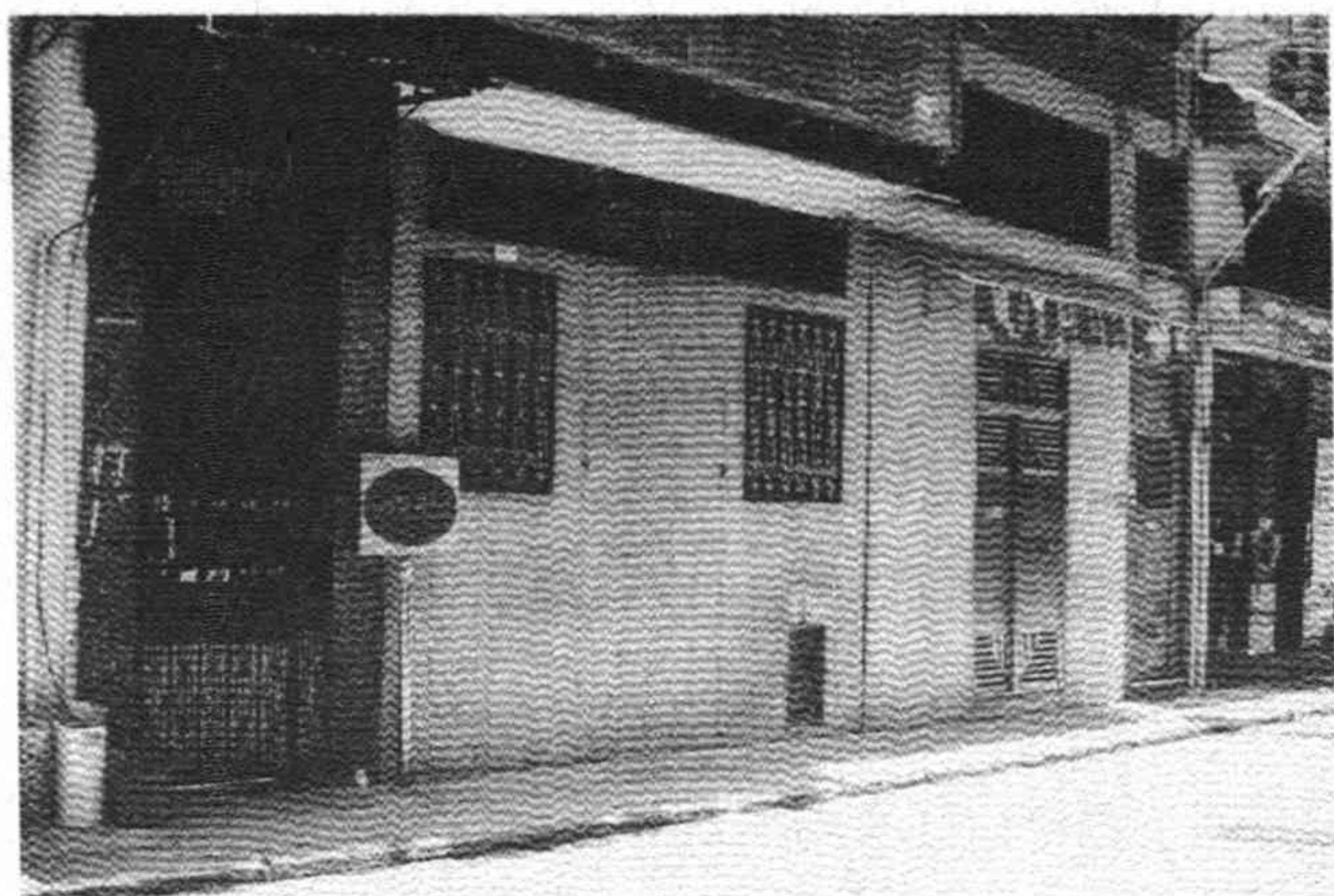
必反的道理，認為漢族已否極泰來，便取「乾亨」二字，象徵着革命必勝。因為易卦第一卦為「乾」，乾為天，而亨為通，合釋為順天應人和通達無阻。

遭驅逐五年禁入境

三月十三日，孫中山在乾亨行舉行會議，策劃在廣州起事。三天後，孫中山又舉行另一次興中會幹部會議，決定採用青天白日旗。孫中山在香港所進行的革命活動，引起政府密切的注視。政府高官擔心孫中山的反清行動，會引起清室不滿，



紅樓內的中山像



興中會總部遺址

令英國在華的利益受影響。因此，當時港督羅便臣在八月二十七日下令把乾亨行封閉。

孫中山於是改在西營盤杏花樓酒家進行秘密集會，他決定在重陽節期間偷運軍火入廣州，進行起事。清朝政府當時已從情報中得悉孫中山等人將進行反清行動，故加強海關搜查。及至孫中山友人偷運武器過關時，海關發現手槍六百餘桿。結果，陸皓東壯烈犧牲，而其他被捕的起事者達七十餘人。

廣州起事失敗後，孫中山便逃往澳門暫避。清朝政府後來與香港政府進行多次談判，要求羅便臣制止孫中山在港的反清行動。爲了維護英國在華利益，羅便臣最終答允了清朝政府的要求。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羅便臣下令驅逐孫中山離境，還禁止他在五年內重返香港。孫中山於是在海外策劃革命運動，繼續反清的行動。

參考網址

甲) 通史

香港史網站

<http://subject.skhlkyss.edu.hk/chist/hkhistory/index.htm>

家在何處

<http://personal.cityu.edu.hk/~mgeric/index.htm>

香港歷史1842-1997

<http://www.ouhk.edu.hk/~asswww/hkhistory/>

香港・邁進新紀元

<http://www.info.gov.hk/isd/hk98/ch25/c25.htm>

香港歷史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Springs/4965/index.html>

香港歷史

http://hp.hkcampus.net/~hp00055/new_page_1.htm

香港歷史之旅

<http://www.geocities.com/wanchi525/>

中國歷史新天地(香港史篇)

http://203.80.250.89/intranet/subject/chinese_history/index.html

香港證券市場歷史

http://www.geocities.com/hung_information/stock/

九廣鐵路史

<http://railway.uhome.net/kcr.html>

地下鐵路史

<http://railway.uhome.net/mtr.html>

乙) 地區史

屯門・時代的天空

<http://www.geocities.com/Tokyo/Field/2299/>

大埔新生活

<http://www.taiposon.com/>

我們眼中的天水圍

<http://www.bmf.edu.hk/press/mytin/mytin12.htm>

十八區文物徑

<http://www.tic.edu.hk/chistory/>

香港離島探索

<http://www.islandsdc.gov.hk/Chinese/index.html>

筲箕灣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06A10006D1007A10008B/skw01.htm>

丙) 古蹟

九龍寨城

<http://your.uhome.net/>

屏山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14C/>

屏山文物徑

<http://www.kinhang.org.hk/pic/ping.htm>

香港法定古蹟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culture_c5c_1.htm

中山史蹟徑

<http://www.kennedytown.com/c/historical-trail/path2.htm>

沙田曾大屋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28A/>

圓玄學院

<http://www.yuenyuen.org.hk/>

屯門四古蹟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21D/>

啓德機場

<http://hung-hk.tripod.com/home.htm>

丁) 習俗

太平清醮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217A/>

節誕及神功戲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15/>

祖先崇拜

<http://www.cciv.cityu.edu.hk/~cciv/site/2000-2001-a/1006B/>

戊) 事件

辛亥革命與香港

http://members.ch.tripodasia.com.hk/girl_guide_31/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革命事業

http://203.80.250.89/intranet/subject/chinese_history/hk_hist/sunyatsun/revolution.html

香港淪陷

<http://members.tripod.com/twinchau/>

己) 機構

歷史檔案館

<http://www.info.gov.hk/pro/>

古物古蹟辦事處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indexc.html>

保良局文物館

<http://www.poleungkuk.org.hk/archives/index.htm>

三棟屋博物館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nese/branch_sel_stu.htm

上窰民俗文化館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nese/branch_sel_syf.htm

鐵路博物館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nese/branch_sel_hkr.htm

香港文化博物館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default.htm>

香港歷史博物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chinese/index.html>

羅屋民俗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lawuk/chinese/index.html>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leicheng/chinese/index.html>

香港海防博物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Coastal/indexc.html>

茶具文物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chinese/introduction/introduction1.htm>

香港醫學博物館

<http://www.hkmms.org.hk/chimainpage.htm>

香港醫學博物館

<http://cpc.hkcampus.net/~cpc-fmw/MedicalScience.htm>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http://www.cuhk.edu.hk/ics/amm/>

香港電影資料館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index_flash.html

警察博物館

<http://www.info.gov.hk/police/chinese/museum/2-6-1.htm>

庚) 人物

香港歷代港督

<http://www.geocities.com/ResearchTriangle/System/1893/govrn.html>

歷屆港督

http://hp.hkcampus.net/~hp00055/new_page_8.htm

香港華人與中國

<http://www.cgst.org.hk/Journal/23/3.html>

闖蕩香港的客家人

<http://hakkaonline.com/big5/yanjiu/hongkong.htm>

屏山鄧氏

<http://www.geocities.com/Yosemite/Cabin/6120/>

參考書籍

1. 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
2. 林友蘭：《香港史話》（香港：香港上海印書館，1985）
3. 魯金：《香港廟趣》（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2）
4. 蕭國健 沈思：《香港島訪古遊》（香港：中華書局，1992）
5. 蕭國健 沈思：《離島訪古遊》（香港：中華書局，1993）
6. 邱小金 梁潔玲 鄒兆麟：《百年樹人——香港教育發展》（香港：市政局，1993）
7. 高添強：《圖片香港今昔》（香港：三聯書店，1994）
8. 余繩武 劉存寬：《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
9. 魯金：《妙言廟宇》（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4）
10. 余繩武 劉存寬：《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11.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1995）
12. 許錫揮 陳麗君 朱德新：《香港跨世紀的滄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13. 巴圖：《別了·港督》（香港：時事出版社，1996）
14. 梁炳華：《南區風物志》（香港：中西區區議會，1996）
15. 元建邦：《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97）
16.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

17. 陳昕 郭志坤：《香港全紀錄》（香港：中華書局，1997）
18. 饒玖才：《香港地名探索》（香港：天地圖書，1998）
19. 馬料金：《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書店，1998）
20. 陳志華 黃家樑：《簡明香港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8）
21.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
22. 陳志華 黃家樑 羅國潤：《香港古蹟考察指南》（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1999）
23.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1999）
24. 丁新豹 黃迺錕：《四環九約》（香港：市政局，1999）
25. 梁炳華：《中西區風物志》（香港：中西區區議會，1999）
26.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27. 鄭寶鴻：《九龍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
28. 鄭寶鴻：《港島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
29. 劉蜀永：《香港史話》（香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0.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31. 爾東 黃家樑：《舊香港》（香港：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2001)

32. 陳志華 黃家樑：《漫談香港史》（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2001）
33. 蕭國健 沈思：《香港市區文化之旅》（香港：萬里出版社，2001）
34. 陳瑞璋：《中國傳統節日和風俗》（香港：萬里出版社，2001）
35. 羅伯·布雷克：《怡和洋行》（台北：時報文化，2001）
36. 趙雨樂 鍾寶賢：《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

香港歷史之謎

作 者：爾 東

責任編輯：葉翠華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初版

I S B N：962-973-634-9

承 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輔以大量文獻史料的考證，從政海風雲、民生百態及人物千秋三方面，闡述香港過去的故事，揭開香港成功之謎。

- 酗酒法官挑戰港督戴維斯
- 鄧氏村民臭蛋「宴」英軍
- 麥當奴：以賭制賭
- 港督公館慘遭「開罐頭」
- 世紀前的監獄生涯
- 大海盜張保仔搖身變武官

ISBN 962-973-634-9



9 789629 736347 >

HK14

HK\$ 54

D11110113B
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
\$ 54.0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